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重訪接觸帶：從西方旅人視野再見 19 世紀台灣(1860-1885)

Revisit Contact Zone: Reviewing 19th century Taiwan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travelers (1860-1885)



研究生：簡于鈞

指導教授：邱德亮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摘要

本論文將 19 世紀西方旅人的台灣書寫視為進入時代之媒介，擷取旅人於旅行時對身體感受與物質的敘述並進行分析，以此做為貫穿接觸帶(contact zone)與會面點(meeting point)的主要軸線，討論 1860-1885 年間不同帝國觸角與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等各種勢力於台灣延伸、交會、流動所產生的接觸帶畫面；並透過旅人實際經驗而對旅行與生活所產生之敘事，展示接觸帶中疆界的模糊特性與多重性，以及作為接觸帶的 19 世紀台灣之原有且複雜的內在秩序。

本論文透過旅人對 19 世紀台灣的日常生活與大小事件、物件的多元描述，展示出 19 世紀台灣多重面貌，並藉由西方旅人於 19 世紀台灣所遭受的生理與文化兩種身體的脆弱，敘述旅人(相對於台灣的他者)進入台灣之後，與其文化概念上的他者(19 世紀台灣)遭遇時，所感受之以多種形式存在的、豐沛的台灣生命力，並以此回視當時台灣立體且複雜的一個切面，進而拆解西方旅人概念中的平面東方。

最後，以兩個事件做為聚焦討論主題：在 1867 年羅發號事件後續處理過程分析中，本文將多方介入者的敘事作為主要資料，以此為例，討論疆界做為開口的可能性與多重性；再以 1884-1885 年間清法戰爭北台灣封鎖為例，討論位居疆界邊緣的文化過渡狀態。透過這兩個事件中多方勢力於 19 世紀台灣的交會，展示多方敘事對焦後所產生的動態歷史片段與接觸帶的活力。

關鍵字：旅人(Travelers)、遊記(Travel Writing)、遭遇(encounter)、接觸帶(Contact Zone)、會面點(meeting point)、帝國視角(Imperial Perspective)、他者(Otherness)、身體感。

致謝

新竹秋日特有的九降風吹來，身體的毛細孔在這個時候跟新竹米粉一起被風乾，雲高遠，陽光灑落天空湛藍，空氣乾淨時，遠方的山在光復路便清晰可見。幾年前來到社文所的我並不知道，這些秋高氣爽的日子，跟風裡頭的味道，會逐漸隨著身體脈動進入生命裡頭。

一切的開始都令人緊張、缺乏歸屬感，感謝在那些不知所措的時光裡頭，所上老師們公於私的直爽與坦率，他們開啟我對知識的探索、對不同價值觀與立場的開放性，以及生活之於學術的重要性；而社文所對知識的開放性與給學生的尊重與鼓勵，則讓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參加許多會議，並因此擴展知識範疇、認識不同領域的朋友，同時對這個我們所在的世界有了不同的理解。

然後，我開始進入練習，日復一日的練習閱讀、詮釋與寫作，看似漫無止盡，且多數時候並不輕鬆的日子裡，邱德亮老師充滿戲劇張力的上課方式，以及嚴格的學術標準，雖讓我課前總是拼命趕讀，但大體而言每一堂課都上的相當快樂，並在老師精采的演繹過程中，讓我理解詮釋學術於日常生活的可行性。

論文寫作的過程中，邱德亮老師精闢且直接的建議，使得文章得以成形，這段期間邱老師所給予的信任、包容，以及適才適性的指導，讓我用自己的方式，說出一個擁有學術性的故事，而在與他對談的過程裡，我也從老師身上學習坦然、率性，以及不卑不亢的生活態度。當然，在這些日子裡我時常感到挫敗，但總還算是愉快，然後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另外，特別要感謝兩位口試委員：莊雅仲老師與邱馨慧老師，謝謝你們給予我的鼓勵和支持，才讓文章能以現在的樣子產出，並且讓我直率的面對自己的想法。還要謝謝地下所長慧芳姐和郁曄，行政事務的繁瑣在你們手上都成了規矩的律動，謝謝你們每次的幫忙！

除了老師們指標性一般的存在，與我一起迷途於過程中的朋友們，則成為伴。大夥來來去去，離開似乎成為常態，我們以不同的形式彼此作伴，同為邱門的吳一針、丁、胡大星，謝謝你們在我即將倒下的時候忽然出現，用很邱的方式為我打氣；感謝哲良與舒兄兩位忘年之交的縱情相談，而一起往終點前進的政芬、欣潔，以及研究室裡已經離去和準備離去的大家：Teri、文生哥、乃禎、小豪、妍潔、阿焦、咖哩，謝謝你們的共伴時光，有你們真好，那些飯局、聚會、發夢、練瘋話的日子都成為我的舒壓方式與快樂來源，願大家都能走好各自的路，感謝羿安的陪伴，那些一起經歷的生命課題也終將成為我們的來路。

除了精神上的餵養，最重要的還是要回歸生活，踏實的吃喝睡和運動得以填補腦袋裡頭的過度攪拌，感謝簡家人對我的提醒、付出和忍耐。謝謝爸爸和媽媽從小給我的思想自由，與長年以來無論物質或是心靈層次上毫無保留的支持，在這些日子裡，即便你們對我正在作的事情產生許多問號與不瞭解，卻仍然給出你

們的全部，並在我挫敗不堪的時候陪伴我、用簡式幽默鼓勵我，讓我無後顧之憂的面對自己的難題；我的反骨、叛逆、善辯、多愁善感與貼心，各種好好壞壞必然帶給你們許多快樂或傷害，而這或許也是我們得以更加理解彼此的方式之一，謝謝你們，我愛你們！感謝凱莉老師的大力支持，和你身為姐妹對我而言是一種幸運，每次的勞作聊天時間都及時把我拉回現實，不至於在想像裡過活，而你的照顧和鼓勵總是讓我感到溫暖，日後也請多多指教！簡家三狗則讓生活多了許多驚險和爆笑場面，我更從與你們的相處中得到許多快樂與感動，謝謝狗們！

最後，感謝我的生命夥伴男子翰，兩個差異極大的個體相伴，在不算好走的路上調整彼此的節奏，持續的走，這或許也可以算是跨領域的另一種展現？我們各自在不同領域裡浮沉，而你對我的支持如同我所能給的那樣，全力以赴。我總是說著許多話，有時感覺深奧難懂或者溺於想像，但你卻用簡單的句子點出我的盲點，或許你不覺得特別厲害，但我總是佩服你，你緩而長的思考過程、處事冷靜的態度和討論的開放性，成為支撐我的重要力量與依賴。你也是許多情緒暴風雨的受害者與見證者，你總耐著性子等待我的清醒，然後穩穩接住我的恐懼和創傷陰影，讓我願意相信自己，並且願意成為更好的人，謝謝你用最真誠的方式和我一起，看見以不同形式出現的各種生命風景，並在經歷生命來去、跌宕起伏的過程中相互打氣、彼此珍重，未來我們也一起好好的走。

寫作的日子裡，我時常發現自己的極限，無論是生活、體制、知識、心靈，或者生理，然後我總企圖模糊認知上的牢固疆界，並學習和自己相處。因疾病與壓力而來的身體限制非常多，但我也時常感到自由，特別是頭髮跟米粉一樣被新竹秋日的九降風吹得跟瘋婆一樣的時刻。我猜，擺盪在理論、史料、社會現實跟自我理想之間，體現的是逃避、閃躲、共存、互生，以及堪稱愉快的研究時光。

某個寫論文進入瘋狂期的夏天早上 11 點，太陽豔得像要在身上刺青那樣，一邊走往學校的路上，人行道的排水溝散出陣陣腐敗氣味，進了研究室之後，我寫下一段話：「化作肥料的過程中，物體被融入大地，去形、去性，伴著發酵、濕氣和臭味——那是一種過多加速所引起的酸朽，然後土地才能吞嚥，得以被滋養。日常、寫作亦如是」。我帶著南城的陽光往風城來，曝曬完接著風乾，時光流轉，與眾人生涯偶遇後，帶著土地和生命教導我的謙卑與坦率繼續前行。

2012 霜降，在新竹

目錄

摘要.....	ii
致謝.....	iii
目錄.....	v
緒論：讀與寫.....	p.1
第一章 切入的視角.....	p.3
• 不同的旅人如何觀察台灣？.....	p.3
• 從他國異地到身歷其境.....	p.4
• 文獻回顧.....	p.5
• 研究歷程.....	p.9
• 旅人在台灣-分類資料.....	p.10
• 親身體驗接觸帶的旅人.....	p.12
• 作為事件碰撞的會面點之一：清法戰爭台灣封鎖期(1884-1885).....	p.15
• 研究方法：文化過度狀態、多樣書寫的陳述，以事件聚焦.....	p.16
第二章 見或者不見-文化他者概念.....	p.19
• 西方旅人可能握有的十九世紀台灣圖譜.....	p.20
第一節 「漢人呀漢人」.....	p.23
(一) 那些不提也罷的漢人.....	p.23
(二) 奇怪的漢人思維.....	p.27
第二節 遇見平埔族-美好但落後的一群.....	p.30
(一) 參差散落的番人印象.....	p.30
(二) 參訪六龜博物館(Visit 六龜 as a museum).....	p.34
第三節 刺激的生番印象.....	p.40
(一) 別人說.....	p.40
(二) 與生番會面.....	p.42

第四節 小結.....	p.47
第三章 旅人的島嶼生活—受苦但優越的它者(Being a suffering other with proud).....	p.49
第一節 旅人的處境.....	p.51
(一) 適者(試著)生存.....	p.51
• 隨著苦難而來的存在感.....	p.51
• 生存二三事.....	p.55
(二) 有限度的移動：買辦和嚮導.....	p.59
• 關於買辦的二三事.....	p.59
• 隨時會喊停的嚮導.....	p.63
• 禁忌！禁忌！.....	p.65
第二節 旅行作為映照自身的鏡子.....	p.68
(一) 如入寶山，慾望無盡.....	p.68
(二) 飲食與醫療，關於旅人的鄉愁.....	p.72
第三節 小結：與它者遭遇.....	p.77
第四章 在浮動的疆界邊上溝通.....	p.79
第一節 不良溝通的共識.....	p.81
(一) 西方旅人筆下的羅發號事件及其後續處理事宜.....	p.81
• 必麒麟與霍恩的說法.....	p.82
(二) 清帝國官方說法—所謂的“帝國無奈”.....	p.85
• 官員所扮演的帝國之眼.....	p.86
• 無奈，但求表面和平.....	p.89
(三) 因事件產生的動態接觸帶.....	p.90
• 兩種帝國視野.....	p.90
• 一個關於「地位」的插曲.....	p.92
(四) 小結：縫隙間的動態.....	p.93
第二節 封鎖？—關於疆界的開放與聚合.....	p.95

(一)	不和平的戰爭與和平的封鎖.....	p.97
	• 封鎖之前：兩個帝國於海外的延伸.....	p.97
	• 封鎖了嗎？.....	p.102
(二)	從不同角度看封鎖—封鎖下的生活.....	p.104
	• 霍亂、熱病、喪禮.....	p.104
	• 隨生理欲望而來的麻煩.....	p.105
	麻煩之一：雜貨商事件.....	p.106
	麻煩之二：臺灣住民(雞、墳墓、女人).....	p.106
(三)	突襲缺口、結束封鎖.....	p.108
	• 中立國製造的封鎖缺口.....	p.108
	• 法軍突襲.....	p.110
	• 結束封鎖之後.....	p.112
(四)	小結：疆界與歷史的多重複雜性—關於接觸帶.....	p.113
	• 記憶/技藝.....	p.113
	• 感知接觸帶.....	p.115
第五章	結論：想像、觀察、置身接觸帶(in the Contact Zone).....	p.116
參考文獻	p.119

緒論：寫與讀

是的，我們脫險了……應該感謝誰呢？不要自吹自擂了，應該感謝我們的元帥，感謝這位上帝派來的人，他是那麼冷靜，那麼有膽量，他熟悉本身的職務就像你熟悉如何做蔬菜牛肉湯一樣。一點也不假，他把我們從這裡救出來真是一個奇蹟，而且做得那麼漂亮，跟廚房大師傅的手藝一樣漂亮。¹

這是法國海軍小兵 Jeans 在 1884 年 8 月 30 日中法戰爭台灣封鎖期之前寄給母親的信件，他用自己與母親所熟悉的敘事方式，向母親說明孤拔將軍對於形勢判斷的精準與指揮若定。進行說明時，人們總是用自身熟悉的方式，向他者轉譯自己的所見所聞。但喜歡使用與烹飪和食物有關的詞彙描述清法戰爭遭遇的小兵 Jeans，卻因此給後來進行翻譯工作的譯者添了許多麻煩，然而譯者的困擾卻讓我試著思考另一種可能性：無論是旅行理論或是殖民、後殖民理論、東方主義等，討論 19 世紀台灣與同時期的文章非常多，那麼，在理論與論述之外，歷史與文化研究可否用更貼近時代與生活的方式、更簡單易懂的語彙，討論時代的樣貌？

在這篇論文中，我試著不用理論切割閱讀材料，將 1860-1885 年的台灣作為討論範圍，隨著旅人的筆記走向 19 世紀台灣，企圖呈現出原本繽紛雜亂，而且充滿生命力的 19 世紀台灣。本論文選用了各個不同旅人所展現的特質，雖以第一人稱書寫，卻在某種程度上展現了屬於自身的時代眼光，這些旅人眼光並不一定被理論所收攏，卻成為本文寫作時的重要線索，也是觀看該時代的最佳縫隙。

除了文化認知、歷史記憶和帶有後見之明的批判以外，本論文所指的時代樣貌或社會環境，更精確的說，是屬於社會實在的、生理性的、關於物質文化運作所構成的環境。至於看起來像理論的詞彙-接觸帶(contact zone)與會面點(meeting point)，實際上並非理論，而是一種觀看的視角、一個通道。透過這個通道，出現了接觸歷史零碎片段的可能，而非只用縱觀角度說明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甚至，對本文來說，這些事件的原因與後話都不是關注焦點，重要的是事件發生當下，這些人物如何互動，又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必須以這樣的方式呈現？能夠經由這些類似的行為背後，看見時代的樣貌-將物質作為軸線，串聯起整個 19 世紀台灣裡文化間的交會片段。

因此，本文將以散落各處的例子和寫作手法作為寫作基調，在第二、三、四章，以旅人視野的描述，從平面-立體-互動的漸進方式，討論旅人將台灣視為文

¹Jean L 著，鄭德順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頁 23。

本的閱讀與瞭解到旅人以自我身體感受當下的狀態後所受到的衝擊，最後則是描述旅人實際參與台灣事件的過程，從旅人漸進的三種理解方式中，重新觀察 19 世紀台灣動態歷史中的多重性與複雜性，同時分析旅人遊記中以各種形式體認他者存在的過程；並透過遊記資料，重新探索清帝國疆界邊緣——同時也是眾多文化匯聚的 19 世紀台灣——的某一切面，以及不同文化理解下的 19 世紀台灣。另一方面，從旅人敘事所述之旅人於生理與文化兩種身體上所承受的不適應感作為開端，透過旅人的脆弱展示 19 世紀台灣所具有的豐沛生命力和內在秩序，呈現出不同於理論概念或其他文本中的台灣。本文透過零星而瑣碎的大小事件將旅人視野聚焦，試著說明經過不同視野而展開且並存於台灣的多重樣態，窺探遊記之外，可能存在卻沒被寫下的 19 世紀台灣。



第一章 切入的視角

歷史中的旅人透過觀察與記錄，寫下異地的人事景物，同時也深刻說明自身的文化概念，以及旅程中層出不窮的衝擊和反思。旅行背後的目的地和其中所隱含的欲望(例如對知識擴充的內在動力、對他域資源的需求等)，透過科學手法與紀錄，將這些曾經空白、或模糊的區域，逐漸展現於世人眼前。旅人所到之處、或者被書寫出來的區域景觀，本文將之視為「接觸帶(contact zone)」。接觸帶所指稱的，並不是一個固定區域，而是旅人在生理、心理、文化上與陌生地進行接觸、甚至造成衝擊的區域。

接觸帶一詞，出自 Mary Louise Pratt 著作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²，一書。本文將援引接觸帶概念，以此指涉十九世紀的臺灣：一個處於世界殖民風潮與殖民脈絡中，被各種眼光評價、各式欲望索求的小島。以此理解旅人筆下的他國異地，特別指涉的是旅人筆下，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將自身文化概念和文明標準挪用，用來評量與敘述十九世紀台灣的片段。

另一方面，遊記具有處於移動、或經過移動而書寫的特性，使旅人在遊記中直接或間接的敘述了接觸帶裡的不對稱關係，包括文化、權力，以及直接的衝突，並展現十九世紀的台灣狀態——許多互不理解、溝通不良但仍然能夠共存於一個區域的故事。因為陌生與差異，旅人寫下異地的新穎與奇異的現象，卻也特別容易隱晦的說明自身熟悉的是什麼，這樣的文本分析對重新理解「台灣究竟是以什麼狀態與他者交會」這樣的問題，或許可以發現另一種回答路徑；而「台灣是以什麼方式被納入其他國家的知識體系中」這個大問題，或許也可從遊記歷史的書寫中試著回答。藉由不同紀錄、不同看法所對照出的同一區域、同一事件，成為另外一種窺看歷史的管道。透過十九世紀旅人對臺灣這個接觸帶的書寫，以及旅行書寫所映照出的書寫者本身(亦即台灣的他者)，兩相對照之下，赫然可見台灣與十九世紀時的世界知識板塊的關係。

• 不同旅人如何觀察台灣？

十九世紀的台灣是一個看似野蠻，實際上，當地所有的運作方式，皆不是遊記作者熟悉的「文明」。外國旅者與中國統治當局對文化的不同理解，再加上台灣本地的神秘色彩，構成了一個難以簡單說明的文化狀態，也使本文得到了進入時代的鑰匙。

西方旅人和知識共同建構出的十九世紀臺灣，其文化建構過程，一如費南德

²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茲於《大探險家》所言，十七世紀之前的西方世界因各種原因探索世界，並從中掌握資料，這使西方科學在十七世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進展，握有科學的西方人就此成為全球知識的統籌者，他們收集各地探險者的資料、給予一個標準、繪製地圖，也因此掌握了全球人員與物品的交換路徑。³基於對帝國擴張與市場推廣的渴求，許多旅人帶著秤斤論兩的眼睛，觀看一個尚未被開發的區域，企圖將「文明」澤披於上。同樣的，清代中國文人自十七世紀末期就開始討論是否要「教化」臺灣，清帝國對臺灣莫可奈何的情狀、和統治異域的焦慮，也在各類文件中可見。台灣這個小島，在十九世紀恰巧成為許多文明都想要施恩的地方，也成為文化撞擊的現場，而那些文明背後所挾帶的國家利益考量，也一同在這裡被展開。

• 從他國異地到身歷其境

十九世紀在台旅人的書寫，帶著不同的視角，各自成為觀看台灣歷史場景的孔道之一，這些縫隙牽引出許多未曾出現、或者在某些歷史敘述中只是背景而尚未成為主角的人物。以旅行作為一個深入時代縫隙的視角，遊記成為必須被拆解的時代贈與；旅人說的故事，並非只是自身觀感，而是書寫者所受到的衝擊(不管是環境或者文化，甚至是運氣問題)，與當時該地各種因素所雜揉後的感想；旅人的抱怨，來自於差異、衝突，以及對環境的無法理解。這樣的抱怨並不偏重於個人，反而成為自身與他者的、東方與西方的、海洋與陸地的理解認知相互碰撞時的場面。這一狹小縫隙，牽引出更多的歷史片段，包括被紀錄的，和被刪除的。這類描述並非單純的指涉該地，反而可以作為不同體系、不同文化、權力不相等的人們如何理解對方的路徑。

為了能夠具體的理解在十九世紀台灣發生的接觸帶現象，並讓事件成為敘事主角，本文使用 Emma Jinhua Teng(鄧津華)提出的會面點(meeting point)概念，強調歷史動態的精神，尋找事件的細節，將 19 世紀於南岬發生的 1867 年羅發號事件後續處理過程，以及 1884-1885 年間清法戰爭臺灣封鎖期的北臺灣封鎖事件，作為接觸帶中文化差異與衝突的直接會面點，並從中看見旅人的抱怨，以此重新爬梳簡化敘事句所構成的歷史片段。

旅行書寫像是能夠觀看河海交界處潮汐的堤防，讀者得以藉此窺見接觸區中外界與內部的人員與物資相互滲透，進而流動的過程。旅行的歷史賦予事件作為主體，跨越地理疆界與文化視野的可能。藉由閱讀接觸帶和會面點的資料，觀察差異碰撞時，接觸帶中多重交錯的關係，以及各種不同觀點下的十九世紀台灣，再一次發現歷史切面，讓事件再開展成為可能。

³Felipe Fernández-Armesto(菲利浦·費南德茲-阿梅斯托)著，黃中憲譯，《大探險家-發現新世界的壯闊之旅(Notes on Pathfinders –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台北：左岸，2010，頁 309。

本文試圖展開歷史時代中的皺褶，透過不同角度的比對，敘述歷史事件發展過程中，曾經被掩蓋的、具有動態性的社會狀態，並藉著事件背後的力量折衝與勢力交會的片段，試著梳理這些經過折疊的場景，將之稍為攤開。

• 文獻回顧

前人研究清代中國的旅行書寫時，對地方志與官員書寫紀錄的內容，做了詳盡的分析。例如巫仁恕在《游道—明清旅遊文化》一書中將旅行和旅遊分開，並對旅行與旅遊各下了一個定義，認為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重點在「行」、後者重點在於「遊」，遊覽就是旅遊最終的目的⁴，並以物質文化為核心，將遊記中所描述的物件和社會連結，本書雖與清代臺灣的旅行/旅遊狀態不那麼貼近，但仍有時代與文化的相關性，與其延續前人而來的傳統。

關於清代士大夫的旅行書寫，狄雅斯則作了一些探討，她認為當時的士大夫以遠遊的形式進行探索，不但充斥了尋奇冒險、超越前人的意味，也不乏中原大國對蠻夷邊疆的和文化的判斷—關於身體的、文化的、語言的、智識的、道德的，以及日常生活習慣，無所不評⁵。

同樣的情狀也出現在離開本土抵達荒島的清文人身上，例如莊雅仲在〈裨海紀遊：徘徊於自我與異己之間〉一文中，即以郁永河採硫之旅為例，認為幾乎是一種以漢文化為核心的光譜記錄，認為清代中國與台灣島的接觸，時常因對台灣的認知模糊，而將台灣的人事物與中國本土的差異，視為一種道德的缺憾，「山水成了一則一則的寓言，無止盡的訴說著另一個故事—遠離權力中心的失落」⁶。這樣遠走他鄉的過程，反倒成為建立中國文化核心的進程。

除了旅人筆記之外，清代方志的書寫也屬於異地書寫的一部分，因此在清代台灣方志的討論中，也可看見類似的想像與文化概念，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在其博士論文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⁷ 一書處理的資料以明清時期的臺灣文獻和圖像資料為主，對其文本分析，並以理論概念做為分析工具，試圖釐清清代中國概念下的台灣，分析清代中國對臺灣的地理想像和建構，並在書末提出會面點(meeting point)概念，強調歷史的動態性和文化間的相互關係，以及歷史各階段所存有的歷史差異和延續性，以理解中國曾作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立場，除去過度的受害者印

⁴狄雅斯、巫仁恕，《游道—明清旅遊文化》，三民書局，臺北市，2010年，頁1。

⁵狄雅絲，〈晚清遊記對西人的情感與敘事〉，收錄於《游道—明清旅遊文化》第十章。

⁶莊雅仲，〈裨海紀遊：徘徊於自我與異己之間〉，《新史學》四卷三期(1993)，頁69。

⁷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2004.

象，進而拆解普遍觀念下的殖民主義⁸。

《想像臺灣》⁹一書討論的議題廣泛，包括殖民、地理景觀、種族論述、視覺分析、土地與人群的分類、性別論述，和民族史書寫等，將清代中國對台灣的旅行書寫從歷史時間的縱軸拆解，拉出不同子題，加以橫向論述，並輔以文集中的圖像作為視覺再現，使清代台灣的旅行書寫與官方著作產生多元開展的可能，並提供了中西方資料的對話空間背景。整體而言，鄧津華以中國視角做為切入點，企圖捕捉中國傳統概念中，接納新疆域的過程，描繪清代中國面對台灣時的大致輪廓；在此過程中，作者企圖爬梳所謂的傳統中國帝國主義，以圖像分析的方式，看見帝國眼光的展開，且使用明、清時期的台灣書寫，訴說帝國權力運作的方式。

實際上，以臺灣方志說明帝國權力版圖的切入方式，在許博凱¹⁰的文章裡也可以發現。許博凱將方志作為現象，探尋台灣方志生成過程中，帝國的權力運作，說明帝國視野的概況。全文以方志作為帝國秩序和地方秩序兩者溝通平台，認為方志是帝國視野下特定設立，用以凝視台灣的路徑；清代台灣方志史以一幅幅靜態圖像，說明清帝國在收納新土與收攏明代遺民的動態歷程中所產生的燥鬱病症，以及帝國的統治邏輯和帝國階序概念。許博凱文中使用德勒茲「文學其實是一種療癒」的概念，認為治療帝國燥鬱的藥方其實就是清帝國所創之台灣方志，透過方志中所創造出的多重台灣景觀和空間質地，獲得明代遺民的信服和文化共感，使清帝國獲得統治正當性。此文將方志作者、文官、甚或台灣居民，都視為帝國邏輯操作中的一個小零件，因此方志作者的煎熬(既要描述台灣與中國的連帶感，又要體會派遣邊陲的匱乏和焦慮，還得用方志向帝國報告自己的政績，並且撫平帝國的不安全感)，其實就是帝國的焦慮。

〈帝國文化邏輯的展演〉一文雖勾勒出帝國視野的概略圖像，並強調方志的平台角色與撰寫人作為帝國代言人的地方官，從清帝國往台灣看，以及調派邊陲台灣回望清帝國的雙向視野，文中卻將台灣置放在一個「被臨摹」的角色，說明台灣方志中不是主角的台灣，以及在帝國邏輯中缺乏能動性的台灣。這個說法實際上有待商榷，倘若換一個角度觀看方志，隨著叛亂與開發的進展，台灣方志的敘事細膩程度和關照區域也隨之加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發現，台灣方志徹底

⁸在此指的是歐洲作為殖民者與剩餘區域的被殖民者，參照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p.258.

⁹中譯書名參照張隆志為《想像臺灣：中國殖民旅行書寫與圖像(1683-1895)》。張隆志，“Review: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中國文哲史集刊》26期(2005)，頁415-422。

¹⁰許博凱，〈帝國文化邏輯的展演—清代台灣方志之空間書寫與地理政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展現了台灣的能動性，而帝國的尷尬和為難，以及官員們更細緻的立場，則是一再的出現於臺灣方志的內容中。

例如〈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¹¹一文，莊勝全以清代臺灣的方志書寫和文官們筆下的台灣，作為清帝國認識台灣的方式，強調寫作者編輯他人文章、有意識的擷取台灣情勢背後的主導性，除了討論編輯者們各自的政治意圖，也有意將之推導到清帝國對於台灣的統治意圖。莊勝全於文中展現清代文人對於臺灣的人事地物等景象描繪，以及描述對象的轉移，例如從中國人一開始對番人的分類，到清楚描繪生熟番的生活習慣；清廷教化重點從對番人的道德教化，轉而成為對在台漢人的防範等內容，此外也說明清代文人於行文中語氣上的轉變，以此展現帝國對陌生的定義與其窘迫處境，同時呈現台灣被納入清代中國統治範疇與被清代中國認識的過程。

從莊勝全文章裡對方志書寫的分析，可以發現兩種不同方向的溝通實例：對清代來臺文官而言，他們從中國到台灣，承襲許多前人著作，無論是地方志或者遊記、雜著，都是做為一個調派荒島的必要前置作業、更是事關生存的參考文獻，同時也作為一種增加信心、或自我激勵的存在。另一方面，進入台灣的文官，身處台灣並回報訊息給清政府，寫下帝國如何劃分他者，與納入他者的情況，其中也描述了清代文人進入異世界的方式，他們企圖在文字與政策中，拉近自己和他者的距離，並將他者的各種舉措歸屬在書寫者(探索者)自身的文化脈絡中。從清國到台灣，以及身處台灣回報清國，這兩個方向的溝通不但持續進行，更相互影響，且同時發揮作用。

另一方面，吳明益在其博士論文《當代臺灣自然寫作研究》¹²中，將清代中國與西方旅行家對台灣進行的書寫特性進行比較，並將之視為爬梳當代台灣自然寫作時必須理解的前史，一個當作歷史脈絡的方式。吳明益認為清代中國文人來台目的各異，包括任官宦遊、經濟利益、隨軍書寫的遊記與見聞錄等寫作目的，另一種寫作則來自地方志的修纂，但清代中國在台灣的旅行家與西方旅行家最大的不同，並非寫作內容，而是清代中國來台旅行的寫作者多為文官，而非博物學家或自然學者等具有專業知識者，且地方志沿用的陋習，與清代中國文人於寫作時對台灣的想像和懷想傳統，使其文章內容中虛構、未應證的部分多於自身經歷，因此「方志雖然保存了不少原住民的風俗文化，但相較起來，遠不及同時期西方博物學家描寫的精確、深入」¹³，對 19 世紀台灣的整體環境與物種資訊的

¹¹莊勝全，〈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08。

¹²吳明益，《當代臺灣自然寫作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¹³吳明益，《當代臺灣自然寫作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頁 81。

提供相當不足。然當時的西方博物學家上未具備成熟的生態學觀念，雖提供大量關於 19 世紀自然生物紀錄與人文風俗的資料，卻多聚焦於個別生物的稀有與特殊性，而非整個環境之間的聯繫與互動，故形成了一個重要的資料庫，卻仍缺乏鏈結。

在吳明益的分析中，以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環境倫理意識作為中國自然書寫史的探求角度，以致不時出現作者以生物學、分類學，或現代生態學的先設立場評論清代中國的台灣書寫，以致中國文人書寫傳統成為自然史書寫的某種障礙。然而，撇除這樣的立場，吳明益實際上指出 19 世紀台灣在清代中國與西方視野中的差異，以及當時各國旅人進入台灣所紀錄下的多元狀態，而本文則可試圖於西方旅人所專注的以科學式紀錄作為描述主體之外，尋找旅人進行物種紀錄過程中的人、地、物之間的連結。

而清代中國文人與官員筆下的 19 世紀台灣，因其寫作手法反使 19 世紀台灣的面貌更顯模糊。由於寄情於景、思鄉之情、經世濟民之慨，或者以清代中國作為文化中心、將當時台灣視為荒蕪的對照之地等書寫，為當時清代台灣的宦遊文章內容中的幾個方式¹⁴，使大多數清代中國的台灣書寫實際上成為清代中國成為文化中心的帝國宣導書，而方志也多因抄襲舊冊、缺乏實地、實物的探查描述，而使書寫情況並不一定符合當時台灣的實際生活狀態，因此清代中國的台灣書寫並非本文研究範疇。

至於現有資料中研究者討論西文遊記的應用與分析，目前所見的使用方式約可分為兩種：一是做為歷史事實的直接使用以作為其論點的佐證，例如臺灣經濟史相關著作中，多以遊記作為材料，直接引用或者作為解讀現象的佐證，但並不分析其數量和內容，亦沒有將遊記作為敘事主線來分析；二是翻譯個別遊記資料作為台灣歷史的另一個視角，但只限於個別的人物，或個別事件。關於十九世紀台灣遊記被使用的方式以碩士論文為例，黃子寧在《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¹⁵一書中，使用大量傳教士日記與教會資料作為敘事主軸，並對萬金一地的歷史情境作了相當程度的陳述與還原。而洪維晟在《帝國邊區的村落、族群與歷史：以屏東萬金庄為中心討論(1861-1945)》¹⁶一文帶入邊區社會的概念，討論萬金的地方社會特殊性，並使用西方遊記作為輔助讀者想像該地情境的資料。上述作者將清代統治者所劃定的區域界線作為單位，或者是以教會堂口

¹⁴參照田啟文，〈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的特色及其影響〉，《東海中文學報》17：2005，頁 93-126。

¹⁵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出版，1996 年。

¹⁶洪維晟，《帝國邊區的村落、族群與歷史：以屏東萬金庄為中心討論(1861-1945)》，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作為分區，便於描述區域特徵，或者區域研究調查，使區域史成為可能。

從前述文獻回顧中可以發現：目前研究著作中尚未出現以多重遊記資料探索 19 世紀台灣裡頭多元而繁多的族群交會事件的文章，也缺乏多重軸線對比的分類與統整。因此，本文將透過各個文章描述主體的邊緣所透露出的族群互動，作為理解 19 世紀台灣的視野，並以此再次回望 19 世紀台灣，企圖各個看似無法跨越的實際疆界(區域)與文化疆界(族群)之間所進行的流動與互動狀態。

• 研究歷程

使本文得以構成的西文資料並非漫無目的散落在隨手拿取的資料中，實際上有其內在軸線。從劉克襄的著作《橫越福爾摩沙：外國人在台灣的旅行(1860-1880)》¹⁷、《深入陌生地：外國旅行者所見的台灣》¹⁸等，一系列由自立晚報出版，有關十九世紀台灣探險的書系出發，文中展現許多旅人在十九世紀台灣的足跡與他們的生命片段；劉克襄按照主題或區域，翻譯了許多英語文章，內容或有連貫、或只是一小片段，並加上附註和潤飾，使文章讀來生動，促成本文研究的開端，開始進一步閱讀十九世紀他國旅者在台灣的故事。

接著，《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¹⁹一書中，波特蘭理德學院的教授費德廉(Douglas Fix)，與譯者羅效德，收錄了在 19 世紀裡踏訪台灣的 14 位不同作者，不論其有名與否，費德廉試圖以非具代表性的作品，提供新的資料與研究領域，並提供了一張對於地名辨認與區域理解相當實用的十九世紀台灣地圖，透過時間與旅人和旅行區域的對照，使筆者發現一條模糊的引線，並獲得許多啟發。此外，費德廉將 19 世紀於歐洲出版關於台灣的資料彙整，藉由理德學院的計畫，和其他學生們一同建立了福爾摩沙網站²⁰。除了將文件與書籍重新編排成電子文字檔案之外，還整理了地圖和十九世紀台灣的年表，使用者可以此清楚的了解當時在台灣的西方人所發生的事件和關係，可以說是目前所見完整度最高的十九世紀台灣西文資料中心。

至於，白尚德所著《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²¹一書，使用了許多存於法國圖書館中的臺灣資料，不但補充語言隔閡下的遺漏，更進一步的帶領讀者進入當時歐洲人的內心世界，例如對風土病的看法、面對不那麼陌生的異地的反應，或

¹⁷ 劉克襄，《橫越福爾摩沙：外國人在台灣的旅行(1860-1880)》，台北：自立晚報社，1989。

¹⁸ 劉克襄，《深入陌生地：外國旅行者所見的台灣》，台北：自立晚報社，1993。

¹⁹ 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台北：如果出版社，2006。

²⁰ <http://academic.reed.edu/formosa>

²¹ 白尚德(Chantal ZHENG)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Les Européens aux porte de la Chine: l'exemple de Formose au XIXe siècle)》，台北市：南天，1999。

者對中國人、臺灣人的看法，以及不同國籍的旅人們對它的評論，在分析歐洲人心態的部分也相當精闢。白尚德將龐雜的資料按時序與主題分類，構成一段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的歷史，此書也是目前少數幾本以他國旅者在台灣的故事作為主題，並稍微延伸其研究觸角與理論交叉的著作，對本文寫作方向有很大的啟發。

本文借助前人研究資料與方式作為基礎，試著進一步交錯使用不同人物所書寫的遊記，以事件為主軸，提出另一個關於 19 世紀台灣遊記本身的描述：以遊記作為分析主體，將區域史的某些部份細緻的討論，而非只是區域史的陳述。在書寫的過程中，將不同的故事重新疊回其歷史與空間位置，藉由事件的發生，重新思考當時的台灣狀態，並進一步的分析遊記中的視野，不只是給予單一眼光的評價，將遊記回歸其流動特性，展現動態歷史的可能。

• 旅人在台灣-分類資料

19 世紀的台灣是一個充滿折衝的世紀，清朝統治態度由消極轉為積極，1860 年代因天津條約的簽定，臺灣首先開放滬尾(淡水)與安平兩個港口，接著陸續開放雞籠(基隆)與打狗(高雄)等港口。這些港口的開放，除了商業貿易的驟增之外，亦有許多傳教士與探險家陸續進入台灣本島，直到 1895 年由日本政府接手臺灣管轄之職。上述幾個簡單的分期當中，可以發現台灣這個小島持續的進出著不同的人員，以及幾個政治分期，而十九世紀的台灣史也因此顯得相當紛雜，然而，在這些又散落又偏重的歷史書寫中，為了理解台灣歷史狀態中的多重複雜性，本文企圖標定縱軸歷史時間中的一小段(1860-1885)，把台灣原有的文化交會狀態，利用在此區域來去的旅人書寫，還原並探究當時空間深度中的文化複雜面。

旅行書寫因兼有遊走與紀錄/記敘的性質，故將之通稱為遊記，但因文章內容與性質有許多差異，使用前必須把這些資料回歸其原來脈絡，以免進行資料分類時，再度抹去其特殊性因此本文以語言分為西文資料與中文資料，以還原資料意圖本身為優先考量。清代臺灣的旅行書寫，可分為許多細項，包括調查報告、科學紀錄、官員報告(例如奏摺)、機構報告書(例如海關)、工具書(例如 guide book)，以及地方志、殖民地報告、報紙專欄等。本文所指的旅行書寫，主要以移動中、經過移動後，到訪異地的書寫記錄為主，重點擺在兩地之間移動過程，以及旅人經過移動後對異地的書寫。

這些書寫中，本文特別重視的內容，要算是身處異地的書寫者給親友的信件和個人日記等透露旅行困境與美好的感想式文字。這類吐露心聲的信件，成為旅行中的縫隙，不但說出旅行的痛苦以及異地和異文化對書寫者的衝擊，也成為

另一種歷史現場的見證。在此，本章將先概述西文資料，再進一步說明本文使用的西文與中文的研究資料，藉由這些不同的眼光，發現旅人們對台灣的不同描述。

根據福爾摩沙網站²²上資料的進一步統計，可以發現 1860-1900 年間出版，與 Formosa 相關文章和書籍占 19 世紀的大宗；其中 1860-1870 年間就有 96 筆資料，1871-1880 年有 119 筆資料，1881-1890 也出現了 149 筆資料，1895-1900 的五年間仍有 50 筆資料的出版，但到 1901-1910 這十年間，西方旅行者遊記及與描寫台灣相關的資料數量只剩下 15 筆，由於遊記與文章的出版年份可能非書寫當年，而是書寫後 1-5 年間出版，因此 20 世紀前十年的出版物也納入十九世紀與台灣有關的資料。這些不同的遊記分別以英、法、德三種語言為大宗，亦有幾篇荷蘭語、俄語的文章。其中英語資料的作者，大部分以英國人為主。而作者的職業，包括了傳教士、牧師、醫生、海關職員、領事長官、探險家、軍人、商人，以及遊客等，這些人在台灣停留的時間長短不一，多則數十年，少則數天。

除了台灣的遊記資料統計數字，將依照遊記內容再做分類。本文對西方遊記的分類，來自 Douglas Kerr 和 Julia Kuehn 編輯之 *A Century of Travels in China* 一書的啟發²³，筆者歸類此邏輯中不同性質的書寫，並將此分類應用於本文。本文依遊記內容與作者身分，將遊記主分為三類。

一是具有帝國主義性質與殖民眼光的官方檔案與書信文章，這類書寫的主要軸線是官員與帝國所賦予的眼光。官員利用自身視野書寫關於外交任務或其他行動，並在理解台灣的過程中進行文化判斷與評價，或作出物質性評論等，這些帝國官員與其他旅人相比，身處於相對西化(或者說生活模式類同於本國)的區域，而對通商口岸與租借地的描繪，或許可稱作在他國的西方式生活，與其他形式的旅行比較，這類遊歷相對而言「文明」多了。

第二種典型的遊記，可算是傳教士在進行傳教任務時所撰寫的文章。這類文章常以一種人道主義的角度書寫他國傳統習俗與規範加諸在女性或者整個社會生活的束縛，並試圖用實際行動進行救援，例如教育或者醫療技術的引進²⁴。教會產生的遊記資料，伴隨著傳教士們對特定地區的深入，以及傳教需要的各地遊歷，是理解清代臺灣的一個重要切面。

第三類則是企圖寫真他國，帶有各自目的的敘述性文字。這個類別可分為許

²²<http://academic.reed.edu/formosa>

²³Douglas Kerr & Julia Kuehn edited. *A Century of Travels in China: Critical Essays on Travel Writing from the 1840s to the 1940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²⁴然而，諷刺的是，在 *A Century of Travels in China* 一書中的傳教士之所以可以進入中國內陸地區，其原因都來自於條約的簽定：傳教士藉由不平等條約進入傳教地區，然後再以悲天憫人的角度觀看古老中國的各種生活模式。

多細項，例如實地探查記錄中，時常可見旅人對原住民的細部描繪以及其主要書寫對象；自然觀察家所寫的物種報告裡，除了動植物種類，也寫下蒐集物品的過程中，旅人與臺灣島民的互動細節；至於商人或者洋行雇員為了特定商業利益（茶、樟腦、硫磺...等）而進行的台灣調查報告，或者只是單純放鬆的遊客行程，以及不同媒材對他國的紀錄，如攝影家。這個類別的資料，凸顯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目的性與題材的裁剪。在眾多目的的寫作中，除了主要描述對象不同之外，其實都隱含了文化視野，以及十九世紀的台灣狀態，包括中國官員、漢人、生番、熟番、客家人等，在旅人分類中不同族群的關係與互動。

然因來台西方旅人時常具有多重身分，而無法完全按照上述分類明確劃分，故本文選用第三類-企圖寫真他國，以第一人稱作為敘事主體的遊記，以1860-1885年間在台灣進行探索的幾位旅人著作或相關譯著為主，作為主要討論資料，其中，包括必麒麟的回憶錄《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賊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²⁵、史蒂瑞所著《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台灣調查筆記》²⁶、史溫侯文章選輯《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台灣紀行》²⁷，以及約翰·湯姆生〈Formosa〉²⁸一文，作為主要線軸，勾勒當時台灣接觸帶的場景。其他資料則包括：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中的台灣詞條、1843-1980年間倫敦畫報中的台灣報導、《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以及《看見十九世紀台灣》等資料，用來補充概念中的真實畫面，說明接觸帶的多元性。

• 親身體驗接觸帶的旅人

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1840-1907)必麒麟，蘇格蘭人，曾任水手、中國海關檢查員、英國洋行職員、探險家、通譯，英國殖民地官僚等。第一次來台灣是1863年隨Maxwell海關稅務司到安平港來管理海關稅務，之後在安平、打狗一帶辦理稅務工作，時常利用空閒時間往台灣內陸村落探訪，幾年後從海關屬退出，進入洋行工作，因工作之便而更容易往外拓展公司業務與個人視野。必麒麟於1863-1870年間居住台灣，接觸範圍由高山原住民到府城最高階級的清朝官吏

²⁵Pickering, W.A.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and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98(中譯本有三，一為陳逸君譯，《發現老台灣》，台北：台原1994。一為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民文化，1999。一為陳逸君譯述，劉還月導讀，《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賊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10。)

²⁶Steere, J.B.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李王揆編，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出版，2002。(史蒂瑞原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台灣調查筆記》，台北：前衛出版社，2009。)

²⁷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台灣紀行》，台北：台灣書房，2008。

²⁸Thomson, John 攝影，《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Formosa from the earth and from the air 1871-2006*)》，臺北：Editions Rene Vignet，2006，頁32-78。

皆有，從他對台灣的探查與理解，甚至是不同語言的熟悉度判斷，或許可稱必麒麟是外國人之中最了解十九世紀福爾摩沙的台灣通之一。而必麒麟經歷了許多交涉與衝突的場景，並置身其中，雖不是事件主角，確是翻譯與溝通時不可或缺的主角。

例如 1867 年羅發號事件爆發時，清代官員劉明燈與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德，皆倚賴必麒麟幫忙，特別是漢番交涉的會議，必麒麟扮演重要角色。而 1869 年，李仙德再訪十八社頭目卓杞篤時，也邀必麒麟陪行。同年 11 月，北部洋行的船隻在東南海岸沉沒，而數名船客在豬磅束番社附近上岸後，卓杞篤亦通知必麒麟，請他南下幫忙處理善後事宜。必麒麟在番人、漢人官員，以及他國官員之間周旋，成功的讓 1867 年的臺灣恆春南岬地區的漢人與客家住民各取所需，派兵鎮壓的清軍將領有了不需攻打耗費人力物力的理由，並利用大量米酒技巧性的獲得原住民頭目承諾。這個事件充分展現了必麒麟的斡旋能力，同時透過必麒麟的書寫，接觸帶裡複雜又混亂的狀態則更為明顯。上述事件與必麒麟對台灣的各項觀察，除了展現必麒麟在十九世紀台灣所扮演的轉譯角色，也看見十九世紀的台灣裡，各區域的溝通不良狀態，以及透過縫隙所進行的斡旋。

另一方面，必麒麟的回憶錄出版，實際上有其政治因素，因英國曾錯失併吞台灣的機會，為引起英國內部討論，而出版的必麒麟在台回憶錄²⁹，除了英雄式的冒險歷程之外，必麒麟以帝國眼光檢視台灣島上的物產、人情風土，以一個介入者的姿態，帶著自己的文化背景與十九世紀的台灣衝撞，擦出許多火花。必麒麟的寫作動機與寫作內容，透過必麒麟的回憶錄，清楚的看見一個具有殖民眼光又好學多事的旅人滑動在接觸帶裡怡然自得的模樣，同時優遊於不同族群的縫隙其中，以及接觸帶裡具有厚度的空間感，和不同族群在文中接近動態的互動關係。

與必麒麟幾乎同一時其身處台灣的，還有英國官員兼鳥獸類蒐集紀錄者史溫侯³⁰，他在 1854 年通過英國外交官考試後，獲聘英國駐香港公使館臨時翻譯員，並在同年五月赴香港，學習一年華語，開始建立語言基礎。1855 年轉調英國駐廈門領事館，並學習閩南語。1856 年到台灣新竹停留兩周進行短期考察，雖說奉派密訪搜尋歐美船難漂民是此趟主要任務，史溫侯也趁機紀錄了台灣生物，1857 年與 1858 年兩度搭乘剛強號(Inflexible)環航台灣，對台灣進行物產與風土人情的探查，並於 1860 年 12 月派駐台灣府副領事。1861-1869 年於臺灣就任，其

²⁹必麒麟，資料參照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200。

³⁰史溫侯，資料參照陳政三，〈附錄一：郇和(Robert Swinhoe)生涯一覽表〉，《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台灣紀行》，頁 160-167。以及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14。

間往返廈門、香港、英國、臺灣等地，在台居住地點包括台灣府(臺南)、滬尾(淡水)、打狗(高雄)等。

史溫侯在台期間對台灣事物的興趣廣泛，時常踏查台灣各地，進行標本蒐集與物種調查，並在英國皇家各學會發表文章，其博物蒐集工作成效，或許早已超越其外交職務的績效。史溫侯的調查筆記詳細的紀錄了每個旅程的見聞，對於挑夫、苦力、嚮導等台灣島民的協助與貢獻也從不隱私。在這些筆記裡，總是可以看出史溫侯進行標本蒐集時，隱藏在主題背後的人際網絡與台灣物質描述，例如港口航線、貨品交易的情況、地方官僚的習性，以及當時的物質文化、漢人與原住民的相處，或原住民彼此間的互動等，重現了十九世紀台灣的空間感與複雜交錯的文化狀態。

和史溫侯一樣，對台灣博物有相同興趣的，還有史蒂瑞³¹。史蒂瑞並不屬於任何國家機構，作為一個美國籍探險家，史蒂瑞藉著親戚的贊助費用，自密西根大學畢業後便四處探險，他從南美洲開始，經太平洋到中國南部，從廈門搭船到台灣，以海路和陸路的方式，在六個月的時間內(1873年10月至1874年3月)，進行台灣西部的踏查、蒐集標本後，再往馬來半島、香港、菲律賓群島等地進行探索。結束旅行之後，史蒂瑞將這些動植物標本、各地民族器材與自然史學所需等物品運送回美國博物館進行研究，並回到密西根大學任教，退休後依然寫作不輟，是一個研究能量豐沛的學者。

史蒂瑞在台期間陸續在密西根州的安阿伯新報(*Ann Arbor Courier*)發表了一系列來自福爾摩沙的信件³²，這些信件是為了回饋親戚對其探險經費贊助而寫。至於史蒂瑞在台灣調查的半年中所撰寫的書稿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譯作《福爾摩沙及其住民》)則到2001年左右才被重新發現其重要性而重新整理出版，在這本著作中，史蒂瑞除了將其台灣旅程詳實記錄，也在其中整理了關於臺灣新港文書的資料。《福爾摩沙及其住民》一書內容主要分成兩部分、各六章，第一部份屬於旅行經歷，第二部份則是有關台灣的歷史資料，與當時台灣各族群狀況，書中也引用部分少見的報告，內容相當豐富。

史蒂瑞的寫作風格除了以第一人稱寫作之外，也時常可見作者本身對台灣風土的註解與評論，這些附註性的文句，成為筆者觀察史蒂瑞在台狀態與理解旅人處境的入口之一。而史蒂瑞在台灣的旅程依賴了各地傳教團網絡(包括天主教與

³¹史蒂瑞，資料參照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74-75；史蒂瑞原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台灣調查筆記》，台北：前衛出版社，2009。

³²史蒂瑞，〈來自福爾摩沙的信件〉，收錄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76-116。

基督教)的協助，因此也可看見 1870 年代台灣的傳教網絡，以及翻譯人員和其他助手的身影。其豐富的旅行經驗呈現了與其他旅人不同的旅行踏查筆記，透過這些細膩的書寫，對捕捉十九世紀台灣的樣貌、在台灣的旅人狀態，以及當時不同人群間的斡旋和交往情形有更深入的理解，而這也是呈現接觸區背景與人際網絡的極佳素材之一。

至於利用不同載具紀錄台灣的旅人，則以攝影師、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的約翰·湯姆生³³最為有名。湯姆生來台之前，曾前往南洋拍攝鄉野村落；並前往暹羅、深入中南半島的寮國、柬埔寨的熱帶叢林，沿湄公河抵達西貢，並在長時間的沿河航行中染上熱病。接著，又深入中國沿海與內地，進行了為期四年的旅遊攝影。有了這些經歷，十九世紀的台灣環境對湯姆生來說，雖有挑戰性卻也算不上是可怕的冒險之旅。

約翰·湯姆生在 1871 年 4 月來台，跟著馬雅各醫生從廈門一起搭船至打狗上岸，藉由傳教士網絡與其他助手的幫忙，與他的旅行夥伴—相機，一起見證了前往六龜的旅程，帶著約二十人的團隊，在十九世紀台灣進行拍攝與紀錄。在這趟旅程中，湯姆生拍攝了許多平埔族的寫真相片，並在拍攝筆記中詳實又趣味的描述了當時的經歷。另一方面，湯姆生對旅行所見之各種族群的描述非常生動，雖帶有強烈的主觀意識，並用自身文化評論其他異地，且不經意的在遊記中蘄露其文化優越感，但卻沒有過度的侵略性敘事。因此，從湯姆生的筆記中，可以看見不同文化交會時大英帝國的部分視角，以及接觸區住民的反應，成為理解旅人將旅途作為反映自身的材料之一。

上述這些旅人故事勾勒出十九世紀台灣裡的空間感，以及人際網絡的概況，和接觸區中文化碰撞過程裡的流動狀態，而中國旅人的陳述，則更能增加接觸區事件的歷史厚度，並進一步的看見接觸區事件發生時，原本的複雜狀態。本文將以西文資料作為主要敘事，以理論作為認識途徑，理解 19 世紀西方旅人在台灣的生活樣貌。

• 作為事件碰撞的會面點之一：清法戰爭台灣封鎖期(1884-1885)

從 1860 年代清代台灣開港前後到中法戰爭的台灣封鎖期之前，已有為數不少的旅人到過台灣，並產生對臺灣的眾多描述和評論，時至十九世紀後半，台灣印象形成某一種典型，而這個典型的建構就來自於曾到過台灣的外國旅者遊記。

1884-1885 年的北台灣(淡水基隆一帶)因中法戰爭的運作，法國對台灣北部

³³John Thomson 資料參照劉克襄，〈一具相機走台灣—湯姆生穿過月世界的旅行〉，《新活水》5(Mar:2006)，頁 76-82；劉克襄，《橫越福爾摩沙：外國人在台灣的旅行(1860-1880)》，頁 45-67。

進行了長時間的封鎖，當時身在北台灣的旅人或暫時住戶因延續台灣開港後的洋行與宗教機構，或將其發揚或者改進的緣故，所留下的紀錄與報導已相當成熟，旅人承接了前人對臺灣的觀察印象後，描述身處封鎖區域裡的大小事件，生動的堆疊出封鎖期間依然流動的生活狀態，透過遊記的比對，看見封鎖區中的縫隙。

由於戰爭的前置作業與科學觀測和實地考察的關係密不可分，十九世紀在台灣進行的科學觀測與考察等行動資料，成為中法戰爭臺灣封鎖期時重要評估依據，同時，旅人也發現所謂科學觀測的不實用性，以及當地突發狀況的影響力，例如天候問題、人際問題等，都成為戰爭時法軍所遇見的困難。因此，事件發生的同時期紀錄，便成為理解會面點的素材。藉著封鎖狀態內直接的衝突會面事件，除了陳述衝突事件的發展之外，也將其它遊記敘事中的隱形文化媒介和文化衝突搬上檯面；而戰爭使當時的北台旅人身陷資訊短缺、甚至與外界無法溝通的封鎖狀態，故旅人藉由信件流動透露封鎖期間封鎖區狀態與旅人情緒跌宕等描述，對縫隙概念的展演相當有幫助。

本文將以陶德(John Dodd)著作《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³⁴，以及法國小兵 Jean 的書信《孤拔元帥的小水手》³⁵作為主要資料，並參照馬偕在封鎖期時的日記《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³⁶，由於馬偕牧師大多居遊於臺灣北部，也經歷過中法戰爭的封鎖期，故其資料對該事件的分析，亦有幫助，透過這些資料觀察封鎖期間的在台外國人的處境。讓不同的旅人呈現不同觀點，理解戰爭中的接觸帶與會面點，並呈現多重視角下中法戰爭時北臺灣封鎖期的狀態。並以許文堂分析清法戰爭時的中國畫報資料作為對照，探討不同文化對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

• 研究方法：文化過度狀態、多樣書寫的陳述，以事件聚焦

旅行的過程中時常產生各種與陌生面對面(face-to-face)的情況，但會被特別記錄下來的並不多，在無法完全掌握各種情況的場景中，旅人真正的與他者遭遇(encounter)，這個遭遇，並非單純指涉當下的交會，而是旅人遭遇他者時，將自己的文化土壤帶往他方的潛意識行為。旅行者透過穿越疆界、橫跨海洋和時刻存在的新鮮感與危機感，確認自己的真實存在，也反映了該時代不同文化的衝撞以及旅行地當地的強韌與自身文化的高尚，以此界定它者。至於界定的標準，則來

³⁴John Dodd 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台北：原民文化，2002。

³⁵Jean L 著，鄭德順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亦有另一版本 Stephane Ferrero 著、帥仕婷譯，《當 Jean 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1884-1885)》，台北：玉山，2003。

³⁶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前衛，2007。

自於差異與陌生，而疆界則會被設在個人熟悉極限的邊上³⁷。

所謂「熟悉的」事物其實有線可循，以旅者對物質的敘述作為基點，或許是對比出發的國度、或許是以科學標準作為判斷。旅者常在異地進行對物質的讚嘆或抱怨時，顯示自己所在的文化座標，並在旅行中所產生的感想和紀錄裡，將雙方(自己與他者)的文化差異一次又一次的寫下，而遊記也因此成為兩個文化之間的過度狀態指南。

旅人在遊記中對他者的描繪，一再的顯示旅行者對文明和自然的觀念來自何處；而雙方的衝擊和相互理解或者不理解的結果，例如對法律、交易，以及人情網絡的動員等理解，也透過事件發生的過程得以發生。旅人記錄了這些過程的某些片段，讓這些片段成為他者文化與自我文化的對比，並寫下接觸區中事件發生的動態記錄。這些遭遇的場景，本文使用 Mary Louise Pratt 所使用的 contact zone(接觸帶)做為觀看資料的方式。

Pratt 認為這個場域的人們帶著自身的文化與生活環境而來，彼此碰撞，並建立一個持續的關係，而因為殖民所以這些關係通常混雜著脅迫、高度不公平的、不可避免的衝突以此繼續，因此 Pratt 將接觸帶這個詞彙作為殖民地中權力與文化不對等的兩造，處於不同高度位置的交會的描述³⁸。而十九世紀臺灣的處境，與殖民風潮下的殖民地相去不遠，身為遊記書寫者的旅人因當時的殖民動機或潛在的時代給予，而在遊記內容中強調這些衝突的發生過程，因此能夠特別凸顯接觸帶中，旅人與陌生環境遭遇時所產生的碰撞力道。而這些碰撞的事件及其中附帶的文化視野，則成為理解接觸區的最好例子。

透過事件，讀者們可以較為集中的看見不同勢力如何妥協；或者如何相處，如何各取所需。接觸帶裡發生的事件，成為理解該區域實際狀態的其中一個縫隙，而這樣的縫隙使動態歷史成為可能。另一方面，書寫者處於疆界與疆界之間的流動狀態，而處於移動狀態下的書寫，反使疆界更加凸顯：一如限制之所以被感知總是來自於跨越時的警鈴聲。作為填補力量作用縫隙間的填充物，遊記中紀錄的事件，成為身處縫隙間的真實演繹，「過渡」這個持續移動狀態，更是討論旅行與歷史時總是被忽略卻無法不提及的核心。然而，遊記除了移動之外，其文類特性之一便是充滿許多瑣碎而零散的片段，本文則將這些片段做為旅人與他者遭遇的會面點，以此作為接觸帶中更精確的事件描述觀點。

至於會面點(Meeting point)概念來自鄧津華著作《想像臺灣：中國殖民旅行

³⁷ Islam, Syed Manzurul. *The Ethics of Travel: from Marco Polo to Kafka*. Lond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62.

³⁸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p.6.

書寫與圖像(1683-1895)》後記³⁹一文，作者建議使用會面點 Meeting point 作為歐洲與中國各自殖民論述的交會中介點，意圖提供一個替換模型給歐洲/中國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使用⁴⁰，並說明會面點概念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它提供一個普遍理解下的殖民主義邏輯，相反的，會面點概念打破了殖民主義原本的架構。鄧津華認為若要對殖民主義進行批評，必須將殖民關係放到文化霸權的框架下討論，尋找肇事者並不足夠，而是企圖讓讀者理解殖民主義和殖民主並非專屬於歐洲，而被殖民的也並不只是歐洲以外剩餘的其他地區⁴¹。

與鄧津華對會面點概念應用不同，本文無意將此概念重點放在殖民主義的架構分析與拆解，而是挪用會面點中對於歷史動態與細節的關注，與跨越疆界時的文化關係，理解清代台灣在事件當下如何被理解，以及西方社會如何書寫當時的臺灣。並以 1884 年-1885 年清法戰爭時的北台灣封鎖事件作為歷史現場的會面點，藉由事件中不同觀點的交叉比對，試圖理解當時於台灣北部所進行的不同生活，並試著從歷史的動態中陳述事件的複雜向度與多重性質。

藉由上述資料與觀點的協助，本文將使用十九世紀的臺灣旅行史料，透過接觸帶、接觸媒介、接觸事件等多重視野，並使用它者、文化視野、類殖民狀態等概念深入史料，企圖貼近十九世紀台灣在視野交錯下的動態感，並重新看見殖民脈絡下屬於交會點的活力。

³⁹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p,249-p,258.

⁴⁰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p,255.

⁴¹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p.257.

第二章 見或者不見-文化他者概念

誠如 Tim Youngs 在《19 世紀的旅行書寫：填補空白地帶》⁴²(*Travel wri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illing the blank spaces*)⁴³一書序言所說，旅人帶著自己的文化包袱前往異地探險，且旅人在海外所進行的文化擴散行為，實際上回應了旅人所處文化中心的需求，因此，旅行、知識與帝國主義之間的交互作用，使遊記並不只是單純的紀錄文字，反而根據作者的性別、階級、年紀、國籍、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等背景差異，具有各種不同的偏見與刻板印象，並成為旅人自身文化的參照點之一；而帝國調查、前人紀錄等資料，同時影響了旅人建構觀看他域的方式，使遊記不可能是純然客觀描述旅行經過的文學作品。⁴⁴

至於影響 19 世紀旅行書寫的重要因素之一，T. Youngs 認為與英國殖民地的擴張有相當大的關聯。英國殖民地的擴張與隨之而來的殖民擴張風潮使地球各處被經驗、紀錄、報告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越來越多的旅行者與探險家使各自的旅行經驗成為帝國報告書的內容之一，帶有擴張意味與文化優越感的旅行文本亦所在多有。因此，身處殖民風潮下的遊記像是一面觀看非歐洲地區的扭曲鏡子，這些地區接受了殖民訪客與征服者，並產生了許多犧牲者。⁴⁵而讀者亦可從遊記內容中發現 19 世紀在台灣的西方旅行者對自己盡情、盡力捕捉這個落後、野蠻、有趣的島嶼的樣貌的描述。

這些旅行因宗教驅使，或其他各種使命下所形成，遊記也經篩選後各有用途，無論是用來填補非歐洲以外的空白知識大陸(即便這些區域早有其文化)、或是偽裝成客觀角度的主觀書寫，旅人所選擇的筆記內容包括與島嶼相關知識、島上居民、物種，以及任何對其任務目標有助益的事情，就某個理解層次而言，19 世紀在台灣的西方旅人不過是盡責的執行任務，且在寫下島嶼記錄時，絲毫不掩瞞自身的感受。然而，這些遊記除了正面透露出的殖民意圖外，還可從旅人的敘事中，看見他們對不同島民的刻板印象。這些援引各方的印象加上旅人的實際經驗，除了更新旅人與讀者對造訪地的看法之外，實際上也再次加強了原先的刻板印象。

一如薩依德在東方主義裡對東方學專家的批評，旅人以類似文件化閱讀的方式，透過先前資料與其他資訊理解台灣。⁴⁶但實際上閱讀 19 世紀西方旅人的台

⁴²作者自譯

⁴³Tim Youngs edited. *Travel wri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illing the blank spaces*. London;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06.

⁴⁴Tim Youngs edited. *Travel wri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illing the blank spaces*. p.2 ,p.13.

⁴⁵Tim Youngs edited. *Travel wri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illing the blank spaces*. p.5.

⁴⁶參照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立緒文化，1999，頁 103-132。

灣筆記後，可以發現許多充滿生命力、令旅人震撼的環境因子與風土民情環繞的場景，這些旅程甚至超乎旅人的想像。因此，西方旅人筆記中的 19 世紀台灣與島民們除了被矮化、低估、浪漫化的刻板印象之外，也以多元、具有豐厚生命力的方式存於旅人筆記中，而非薩依德敘事中認為東方學專家們所蒐集的單一、扁平，沉默而缺乏回應能力的東方狀態。

本章將隨著旅人將未知島嶼具象化、並將之再現的行動，作為建構真實的技術(或證據)的過程當作背景條件的處境之填補知識空缺的行為中，觀察其筆下的 19 世紀台灣島民，並分析遊記中被旅人以物種紀錄式的平面敘事方法、用旅人熟知的文化性、知識性等不同觀點，將之區分成值得觀看與不值得觀看的 19 世紀台灣島民此一現象背後，因承接不同刻板印象而來的文化他者構成狀態，並討論西方旅人對他者的多重文化邊界被設在何處？而他者的多重性又是如何被詮釋？同時也試著回應薩依德於東方主義中對他者單一性的假設，並在旅人敘事中，看見對身處 19 世紀台灣西方旅人而言的多元他者。

• 西方旅人可能握有的十九世紀台灣圖譜

根據 T. Youngs 的說法，自 1830 年代起，歐洲因工業與經濟資本主義的需求，將科學用於跨國擴張，便產生許多具有國家需求或科學探測的旅行，而這些旅行遊記也因此成為所謂帝國中心及其周圍區域的連結方式。⁴⁷因此，19 世紀的台灣對他國旅人來說並非是完全空白的知識區塊，相反的，旅人往往在其書寫中與前人資料比對，藉此進一步理解與呈現當時的台灣狀態，透過這一來一往的書寫校正，19 世紀的台灣在他國探險者的圖譜中已佔有一席之地，亦對台灣的各項資訊有了基本掌握，相關的報導和說明也不在少數。

以英國為例，1889 年所出版的第九版的大英百科全書中，在詞條福爾摩沙 (Formosa)⁴⁸一文中，可以發現作者韋伯斯特本人並沒有到訪過台灣，而是撰稿時運用資料，尋找線索來描繪當時的台灣。韋伯斯特利用的資料包括荷蘭傳教士 (Candidius) 與大員官員 (Coyet) 的著作，以中國方志的英文翻譯作為歷史脈絡的概述鋪陳，並使用 19 世紀晚期的官方報告(如海洋測量書、領事報告、商業統計書等)描繪當時台灣的政經狀況。同時參考學術論文(包括自然史學、地理學、民俗學家等)和旅人遊記文章，企圖呈現一個具客觀性、科學性，且生動易讀的文章。

⁴⁷Tim Youngs edited. *Travel wri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illing the blank spaces*. p.7.

⁴⁸Webster, H.A. "Formosa." Pp.415-418 in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A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vol.20*. Ninth edition. Edinburgh: Adam & Charles Black, 1889.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303-309。

「本世紀早期，歐洲人對此島的認識，主要來自在其海岸發生的船難」⁴⁹，這便是韋伯斯特處理台灣史時所切入的路徑，他以不同於中國理解台灣的角度詮釋台灣史，在大事件之間夾雜著西方人(如葡萄牙人、荷蘭人等)與台灣的關連性，藉著(英國)讀者較為熟悉的人種、機構與台灣的關係的變化過程將台灣歷史納入西方的歷史記憶，這樣的敘事同時縮短了文章讀者與台灣的距離感。在這個詞條敘事裡，作者對台灣的地貌與物種的詳細描述，顯示資訊的完整，而類似的科學數據紀錄在十九世紀的旅行書寫中亦時常可見。由此反推，在十九世紀後期對台灣有興趣的讀者或旅人，也必然將化具有科學知識性質與探索特性的台灣印象納入自己的知識版圖中。至於詞條裡關於島民的內容，則將台灣島民主要分為三類：中國漢人、被征服的原住民(平埔番)，以及東部未開化地區的原住民(生番)。在詞條敘事中，前兩者的陳述句子非常短，整段重點著重在對生番的分類與描述，由此可知在十九世紀的英國知識界中對台灣的漢人與平埔番已有某種程度的理解，以致無需贅言，而生番則是當時尚未開發的一塊，他們的神秘與未知捉住了寫作者與讀者的目光。

另一方面，台灣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報章上亦相當活躍，從 1843 年到 1890 年倫敦畫報中出現的 13 篇台灣報導內容，就可看出英國對台灣這個小島的興趣起因於英國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而在台灣海岸屢次出現的船難與船員遇難事件，也讓英國有了理解台灣的機會。1859 年的兩篇文章都是倫敦畫報特派記者到台灣調查中國風俗時的經歷，以及台灣島的物產和恐怖的生番傳說；1865 年的一篇文章以史溫侯發現的雉雞為題，讚美史溫侯對博物學會的貢獻，並展現出大英帝國知識填充的動力；1867 年的文章說明英國在美船羅發號(the Rover)事件之後到台灣進行砲擊的事件；1884 年的兩篇文章中，一篇以台灣地形概論、重要港口(安平、打狗)的概述為主；另一篇則是說明中法戰爭期間孤拔在北台灣的概況、並分析了雞籠與滬尾兩個港口的優缺點；1890 年的 6 篇文章則是與史溫侯同期在台灣的中國海關事務專員於打狗居住時的札記和遊記的分批刊出。

這些標題下的福爾摩沙描述重點大多是台灣地形的戰略性、物產、氣候等基本認識，而透過特派記者與外地回傳的旅人遊記文章也可發現這些英國紳士們與台灣島民的遭遇經驗，大多建立在「不一定和善但有其文化的漢人」、「美麗的平埔番」，以及「野蠻的生番」這三個主要分類。值得一提的是，19 世紀英國認知中對台灣島民進行分類的方式，同時也是清代中國用來分類臺灣島民的項目：「人」、「熟番」、「生番」。根據鄧津華的說法，生熟番的區分取決於該族群被清代中國文化影響的程度多寡，且生熟番的區分實際上具有轉移力，該時期的生番

⁴⁹Webster, H.A. "Formosa."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308。

可能成為下一時期的熟番⁵⁰，而這個看法又與西方旅人判斷 19 世紀台灣番人的續存或消解的方式類同，因此或許可以推斷英國對 19 世紀台灣的基本認識資源，除了 16、17 世紀的西班牙、荷蘭，與其他旅人之外，也可能包括中國書籍，或是旅人到中國進行探訪時透過當地人所得知的結果。

除了對中國的基本掌握之外，西方旅行者，特別是生物學、博物學等研究者也因承接了西方生物學的分類系統知識，在異地竭盡所能的對當地物種與自然環境的精確描述，一如吳明益所言，十九世紀後半葉的自然寫作者—「博物學家與探險家到世界各處旅行，等於是拿著林奈氏建立的分類系統的標尺，遠赴世界各地為生物歸類」⁵¹。經過生物科學的發展，西方旅人藉著前進異地進行觀察的機會，將他域的人種、物種全數納入西方知識系統中。這些文章的濃縮展現出作者本人，或者當時的英國讀者對臺灣的普遍期待，台灣儼然成為一個自然博物學家的理想之地—一個填補帝國知識空乏區塊的島嶼，如同必麒麟透露出當時西方科學旅行者的企圖所說：「這座島上也有無數罕見珍貴的植物，我相信范區(Veitch)先生和其他熱心的植物學家，已蒐集不少台灣高貴蘭花和裝飾性植物，豐富了大英帝國的溫室」。⁵²

因此，十九世紀後半葉前往台灣探險的旅人並非偶然，而史蒂瑞在《福爾摩沙及其住民》的序言中透露自己於 1873 年 8 月抵達香港轉往菲律賓群島探查之前的等信期間，選擇前往進行調查與蒐集的地區時所做的決定之內在動力，以及超乎想像的收穫：

我四處物色，想找一個適合探險、收集自然史博物的地方，最後我決定到中國的福爾摩沙島走訪一趟，至少到當地已充分開發的地區看看。沒想到福爾摩沙是一個進行科學收集的嶄新天地，我得以深入內地，探訪眾多的原住民部落。⁵³

本章將沿著 19 世紀東西方文化中對台灣島民的分類，分別挑出混雜於西方旅人筆記裡的漢人、平埔番與生番等三類敘述，作為討論西方旅人界定不同群體的台灣島民所屬的「不同程度的他者」，以及這些不同他者在旅人劃定其文化疆界時所產生的影響。

⁵⁰參照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p.122.

⁵¹吳明益，《當代臺灣自然寫作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頁 44。

⁵²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62。

⁵³史蒂瑞原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2009，頁 31。

第一節 「漢人呀漢人」

十九世紀的外國人在台灣的旅行，由台灣在地旅行團隊兼負起外國旅人的生活所需，卻無名，讓旅人們寫出一個又一個看似單槍匹馬、英勇前往冒險地的敘事。這個現象來自於旅人比起平埔番或生番的生活狀態而言，漢人生活習性早因外國旅人與清代中國的接觸，而顯得熟悉。19 世紀在台灣的漢人風景，對旅人而言，有一個基本的對照組，這個對照則來自於旅人的中國經驗。一如白尚德在《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中所綜合的外國旅人在當時對台灣的簡述：

在島上，外國人住在打狗、基隆或淡水的大港口裡面。最大的打狗港被看成：『歐洲人的教化影響之下，成果豐碩的地方』。一艘郵輪每三星期往來打狗和廈門之間一次，可是島上的生活與香港舒適無憂的相比有天壤之別：哈特說：『遊客只有經過福爾摩沙開放給外國的通商口岸時，才會略作停留，他們顯然有很充分的理由不喜歡這個島嶼，而且避之唯恐不及』。他解釋說，那裏的生活對尋找奇遇的旅行家來說，不但愁悶且令他們失望，因為在此世紀中葉，島上尚未開發，城市很少，其他地方都是叢林。至於中國房屋，它們『不但有礙觀瞻，味道也難聞』。消遣的地方很少，既無豪華的商店，也沒有賽馬場，更沒有香港英人的俱樂部。⁵⁴

既然 19 世紀的台灣對於歐洲旅人而言缺乏文明與娛樂的吸引力，而十九世紀在台灣佔人口多數的漢人，也不屬於值得觀看的風景，那麼旅人筆記中的台灣漢人是什麼樣的存在？而這些屬於另一種文化的人們，對旅人而言是否夠文明？又或者，漢人的文明邊界被劃定在什麼地方呢？

(三) 那些不提也罷的漢人

史溫侯因進行福爾摩沙的巡島訪問，在 1858 年六月中旬經過打狗(今高雄市鼓山區壽山)時，在港口附近進行散步似的觀察，他仔細的描述了港口附近的房屋、街景，以及工作中的人們，「至於附近的打狗市，因經常有外國人去訪，大家多已十分熟悉，實無需多談了」。⁵⁵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必麒麟用來形容台灣府的時候，他認為「台灣府(今台南市)是個典型的漢人城市，和中國各地的城市比較起來，相差無幾」。⁵⁶至於什麼是典型的漢人城市呢？史蒂瑞在 1873 年年底前往淡水拜會馬偕牧師的路程

⁵⁴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頁 63。原資料來自 E. Raoul, *Les Gages Nécessaires*, Brest, 1885, p.94。

⁵⁵史溫侯，〈福爾摩沙島訪問記〉，收錄在《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21。

⁵⁶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57。

中，他「穿過漢人市鎮陰暗狹隘的街道」⁵⁷，走了好一段路才抵達馬偕住所。而這些陰暗狹窄的街道並不只出現在市鎮中，郊區亦然，史蒂瑞認為「漢人本質上喜歡住在市鎮」⁵⁸，即便他們需要耕種，但總會在夜裡回倒市鎮，跟美國農家住自己田地上的習慣完全不同。

在旅人筆記中對漢人道路與市鎮的描述，大多是擁擠、味道難聞的、狹小、彎曲而不夠筆直的道路，至於通往其他城鎮的道路則更不用說，史蒂瑞在進入嘉義市區之後，對於該區域的描述則可以理解旅人的抱怨：「嘉義市遠在近山腳處，除了步道外，沒有小道或其他交通方式。為何仍有如此多人聚居該地，實很難以瞭解」。⁵⁹對漢人建物的評論除了道路之外，還包括城牆，以史蒂瑞進入嘉義城為例，以磚和石頭築造的十分牢固、圓周數英里的圍牆，雖有兩層牆門，「但並沒有大砲保護，也無抵禦大砲的措施，跟中國人幾千年以前的建蓋的城牆沒什麼兩樣」。⁶⁰在這個評論中，史蒂瑞很直接的點出他所認為的落後，而這便是另一個旅人對中國文化的印象：不合時宜。

除了難以步行、容易迷路之外，道路也常因盜匪或番人的攻擊而無法通行。就如必麒麟與同行友人穿著中國式服裝，從台灣府前往嘉義的路途，便受到盜匪的干擾，在一片風景富饒的平原中，「只有人是壞的——簡直壞透了！村民幾乎都在從事宗族械鬥，或是做強盜。每一個村莊四周都種高大的竹子，形成一座難以攻破的藩籬，僅留兩扇大門，作為出入口」⁶¹，同行的僕人和苦力都因害怕盜匪，非常想離開，卻又怕落單更加危險，因而繼續同行，路上的其他村民也期望藉著外國人的保護平安進入嘉義。

從必麒麟對穿越平原時所行走的大路的形容，便可以知道對旅人而言，這樣的大路並不合格。「說它是『大路』，不過是客氣的說法，事實上，這只是一條粗糙的花崗石板路，隨意地鋪在稻田中的田埂上」⁶²。除了對街道的不滿意之外，在這場盜匪遭遇戰的過程中，必麒麟也寫下部分的 19 世紀的台灣漢人性格。隨著面對強盜的時刻越近，隨行的苦力與嚮導便更顯得不安，他們「說前面就是最剽悍的強盜巢穴，身上的衣服一定會被剝光」，「從茅港尾尾隨在後的漢人，放下

⁵⁷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29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99。

⁵⁸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24 April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79。

⁵⁹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24 April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0。

⁶⁰同上。

⁶¹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73。

⁶²同上。

重擔，不肯再走。僕人和苦力在我們的軟硬兼施下，勉強跟隨，到了距離那些武裝的人不到兩百碼時，他們卻躺在地上，大聲嚎哭起來」⁶³。

由於治安不穩定，隨行的嚮導與苦力對於面對盜匪的恐懼，來自於身家財產的被剝奪。除了隨身財物的損失，若衣褲被剝光，隨之而來的羞恥與被嘲笑，則更讓漢人感到害怕。然而，這樣的擔心對必麒麟來說，是多餘的，甚至算不上損失。在這裡展示出西方與中國的不同價值觀，不只是物件上的，還包括道德(羞恥感)與社會氛圍的差異。

當村落的壯丁湧出，準備進行攻擊時，必麒麟與隨行友人倏的摘下斗笠與頭巾，露出淺色頭髮，而這些強盜也因此受到驚嚇而鳥獸散的逃回村子。而剛才躺在路上哭的「僕人和苦力以及其他同伴又聚在一起，大聲嘲笑我們剛剛的糗模樣」。⁶⁴必麒麟在這個驚險場面中，呈現英雄的姿態，拯救了所有的人。他所使用的方式是露出不同的髮色，除了勇氣之外，還能隨機應變，在此可以發現必麒麟非常理解漢人懼怕的事物為何，也才能順利的解除危機；而這些漢人態度的馬上改變，實則也是極其真實的描述。

另一個在旅人筆記中也相當重要的漢人形象，則是漢人們為了求生存而不擇手段的賺錢方式。史蒂瑞在 1874 年與打狗商務處的友人想趁中國新年前往野蠻人生活處探險的旅途中，通過幾個小鎮時，敘述了漢人的狀況：

城市裡充滿著銅鑼與鞭炮的噪音，還有和人所能製造的各種震耳響聲。他們在準備次日中國新年的節慶活動。大家都在慶祝新年。真不可思議，我們居然買不到任何食物。這大概是一年裡唯一的節日，漢人因太忙而不想賺點蠅頭小利的。⁶⁵

史蒂瑞以諷刺的語氣說明，大部分的漢人以超乎旅人想像的頻率，將整年的生活都奉獻在工作上，以賺取金錢。另一個例子則是史蒂瑞在澎湖進行珊瑚交易時所發生的，「雖然風仍很大，海水又高漲，可是這些漁夫每個人都會為了一點現金而潛入大浪中，給我帶來活的珊瑚」。⁶⁶在這段敘述中，讀者可以發現史蒂瑞對於金錢的度量並不同於漢人，漢人熱愛賺錢、缺乏休閒的生活方式成為旅人輕視漢人文化的原因之一。而在澎湖目睹島民打劫船難的事件，則讓史蒂瑞有了

⁶³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74。

⁶⁴同上。

⁶⁵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3 Jul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10。

⁶⁶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2 June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07。

更深的體悟，與更深刻的諷刺：

漢人島民，天性就是打劫者與海盜。有值錢的船貨四處漂浮時，他們會覺得去救人性命是件蠢事。我在西嶼時就見到他們這種很現實的脾性：一天，我見到許多人匆匆搶上自己的船去，帶著錘子與斧頭，跟其他這類的工具。詢問之下，發現是棲息在島上較高的望哨帶話來，說岩石上有艘翻覆的帆船，有人與船貨落在水裡。他們以其可笑的小船，從四面八方向那裡聚集，就像禿鷹見到腐肉一樣。⁶⁷

由此可知，19世紀的西方旅人已有人權和現代法律的概念，然而在19世紀的台灣，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這些事件讓旅人理解了台灣漢人的封閉與落後程度。此外，這些漢人對尊重的理解，也跟旅人所認知的不同。當史蒂瑞在舊城（今高雄市左營區左營）的李麻牧師傳教所休息，對此極為感激，慶幸自己可以「避開一群好奇的漢人。他們一般極為大膽，人數又多，所以就隱私來說，還不如就在大街當中吃飯睡覺」。⁶⁸ 漢人的好奇心，對西方旅人而言似乎成了騷擾與乞討，這在其他旅人筆記中亦時有所聞。

至於具有官職的漢人，或是鄉紳，在面對外國旅人時，則時常拿出最具有中國文化代表性的物件與姿態，並用最好的食物面對這些漢人眼中的西洋蠻子。例如必麒麟在秀才家被招待的饗宴：

晚宴安排妥當了。餐室中有好幾張方形桌子，我們被安排在上位，其他士大夫、親屬和地位較高的侍從，依序作在適當的席次。整個安排，頗有封建時代的氣息。食物方面，有一頭肥美的乳豬—相當於我們宴席中的牛或羊的腰肉。還有魚翅及其他美味珍饈，佐以紹興酒和米酒。這場宴席費時良久。餐畢，大家又回到大廳，舒適地抽著菸、啜口茶，再聊些奇異的風俗。⁶⁹

類似的宴席，在史蒂瑞筆記中也可看見，他描述那是一戶位於彰化市附近、與「野蠻人」臨界的、雖然吸食鴉片卻有大片地產與瞭望台，而且好客的地主家：

他請我們享用了一個真正的中國晚餐。有十二小碗或更多的魚，肉、禽肉，配上蔬菜，用多種方式來烹煮。他跟我們一起坐下來，十分客氣，凡他認

⁶⁷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2 June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08-109

⁶⁸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5 June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03。

⁶⁹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79。

為特別好的，就撿少量放在我們的碟子裡，用他自己的筷子來夾送。⁷⁰

在這兩場宴席中，招待旅人的漢人都像是要展示自己的文化性那樣，以最繁雜的中國禮節，和從容高貴的漢文化相待。而這些飯局所碰出的火花，並不止於餐桌上的應對進退，還包括了主客兩造都認為自己居於文化高位的立場與他者的異文化交會。

(四) 奇怪的漢人思維

然而，漢人與西方旅人各自帶著文化高度與野蠻人交會時，最大的差異來自於文化思考邏輯，而這些交會時所產生的差異，則再次加強彼此的刻板印象—奇怪的漢人、野獸般的西方蠻子。

例如必麒麟秉持著一向的自信，穿著「獨特、耀眼，但經長途旅行而沾滿泥土沙塵的服飾」⁷¹參加餐宴，並在用餐完畢後，移往大廳與招待他們的中國秀才聊天時，所擦撞出兩個文化之間的差異：

這些漢人，對於英國的地理完全一無所知，所以認為我們是蠻子，來自野蠻世界中貧困的鄉村。在漢人心中，唯有天朝皇帝統治的區域才有文明，其他的世界—如果還有剩餘可憐的部分，都是未開化的，屬於「蠻子」的故鄉，而非「人」的家鄉。他們客氣的質疑：蠻子有智慧嗎？有能力做事嗎？我向他們解釋水蒸氣作為推進器的奧秘，並談及機器發明。不過，他們完全不當一回事，儘管其中有人看過或乘坐過汽船，但他們認為那不算什麼，難道發明那些東西就算擁有「人」的智慧嗎？這些新奇的東西，不過都是機械性的。當我談到星辰和西方科學的推論時，才又引起他們的興趣，我還引用中國的四書五經，很得他們的讚賞。⁷²

身處中國文化氛圍下的英國旅人企圖向在台灣的漢人紳士解釋世界圖像，然而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漢人紳士，則以輕視的口吻質疑英國蠻子。而這個討論實際上並沒有聚焦，相反的點出 19 世紀時，這兩個文化核心的不同：當必麒麟討論蒸汽機時，背後代表的科學所引起的技術革新；而中國秀才提出「人的智慧」卻是著重於道德與精神層次的存在。

至於漢人對西方旅人的想像，則從漢人認為西方人因為是蠻子，所以應該能與野蠻人溝通可以看見。史溫侯從山區返回青潭坑(Chin-tam，可能位在今新北市

⁷⁰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22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96。

⁷¹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77。

⁷²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79。

新店區)的農舍住宿時，便感受到他所認為的漢人的無知：

晚上我被主人的鄉下表親包圍。他們多半都能說些「野蠻人」語言的時會，一直用這些詞來煩擾我，還奇怪我為什麼不懂。他們說所有的番人應該都有相同的血緣，自然應該說同樣的語言。顯然在其有趣的自欺裡，把世界看作為住滿番人和卓越的人(即漢人)，後者當然占了絕大部分。我曾數次想試著告知他們一點有關歐洲國家的訊息，看到他們不信地微笑，我內心想：「或許無知是福吧，」而讓他們繼續沉湎於那無害地信口漫談裡。⁷³

史溫侯看似寬容的態度，實則隱含著高度的文化自信，而這批處於西方科學知識更新與填補風潮下的旅人，對台灣漢人渾然無知的情形，甚至提出了某些建議，例如史蒂瑞提出應將西方學科引入台灣的想法：「地理、算術，及其他對我們來說很普通的那些學科，在漢人之間卻是未知的。羅馬拼音的白話文是教這些學科的很好媒體，但目前尚無教科書譯成此語言的」。⁷⁴而對漢人知識分子的無知，史蒂瑞甚至認為，「中國文人對歐洲和歐洲的知識卻極為蔑視。他們似乎正是妨礙其國家享有現代進步的階級」。⁷⁵

然而，令外國旅人訝異的怪異中國思維不僅於此，擁有台灣通之稱的必麒麟在台灣府(今臺南市安平區)海關的對面人家所見識的殺女嬰風俗事件，讓中國與西方的差異更加凸顯。必麒麟在安平海關對面的一戶漁民家製作竹筏模型時，聽見隔壁擁有奇怪名字的女娃哭喊，進而發現漢人對女嬰的不友善行為：

突然從隔壁鄰家傳來尖銳的「媽梅」(Ma-beh)的呼喊聲。「媽梅」意為「祖母要我」。這名字很奇怪，但我並未發問，而那呼喊聲還是不斷地傳過來。漁民的太太抬起頭來，笑著問：「媽梅又作了什麼好事了？」我趕緊發問：「媽梅是誰？」「難道你不認識媽梅嗎？他是對門博仔(Pok-a)的女兒呀！」「那她為什麼叫媽梅？」女眷們相視而笑。最後，那位寡婦解答了我的疑問：「那是因為媽梅剛生下來的時候，產婆正想捏死女嬰，她的祖母大喊留住她，於是大家便叫她媽梅了。」

原本必麒麟以為殺嬰這個風俗只發生在窮困，或染有鴉片癮、賭錢或酗酒的人家身上，但漁夫的寡嫂則面色莊重的回答：

⁷³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 Bell, 1863.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福爾摩沙民族學記事〉，《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41。

⁷⁴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6。

⁷⁵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29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00

這裡也有這種風俗。我們只殺女嬰，我自己就曾經捏死過兩個，只留兩個女兒。女孩子麻煩多，沒有多大用處，長相難看的話，又不容易找到丈夫，一般人供養不起她們的，我又不願賣女兒為奴，只好在女嬰意識尚未清楚之前，將她們揪死。⁷⁶

必麒麟憤怒的回應這個想法，認為殺嬰的風俗「連禽獸都不如」，並提出自己國家的例子，說明女孩在英國是討人喜歡而獲得寵愛的。但漁夫家的老祖母只以輕蔑的口吻回應必麒麟：「你們這些紅毛蠻子哪懂道理，不管怎麼說，女孩家就是沒有用處」對老祖母而言，兒子才是人生的依靠，而這些跟她本人一樣身為女性的媳婦和孫女，「她們除了吃喝之外，還能做什麼事！」⁷⁷當必麒麟更深入台灣各階級的漢人生活時，「發現殺女嬰是如此得頗為普遍的習慣，即使是富裕的人家也一樣。據說這風俗是由中國傳入台灣的，台灣原住民(無論是「生番」還是「熟番」)對漢人這種不人道的行為深感厭惡」。⁷⁸必麒麟對此風俗的不認同，在此顯露無疑。而中國社會對女性生存條件的考量，顯然必麒麟完全無法體會，更甚者必麒麟將島上的另外兩個族群生番與熟番對殺女嬰的看法提出，作為自我加強的證據之外，或許還隱含著貶抑漢人價值觀，以及漢人文化裡的野蠻連番人都無法接受的引申意，而這同時成為西方旅人用來理解自我與他者差異的路徑與對比方式之一。

台灣漢人所展現的世界觀，與西方旅人所理解的世界圖像完全不同，而這也是西方旅人進入中國時的縮影，西方旅人在並不完全理解漢人的處事規則與社會運作模式的情況下，以教導、告知等心態，站在一個所謂的文明高度，試著與無知而愚昧的漢人溝通。這也是西方旅人進入中國與台灣時，時常以文明自居的緣由—這群和西方不同的、落後的他者，需要被改變。然而，經歷這些中國/台灣經驗，並未使西方旅人對 19 世紀台灣(中國、甚至東方)的看法改觀，反而加深西方旅人對自我文化的認同。進行異文化遭遇時所伴隨的文化差異及隨後的感受，使旅人重新對自我文化塑型，而這些無知的他者，則成為旅人鞏固自我文化時的重要轉化劑。除了中國與台灣漢人帶給西方旅人的另一種不文明的文化感受及對其進行的批評之外，19 世紀的台灣還有一群美麗優雅的人群—平埔番人，讓西方旅人躍躍欲試，不但希望能親眼所見，還希望能與之一起放鬆的生活著。

⁷⁶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87。

⁷⁷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88。

⁷⁸同上。

第二節 遇見平埔族—美好但落後的一群

在十九西方旅人的台灣筆記中，西方旅人對介於漢人和生番之間的已開化番人頗有好感，由於他們的良善和親切的態度，平埔族人幾乎成為旅人筆記中的描述對象。除了探險家之外，任職於中國與臺灣海關職員也利用工作之餘探訪部落、仔細描述他們所遇見的幾個平埔族各種不同的膚色、髮色、服飾特點、飲食習慣、日常生活等細節，各個群落間雖各有異，但旅人們卻對這些已開化的番人有著共同的回憶與想像—他們有著可憐的遷徙過程，他們友善、誠實、勇敢、美麗，他們是高貴野蠻人(Nobel Savage)，跟「那些」漢人，有極大的差異。

(一)參差散落的番人印象

1871年四月，湯姆生與馬雅各醫生一同進入臺灣南部的內山旅行時，探訪木柵(今台南市南化區木柵)與當地平埔族居民相遇時所發出的讚嘆，就外國旅人對台灣平埔族的美好印象而言，這只是個開始：

『當我們進入村子，或者應該說當我們進入這個平埔族的樂園，走在阡陌小徑以及掩映著零星房屋的棕櫚樹下時，人們又是一湧而出迎接我們，成群可愛的小孩朝我們跑來，一邊喊著「祝您平安」，男人也紛紛放下工作，伸出一雙雙長滿繭的手握住醫生的手。我現在終於能了解葡萄牙人將這座島命名為「福爾摩沙」的原因了。』⁷⁹

平埔番看見外國人時的握手問好，對19世紀在台灣從沿海進入內陸，經過漢人接待或與漢人斡旋的旅人而言，特別令人喜愛。一如史蒂瑞在進入烏牛欄小鎮(Ogulan，今南投縣埔里鎮愛蘭)時的感受：「在受到漢人冷淡、猜忌的對待後(他們常跟在我們腳後跟穿過村莊，喊著『whan-a』即『番仔』)，對這樣親切的招呼真沒心理準備」⁸⁰，漢人因此成為友善的番人的對照組。與狡詐、喜歡賺錢、占人便宜的漢人相比，湯姆生認為平埔族過著原始的方式生活，除了以簡陋的方式耕種之外，並沒有其他產業支撐，「可是，這些未開化的部落卻有個非常吸引人的特點：非常真誠且正直無心機。整個旅途中，我的箱子經常是毫無顧忌地敞開著，一旁也沒有人看守，但是我連一跟別針也沒掉過」。⁸¹ 旅人對平埔族在族

⁷⁹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s, 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road)》，〈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Formosa from the earth and from the air 1871-2006)》，頁 52。

⁸⁰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4。

⁸¹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78。

群性格上的偏愛，非常明顯。

另一方面，從旅人的筆記中可以發現，他們對平埔番的好感不只來自平埔番人與漢人的對照，同時也來自平埔番部落長老對荷蘭時期的統治者與傳教士的好感，由於平埔族在旅人筆記中也普遍是最容易接受西方宗教的族群，當湯姆生進入拔馬(今台南市左鎮區)時，便簡介了這個存於旅人心中的普遍意象：

拔馬(今台南市左鎮區)這個地方是被中國人稱為「平埔番」(亦即「平原上的外族」)的原住民最早的定居地。平埔族對之前的荷蘭統治者仍保有鮮明與親切的回憶，並恪守著仁慈的紅毛弟兄所遺留的傳統，因此對外國人都表示誠摯的歡迎。⁸²

除了態度的友善，平埔族的長相與裝扮也符合當時外國旅人的美感標準，對於平埔族整體所散發出的高貴氣息相當喜愛，男子身形高大挺拔、女人美麗優雅，在缺乏物質襯托情況下，讓這樣的美麗帶有野性與尊貴，符合西方旅人對高貴野蠻人的想像。根據 Bolyanatz 的對浪漫主義(Romanticism)中描述大溪地原住民的說法，所謂高貴野蠻人具有樂觀、溫和、為人寬厚、自足、就地取材、野蠻、性解放(與文明不同的道德觀)、沒有歧視的、語言單調、不知族群起源等特徵，是居住在自然國度過著自在生活的自然人。⁸³

而對歐洲文明而言，早在 1609 年開始高貴野蠻人的概念便在啟蒙時代之前，在歐洲理解他者的過程中產生影響，而後也持續成為歐洲理解並概念化其所遭遇之他者時的背景；然高貴野蠻人的形象實際上延續自浪漫主義的自然書寫，寫作者運用主觀情感作為面對他者時的真實遭遇與想像投射間之連接，並以此對遭遇的他者進行描述。⁸⁴本文所採用的旅行筆記中亦充斥許多類似的評論，僅挑選湯姆生進入拔馬時的評論做為代表：

大多數村民都長得高大健壯，大大的褐色眼睛不時閃爍著野性的光芒，表現出豪放不羈的性格。他們這種精神源自山林野性的崇高與孤寂，但儘管具有一種不失尊嚴與優雅的倨傲，他們卻是公認的溫和並與人為善。⁸⁵

平埔番的友善，讓旅人有更多機會與看似野蠻時則良善的平埔番相處，而這

⁸²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50。

⁸³參照 Alexander H, Bolyanatz. Pacific romanticism: Tahiti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4. P4-p.7; p.43-p.51.

⁸⁴參照 Alexander H, Bolyanatz. Pacific romanticism: Tahiti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4. p.4-p.5.

⁸⁵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58。

樣的經驗既滿足了野蠻的視覺享受，又能安全無虞，一如史蒂瑞在埔社(今埔里)前往深山探索生番時，所雇用的水番(可能指邵族)經驗除了旅人本身之外，也能夠引起讀者的喜愛：

護送我們的「野蠻人」他們的外貌足夠野蠻，定能讓最熱愛蠻荒生活的人感到滿足。酋長的大兒子，光著頭，後面長髮編在一起。穿著鹿皮上衣，只遮蓋到大腿的部分。讓小腿與手臂都赤裸。他是領隊。其餘的，衣著武器都一樣，以印第安式的列隊跟隨著。⁸⁶

甚至，史蒂瑞花了一些篇幅描寫高齡八十歲的老酋長身上的疤痕：「他年輕時曾為野豬攻擊，腿部有個很深的傷口，肌肉顯然沒被割裂到極點。然未經開刀也已痊癒。不過留下的裂口，能讓我把手放進去」。⁸⁷透過描寫平埔番與旅人所認知的文明完全不同的裝扮以及平埔番的生理自癒特性，嶄露出旅人所欲傳遞給讀者的原始風情。平埔族男子高大挺拔，流露出友善、坦率、誠實的氣質，雖然邈遠，但若善加裝扮必定很好看、他們在舉止間表現出高貴的男子氣概，為了預防被植物刮傷，有些村落的男子在手臂和腿會塗上鹿血或是植物汁液，這類與旅人文化中所認知的美雖然落差很大，卻因為 19 世紀台灣平埔番在旅人筆下略帶野蠻的特性與時空似乎在此處靜止的緣故，別有一番風味。

至於婦女，一如 Bolyanatz 所分析的大溪地女子所擁有的美好，她們在旅人眼中長得很好，擁有橄欖色的皮膚，以及濃密的黑髮，和利用環境素材所進行的裝飾，不但美麗、優雅，也非常引人注目，此外，番人女子因與西方旅人語言不通而產生的沉默與微笑，讓男性西方旅人時常有所遐想，是西方旅人非常嚮往的類型。⁸⁸然讓西方旅人傾心的平埔番婦女卻因其不施脂粉的裝扮，反讓漢人認為這些番婦非常不開化，這個看法間接顯示了漢人認為女性化妝背後所代表的文明，以及漢人面對番人時所擁有的文化高度。另一方面，西方旅人與漢人對美的文化認定則可以史溫侯在奎輝社(今桃園縣復興鄉奎輝)進行探訪時，看見漢人通事的野蠻人老婆時所引起的討論為例：

通事娶了一個「野蠻人」女人，她穿著一般漢人婦女的服飾。除了前額飾有通常的刺墨外，看起來著實像個很醜的廈門女人。她跟漢人女子很相似，讓我的嚮導發出一句評語，頗值得記下。他說她看起來真像是個「女

⁸⁶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 May 1874.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3。

⁸⁷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 May 1874.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3。

⁸⁸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文第二章第二節(二) 參訪六龜博物館(Visit 六龜 as a museum)。

人」，幾乎不能相信她是個番仔。⁸⁹

在漢番交界區裡的一個婦女所引起的不同評論，再度顯示出旅人與漢人之間的差異，對旅人而言很難看的女人，卻是漢人所認同的女性類型，實際上，西方旅人單憑漢人服飾就決定了婦人的美醜，在此旅人也暗指出漢人對美感的缺乏，重覆確認了西方美感面對中國時的優勢。

族群交雜與漢人進入台灣之後所造成的族群遷徙現象，在西方旅人的筆記中也可發現，且這類遷徙並非區域性，而是產生於全島的普遍現象。例如湯姆生在進入拔馬(今台南市左鎮區)時，便認為拔馬地區的平埔族在荷蘭統治時期，原本居住在來時路所穿越的肥沃平原，「但他們早就因為貪婪無情的中國人到來，而被逐出了祖先所擁有的富饒土地上」。⁹⁰

而史溫侯在拜訪波羅辛仔宛(Polosinnawan，今宜蘭縣五結鄉社尾附近)上游(加禮宛河，今冬山河)的噶瑪蘭聚落時，碰見一群流浪中的噶瑪蘭族人，靠救濟為生，之所以造成這樣的現象，史溫侯認為是「漢人以任何細小瑣碎的藉口剝奪他們的土地，極冷酷無情地將他們成群趕走」⁹¹，並推測在漢人非法侵占行為急遽增加的情況下，「他們這一小群人無須若干年就會完全消逝了」。⁹²

史溫侯的推測並不是憑空想像，當 1873 年史蒂瑞與甘為霖牧師到內社(今苗栗縣三義鄉內設)附近的熟番墾殖地附近的神職人員處用餐時，總有老婦人「叫道『Chiah-pah-la?』意思是，『你是否吃飽啦?』」⁹³在此，史蒂瑞認為這似乎是這可憐族群的想像中，所能獲得最近於完全幸福的事，並且為之感到可憐。但仔細看外文翻譯中的語言，熟番老婦所說的語言並非族語，而是漢人所使用的閩南語，由此可知族群界線消解的情形在當時早已發生。

對於全島性探訪的旅人而言，認為不同區域間的平埔番的確有著明顯的差異，無論是物質或是待客之道。例如湯姆生便認為「與中國人有緊密接觸的平埔族衣著好一些，不過和純原住民村莊相比，他們就顯得比較不友善」。⁹⁴不可否

⁸⁹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 Bell, 1863.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福爾摩沙民族學記事〉，《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38-39。

⁹⁰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50。

⁹¹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 Bell, 1863.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福爾摩沙民族學記事〉，《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44。

⁹²同上。

⁹³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22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96。

⁹⁴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58。

認的，與漢人鄰近的平埔番衍生出新的生活方式，用來適應不同的族群關係。平埔番在 19 世紀台灣時常扮演著溝通漢人與生番的角色，而外國旅人的嚮導時常由平埔族擔任，也有番人進入中國官僚體系中。

例如史蒂瑞在進入大社(Toasia, 今臺中市神岡區大社)的熟番村落時，便發現該地區的首領 Tungsou 曾經以買官的方式當一個中國小官員，在該地的勢力與財力也相當豐厚：「他馬上設盛宴歡迎我們，殺了一頭牛，一、兩頭肥豬，一些禽類等」。⁹⁵設宴的地點在村落的小禮拜旁邊，需要大量的人力做準備工作，並準備兩倍的食物供應給參與宴會的人，但並不像漢人一樣與客人敬酒。在酒宴的交談之中，Tungsou 跟史蒂瑞與隨行的英國領事官員布洛克先生討論了身處漢人與生番交界的難處，並希望能夠得到協助。⁹⁶由此可知，在旅人筆記中雖然時常可見好奇的平埔番窺探，但平埔番對外國旅人卻也不陌生，反而希望利用第三勢力處理當地問題，這樣的情況並非偶然，19 世紀時就是因為平埔番已經成為一個知名的人種，而某些地區的平埔聚落已成為觀光景點，旅人才能產出這麼多的平埔筆記。

(二)參訪六龜博物館(Visit 六龜 as a museum)

如 Bolyanatz 認為歐洲文明自 18 世紀開始轉譯大溪地於歐洲知識版圖的過程中，歐洲文明中對東方的概念並非空白，而是一個具有編輯概念的操作，歐洲文明基於其社會與文化狀態，隨著時代與書寫目的地編輯大溪地的他者意象，換句話說，這些旅行書寫實際上符合了知識空間裡的特殊結構，而非當地生活的實際狀態。⁹⁷而鄧津華亦提出 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初期中國遊記將台灣視為活著的博物館(living museum)的一種方式，不只詆毀這些野蠻人，同時也理想化其存在。清代中國旅人於遊記中所使用兩種歷史比喻方式描述番人：一是將野蠻人當作落後的次等文化屬類，將之視為貧困不足的論調，以符合清代擴張的發展；一是承接了傳統中國儒學與老莊思想的原始主義論調，認為這些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存於過去，也是近代中國文化所遺失之單純正當(righteousness)的象徵。⁹⁸

類似情況也可在西方旅人的 19 世紀台灣旅行書寫中看見，更甚者，透過背景資料如旅行指南、知識網絡、人際網絡等協助，旅人預設其觀賞景點，並與其特定概念中的異文化進行接觸，其所到之處就像是被建構成一個活動式博物館，

⁹⁵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22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96。

⁹⁶ 同上。

⁹⁷ 參照 Alexander H, Bolyanatz. *Pacific romanticism: Tahiti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p.53.

⁹⁸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p.62.

使旅人身處其中並感到放鬆和舒適。類似文章眾多，本文僅以兩篇前後在六龜里(今日屏東六龜)度假的遊記為例，說明十九世紀台灣的旅遊性質，與文化視野交錯的情形。

本節所摘錄的文章裡，兩位旅人分別在 1868 與 1875 年間來到六龜里，當時的六龜里在旅人遊記中不但是個充滿樂園色彩的地區，也兼負冒險與悠閒情懷。由於兩位旅人懷特(Francis William White)⁹⁹與 F 先生¹⁰⁰的旅行時間相差 7 年左右，從這兩篇文章中可以發現六龜里旅行在這幾年間變得更舒適、更適合「放鬆」，另一方面也可隱約感知「文明社會」對台灣島民的分類與認知的時代特性。

懷特與 F 先生在六龜里的度假行程發生在 1870 年代，因為前人的探查經驗與紀錄，和旅行團隊中沒有名字的台灣島民的協助，讓他們得以各自在陌生地區享有冒險的刺激與文明的好處，並達到旅行目的—觀賞平埔番、暫離日常、享受一個沒有漢人的安穩環境。

懷特(Francis William White)在 1868 年一月下旬，從台灣府(今臺南)到六龜里進行五天左右的探訪，因暫離日常生活的旅行，感到相當振奮，也顯示當時的六龜里，已非冒險之地，而是休閒場所，懷特所謂的「期望中的樂土」。這個期待並不讓人意外，因為六龜早在傳教士進行宣教與醫療協助時，就已經成為他國旅人在 19 世紀的台灣可以進行參訪度假的地區。¹⁰¹

懷特清楚的說明進行這趟旅途的目的「並非深入生番的領域，而只是想去看熟番與客家人所據有的地方」¹⁰²。在旅途中，旅人和期待能夠遇見的人、物、場景碰面時的情緒，則進一步的展示文化遭遇的過程，這份期待背後代表著六龜里在旅人圖譜中是一個已知的未到訪之地，對該地已有基本理解，而在懷特與熟番的遭遇過程中，也發現懷特想像中的熟番與真實熟番的落差：

在此我們首次遇見盼望中的朋友，即熟番。看到他們與漢人那麼相似，我想大家都有點失望。不過他們確實更為優秀，有種很坦誠的樣子，也很溫

⁹⁹Francis William White，英國人，1859 年入中國海關工作，1864 年轉任代理海關稅務司，駐長江交商口九江，兩年後(1866)轉駐打狗，負責台灣南部港口稅務及通商事宜。資料參照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66。

¹⁰⁰F，英國人，姓名不詳，據其遊記內容可知，他與其他五位歐洲人純粹是因為中國新年假期而來福島玩(或者說觀光)，並沒有探險或做生意等其他目的。摘錄自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48。

¹⁰¹1859 年起，天主教道明會郭德剛神父便抵達台灣，與官府周旋之後，開始在萬金庄(今屏東萬金)進行傳教、建立教會的活動。參照 Fernandez, Pablo 編，《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台北：光啟文化，1991，頁 18-23。

¹⁰²White, Francis. "A visit to the interior of south Formosa." *The Cycle: A Political and Literary Review* No. 17(27 August 1870): 197-199.收錄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67- 71。

厚，那是天朝的人(即中國人)極少具有的。¹⁰³

懷特帶著對熟番的好感，並藉著嚮導(山杉林村人)的協助進行接下來的旅程，他仔細的描述置身熟番聚落時的觀察，也盡情享受沒有漢人叨擾的時光：

吃飯時，我們是在戶外的『場地』吃。他們總會退下，等我們吃完，才又加入。有些婦女十分好看，她們都有同樣誠實的表情。我們感到自己是處在可以信任的人之間。婦女將他們又黑又厚密的頭髮裝飾得很美。中分，用一寬的頭冠，夾以不同顏色的絲線，編成辮子。與大約十五年前歐洲所流行的樣式差不多。也絕對不能輕視他們的菸草，雖然沒什麼香味，也變質得很快，但淡淡的，吸起來很舒服。¹⁰⁴

在這段敘事中，我們可以發現，懷特暫時放下文明的英國餐桌禮儀，選擇在戶外場地用餐，並不感覺自己野蠻。而在懷特對熟番婦女的眾多描述中，可以發現他對這些婦女的品格評價甚高，雖然有點過時(和十五年前的歐洲類似)，但仍然很美。至於熟番的菸草，雖沒有自己慣用的菸草品質優良，但仍可接受。

在這段評論中，很清楚的可以發現懷特所認同的文明只有自身文化的英國禮節，而這些熟番雖然無法與之相比，卻也有著野蠻天然的魅力。經過這次旅行，懷特認為自己不但加深了對熟番原有的好感，也更肯定熟番這個族群。這樣的書寫看似帶有貶意，但實際上卻能夠重新看見旅人背後的文化中心，就是英國與歐洲；而台灣的六龜熟番的溫馴和過時的美麗則是旅人以時間落差作為歷史斷裂的方式，將六龜熟番界定為非現代的人群、並將之侷限於過去的時光中，以此表明自身(歐洲)文明化程度高於其他區域的例子。

除了六龜里的探索，懷特旅程中的驚險片段則屬他們一行人無意的進入生番獵場的時刻，「事後得知，我們是在敵方的土地上打獵，純因我們人數多，加上又是由兩個歐洲人帶頭，才沒有連自己也被番人獵殺」。¹⁰⁵可見在懷特對臺灣島民的分類概念中，生番並不屬於和善的一群，而這也是當時的臺灣印象之一。

而另一位旅人F先生，在中國新年假期進入山區(六龜里)旅遊，一行人除了三個英國人、三個法國人之外，為了度過優閒的假期，隨隊還有一大群為了不想過太艱困生活而雇用來的苦力與挑夫。當F先生一群人進入六龜這個隱匿在深山

¹⁰³White, Francis. "A visit to the interior of south Formosa." 收錄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68。

¹⁰⁴White, Francis. "A visit to the interior of south Formosa." 收錄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70。

¹⁰⁵White, Francis. "A visit to the interior of south Formosa." 收錄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71。

的美麗山谷時，「村民有一半是平埔番，另一半是「野蠻人」。都跑出來瞪眼看著我們，感到十分好奇」。¹⁰⁶

隨後，F 先生認為村民克服了驚訝與不信任感，並「展現出天生的好教養」，盡全力歡迎這一大群人的到訪。F 先生利用雇來的僕役準備餐點的同時，與六龜里村民互動：

他們送來食物、煙斗、水果等東西。這些我們都謝絕了，而要了一個大方桌。我們把桌子放在附近一棵大樹的樹蔭下，桌上很快就擺上了豐盛的飯菜。你真應該看看這些大自然的純真之子，看著我們為一份餐食物所做的各種準備時，他們的那種表情。¹⁰⁷

當 F 先生一邊觀賞自然的野蠻，並享受文明的同時，一邊也矛盾的開始批判起文明，「這讓人禁不住要反省，文明實在極為浪費。對一個文明人在舒適、快樂上來說是必需物的，有多少實在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呢？」¹⁰⁸可是這些反省來得快也去得快，午餐出現時提醒了 F 先生「文明還是有其好處的，且整體來說，是比番人的淳樸生活更符合我的需求」。¹⁰⁹旅人只是想要獲得輕鬆感的需求，在此一覽無遺。

而美麗的六龜里女子，也讓 F 先生情不自禁的稱讚起這些平埔番婦女，並將她們與神話中的夢幻形象比對：

我想可以這麼說，以其習俗來說，她們是我見過最可愛的女子。她們的服裝、髮式與自身的美麗很搭配，達到好品味的極致。同時她們的每個舉止姿態都極優雅，就像羅馬神話中的月亮和授獵女神一樣。再說，她們既勇敢又善良，既天真單純又美麗。對其丈夫來說是很適當的配偶。¹¹⁰

這些描述賦予六龜里平埔番婦女一個遠古意象，並將高貴而純潔的野蠻人想像加諸其上。尤有甚者，F 先生看見這些誠實純真的畫面之後，發現自己處在六龜村落的違和感：「感覺自己跟那裡的地方和景色似乎格格不入。我穿著污穢的、西式剪裁的衣服，戴著可笑的遮陽帽，好像在一幅一切都優雅美麗的圖畫上的一

¹⁰⁶F. "A trip into the interior of Formosa." *The Living Age* Vol.126, No.1622 (10 July 1875): 122-12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Spectator*. 收錄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49。

¹⁰⁷同上。

¹⁰⁸同上。

¹⁰⁹F. "A trip into the interior of Formosa."收錄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51。

¹¹⁰F. "A trip into the interior of Formosa."收錄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50。

塊瑕疵」。¹¹¹這趟度假的過程中，六龜里的美麗女子，以及 F 先生想像自己進入村落生活的情狀—「我可以教導這些人各種各樣對他們有好處的東西等等」，則為 F 先生的享樂假期增添幾許美麗的白日夢。

在這些反省敘事裡，當 F 先生認為文明是一種汙染源的同時，已將平埔番部落裡的原始自然風貌做為文明生活的對照組：這些純淨是因為缺乏文明而產生的。而在 F 先生對文明的需求下，六龜里的落後生活也讓 F 先生有了將文明教導帶入村落的期望。在此，教導野蠻這個慾望暗示了旅人自身的高度文明，並且盼望這個族群能夠一直維持其自然的美好狀態之外，若能再加上文明的協助，則更添完美。旅人產生出讓當地村落靜止的成為一座樂園的隱藏想像—只有美好、沒有汙染，卻文明。

另一方面，透過 F 先生對文明的反省，則可發現他以既崇敬又貶抑的矛盾邏輯闡述這趟旅程，且無意識的將自我意識中的文化中心與霸權等權力關係，作為敘述他者的隱藏線軸¹¹²，而這也是旅人在面對他者時，所產生的自我界定方式之一。與懷特直觀的敘事手法不同，F 先生用一種既在又不在的方式漂浮(loft)於兩者間，並將所見所聞加以理想化，帶著自己的文明，透過有距離的方式觀察這座樂園。

除了將自身文化拿來跟這些美好的人們相提並論之外，懷特與 F 先生所使用的另一個對照基準，則是鮮少正面敘述的漢人。在這兩段旅程中，漢人出現的場景並不多，只有懷特一行人在抵達六龜里中生熟番交界的溪邊時，進入一個漢人招待的住家居住，根據懷特的描述，這位漢人相當與眾不同，懷特認為「他對待我們很好，我們也不覺得被壓榨」。在描述熟番時，懷特也暗自將熟番與漢人做了評價，認為六龜里的熟番「沒有任何人表現出像漢人那般無禮且令人厭惡的好奇心」。¹¹³由此可以推論，懷特這位英國駐海關官員對漢人的評價並不高。

至於 F 先生對則在文章最後感傷離開的不捨中，說明對平埔番的愛好，以及對漢人的恐懼：「回去的旅程，我們兩天走完。那還是愈少說愈好，我已經把心留下了。總之，是非常傷心的。發現自己又處身在漢人之間，也實在是極為可怕的經驗。」¹¹⁴身處漢人環境的不愉快，在懷特和 F 先生的隱形描述中，一覽無遺。

¹¹¹F. "A trip into the interior of Formosa." 收錄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51。

¹¹²參照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p.61。

¹¹³White, Francis. "A visit to the interior of south Formosa." 收錄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p.70。

¹¹⁴F. "A trip into the interior of Formosa." 收錄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p.152。

遊記裡的平埔族有著雖然野蠻卻令人喜愛的性格，以及誠實知足又優雅的美麗形象，帶著古樸氣質生活在蠻荒之地；漢人成了沒有名字、愛工作甚於生活，且容易令人厭惡的一群，若有善良而且誠實的漢人，那也必是少數；而西方旅人則是具有文明高度的欣賞著平埔族的野蠻美好，並在台灣日常生活裡遭受漢人那些無法理解的行為轟炸，甚至，並不知道這些行為算不算得上文明。

19 世紀在台灣的西方旅人透過當地居民協助於旅行中遇見美麗又高貴的平埔族，對這些被觀賞族群進行比對、評價，甚至帶著工具書進行觀光旅行。平埔聚落所具有的可觀賞價值，不僅具有書寫價值與填補知識空缺的功能，也成為西方文明映照自身的一面美好鏡子、一座活著的博物館。實際上，這些想像來自於文明與原始的對立，如鄧津華綜合他人說法，認為不只是西方旅人，整個西方文明、前現代的中國，都將中國邊界上的非漢民族視為相對於自我文化的他者。透過標示他者的特徵，並否認自身與他者的共性，以此加大自身與他者的差異。另一方面，藉由描述他者的現狀，並將之與自我文明進程對照，它者變成為倒退的、過時的、可以被文明拯救的野蠻人。而這類具歷史進程的直觀概念則成為貶損他者的基本工具之一。¹¹⁵

實際上，對 19 世紀在台灣的西方旅人一方面承接自其文明中對高貴野蠻人與烏托邦(Utopias)的想像，帶著所謂的文明之眼書寫 19 世紀的台灣平埔族，仍無法脫離西方文明概念中對他者的界定方式來處理情感(或者精神層次)認知上的他者。另一方面，旅人又帶著西方科學技術進入 19 世紀台灣，企圖捕捉新的知識以完整知識體系。透過描繪平埔番的美麗、善良、友善、誠實等特性，對比漢人的欺騙、醜陋；而平埔番的野蠻，讓旅人標示出自身文化的文明特性。西方旅人在 19 世紀的旅行中，除了浪漫主義與自然書寫的傳統之外，也沿著東方(Oriental)的刻板印象的邊緣了進行一場對東方的探索。¹¹⁶這樣的敘事模式，讓旅人將自己的文化思考與實際位置錯身，站在與當時身處的平埔聚落有距離與文化高度的位置，對觀察對象(平埔族)進行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斷裂，藉著貶抑或同情平埔族的方式，再次了確認旅人的文化優越地位。

¹¹⁵參照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p.61.

¹¹⁶參照 Alexander H, Bolyanatz. *Pacific romanticism: Tahiti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p.52.

第三節 刺激的生番印象

19 世紀在台旅人的台灣圖譜中，除了為數眾多且相對熟悉、來自中國的在台漢人，和友善高貴而且美麗的平埔番之外，居住在深山的神秘生番，則是旅人亟欲探索的群體。在尚未真正與生番接觸之前，別人口中的生番記憶成為旅人的指南，這些記憶經過多重轉譯之後，所剩下的恐懼面紗，成為旅人台灣圖像中模糊的一區，它看似無法被辨識，且擁有無法為外人所理解的系統邏輯。一如必麒麟對生番的描述：

原住民(chi-hoan, or 'raw savages')具有特殊的敏感度，可以查覺文明人看不出的足跡，去追蹤敵人。常常，只要發現可疑人物，他們便尾隨跟蹤許多哩路，一定等到最有利的時機才出現，敏捷的將敵人包圍起來。¹¹⁷

有如野生動物一般的形容，成為文明人的最佳對照組。因此，生番對旅人所具備的吸引力，超乎漢人的想像。本節將從他人對旅人的勸告開始，捕捉他人口中的生番形象，接著透過旅人與生番的會面，重見被旅人再現的生番，並藉著生番禁忌，再度看見旅人所劃定的文化疆界。

(一) 別人說

旅人前往生番部落探險以前，總是必須先做足準備工作，例如準備取悅原住民的禮物，例如「多彩亮珠、小鏡子、火石、針和大紅布等」¹¹⁸，除此之外，可能包括小別針、鈕扣、酒，或者絲帶等，各個旅人帶著不一而足的小玩意往山裡去。除了實際上的禮物之外，旅人還必須堅定心志、鼓足勇氣，因為在前往深山的沿途休息處，總會有許多人勸退旅人，甚至覺得這些旅人連命都不要。

一如湯姆生在台灣府時與官員的姪子，一個曾在香港擔任買辦的男子的對話，當湯姆生說出旅行目的地是想到島上內地去看原住民時，男子對於冒著生命危險，大費周章的長途跋涉，並穿越一個連像樣到路都沒有的地區，只是為了要看生番。男子向湯姆生保證：「您永遠不可能接近這些生番，您只會被他們的毒箭射中，或是在山間迷路」。¹¹⁹

對於漢人來說，靠近生番區域，不只是不智之舉，也是在拿生命開玩笑。類似的說法，必麒麟也曾在前往拜訪生番時所停留的漢人蔗糖富商口中聽到，「他

¹¹⁷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97，括號內容為作者使用之原文，感謝口試委員邱馨慧老師對譯文使用的提醒。

¹¹⁸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32。

¹¹⁹ 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42。

嘲笑我們這兩個歐洲人，竟然想越過福佬人和客家人的村莊，進入野蠻人的區域，簡直是發瘋了」。¹²⁰

由於缺乏與生番的接觸，以及對其文化的不理解，使生番在漢人概念中蒙上一層極度神祕的薄膜，對漢人而言，「番」與「人」幾乎是不同物種的差別，一如必麒麟在阿猴(今屏東)準備前往部落時所遇到的漢人勸說：「你們真以為可以活著到達那裡？絕對不可能的，從來沒有白種人去過。那些野蠻人長著尾巴，還會吃人呢，沒有「人」願意靠近他們的」。¹²¹

除了漢人之外，其他人的建議也不曾少過，例如史溫侯在蘇澳附近遇見的熟番，似乎也非常帶給史溫侯非常懼怕真正的土著，即山番(Sang fan)的印象。¹²²就連進入屏東萬金庄平埔番部落、天主教道明會的神父們，也認為：

遠訪原住民的計劃很難實現，我們絕對不可能活著到達原住民住的區域，這計劃太不明智了。在高山腳下的廣大地區，人煙稀少，各族之間都有宿仇，沒有人能預測什麼時候原住民會跑下山來，從事獵取人頭的遠征。¹²³

任何可能與生番碰面的場景，都是充滿嚴肅與警戒的氛圍。恐懼感在旅人前進的路途中，由同行人員的裝備說明了一切。例如湯姆生從甲仙埔的平埔番部落前往荖濃時，途中將經過生番獵場，因此當地的平埔番朋友便安排一個帶槍的嚮導隨行。而這個嚮導找來一個帶著火繩槍的朋友加入湯姆生一行人的行列。湯姆生形容此行的裝備：

他們兩人都帶了鹿角做的小火藥筒，並用玻璃珠串著掛在脖子上。他們還把引信纏在左臂上的竹滾軸或臂環，這些引信可以燃燒二十四小時。點燃引信後，將燃燒的末端連接到鑷子上，再一扣板機，引信就會點著火藥。附近這一帶所有的土著都使用從中國人那兒弄來的英國火藥。我們的嚮導一看不到村莊，就點燃引信，並命令大家靠在一起，靜悄悄的前進。¹²⁴

當然，旅人是不會那麼容易退縮的，他們帶著必麒麟所說的「堅定意志」決心前往內山探險。就連探險途中退卻的隨行漢人僕役，也沒辦法動搖旅人的決

¹²⁰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賊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頁 133。

¹²¹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賊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頁 134。

¹²²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 Bell, 1863.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福爾摩沙民族學記事〉，《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44。

¹²³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38。

¹²⁴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66。

心。湯姆生的僕役阿洪曾私下告訴湯姆生他對生番的概念，試著以此說服湯姆生回頭：「附近野人運用弓箭的靈巧，和他們在煮食心腸軟但身體結實的中國敵人所表現出的冷靜一樣神奇」¹²⁵。並懇求湯姆生不要再深入山區冒險，「因為這些山裡的生番攻擊時從不現身，只是朝高空放箭，而箭落下時，便會精準地刺穿受害者的頭顱，使其當場死亡」¹²⁶。聽見這樣的傳言，湯姆生的回應不如阿洪預期，他只是強烈建議阿洪好好保護自己的腦袋。

這些勇闖生番部落的決心，展示出旅人對於捕捉未知的強大動力，在這個過程當中，旅人也藉由不同於以往的全新體驗，重新感受自己身處旅行的狀態，而完成旅行之後的成就感也更添旅人的英勇風采。

實際上，西方旅人對 19 世紀台灣番人的概念區分，大部分採信中國資料，與旅人親身踏訪中國與台灣後得來的分類。根據鄧津華的說法，生熟概念就是接觸帶底下的產物，而生熟的差異也體現了對中國而言非漢人的他者與中國殖民帝國中漢人文化主導的關係。由於生番、熟番的區別取決於被中國文化影響的程度，而這個說法也影響對福爾摩沙的人種學分類。生番與熟番的區別實際上會隨著開墾、旅行造訪、統治力等不同活動的進行，並經過交涉、拉攏收買及調節適應等過程，¹²⁷漸次揭開生番與其居住地的神秘面紗。19 世紀在台灣西方旅人也成為捕捉生番知識與揭露番人生活的一個重要環結，他們身處接觸帶，並試著將生番由無法描繪、難以理解的群體，慢慢成為西方文化知識的一部分。

(二) 與生番會面

對旅人而言，見過生番幾乎就完整了旅人心中那幅 19 世紀台灣土著人類圖譜，這樣的心情與激動，對旅人而言是進入 19 世紀台灣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一如必麒麟在萬金庄透過神父與平埔族人的協力合作，由平埔族人與生番協商，而促成的生番見面會一事的回憶中，寫下初見生番的興奮感，他認為自己「已完成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心願了！」¹²⁸

接著必麒麟仔細描述這幾位透過平埔番協商，因而願意下山讓他觀看的生番：「他們身穿獸皮衣，戴著羽毛頭飾，皮膚塗抹顏色，一副華麗的裝扮」，由老平埔族人居中翻譯，必麒麟與夢想中的生番談笑，並推翻傳言，認為他們是「幽

¹²⁵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64。

¹²⁶同上。

¹²⁷參照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p.122-p.123.

¹²⁸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39。

默又聰慧的人」¹²⁹。閒談過程中，必麒麟拿出預備的禮物，與生番交換，「直到東方破曉，是客人們該離去的時候了，否則，天一大亮，會遭到埋伏仇敵的攻擊。大家離情依依，我們以最誠摯的心情與原住民客人道別」。¹³⁰

這次見面會的另一波高潮，大概是必麒麟從屏東萬金返回打狗的沿路上，其他人所給予的讚賞和眼光，必麒麟認為自己的「身體雖疲倦、僵硬又骯髒，內心卻有勝利的喜悅。歸來後，這次的冒險不斷的被人討論著，並得到熱烈的讚賞，大家好奇地觀看那些山地原住民送的禮物」。¹³¹而此次見面會所獲的的豬牙飾品，想必成為必麒麟這趟生番探險的最佳紀念品，與最具勇氣的象徵。無論旅途中的交涉或過程是否順利，當旅人能夠征服旁人所賦予的恐懼，直接與傳聞中的他者接觸透過直面未知，這個抽離原本固定的文化認知的過程，讓旅行再度有了脫離常軌的作用，成為旅人標示自我的時刻，對旅人而言，這就是最能感受自己存在的時刻。

當旅人開始試著理解生番時，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大落一大落的描述，如薩依德所說東方學家將這個族群(他者)的資料建檔在自己的認知系統(東方學)那樣，旅人抽離自我情緒與環境因子，作為一個旁觀者，從外貌裝飾，到與其他部落間的互動，都在旅人的筆記範圍中。例如史溫侯在 1862 年四月，前往奎輝社¹³²所進行的探險便仔細的將該地族群的黥面，依照男女老少的分類仔細描述，發揮其生物學家本領，就像觀賞稀有品種一般的描繪十九世紀的台灣生番這樣的敘事，不但符合所謂科學的精確，也間接的填補人種學裡的一方空白、展示出人類的多樣性：

他們有很多馬來容貌的特性，眼睛與鼻子都長得很好。都有刺墨，在額頭上有三排短條紋，皮隆起，為藍色。刺墨是用針與印度墨汁做的。線條是三個緊密的方型，一個在另一個之上，上下方型各有八條條文，中間的有六條，老人的刺墨幾已退掉。年輕人在十六歲時刺墨。他進入青少年期時，以馘首與虜獲一些的人頭顱才有資格取妻。在下唇下面刺墨，為八條條文的一方塊。……女人結婚後，臉上從一耳刺墨到另一耳。先是三條單紋，其下，在另兩條條紋之間有一排的 X，然後又有兩條條紋，及另一排的 X。在這所有的下面，又有四條單紋。¹³³

¹²⁹同上。

¹³⁰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40。

¹³¹同上。

¹³²今桃園縣復興鄉奎輝，屬泰雅族，當地盛產鹿角。

¹³³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 Bell, 1863.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福爾摩沙民族學記事〉，《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38。

除了直接的描述之外，史溫侯也加入和被描述者的互動，在觀察刺青時，他便看見「一個十六歲的男孩，長髮中分，鬆散的用一條白貝珠串束在後面，白貝珠在頭上也繞一圈，臉上沒有刺墨」。並問他是否是個女孩？「他聽到此很不以為然，用手掌一直拍打頭後面來表示不滿」。¹³⁴ 男孩的反應除了增添了描述事件的真實性之外，也反映出對史溫侯來說的一種野蠻的無語，在整個描述過程中不見轉譯者與番人的語言，只有動作和史溫侯的說法，而旅人進行單面詮釋的作法則與薩依德所言之東方學家理解東方的方式並無不同。

同時，史溫侯對奎輝番人物品的貼身觀察描述，看似呈現了旅人敘事中具有科學角度的客觀，實則一再反覆劃定文明與野蠻的範圍：

男的「野蠻人」蹲在桌邊，抽菸、聊天，婦女則靠著牆角圍成一排，在那裏照顧小孩，而這些小孩幾乎都用一塊很髒的布懸掛在胸前。男人和婦女都極邋遢。男人的腿和手臂上塗抹鹿血，以防被多刺植物刮傷。天氣更熱時，他們把方格紋外衣脫在一邊，而下半身相當裸露，在婦女面前全然若無其事。¹³⁵

接著描述奎輝番人以天然素材，如木頭、貝殼、珠子所製成的飾品，和他們的大耳洞，並試著解釋這些裝飾品的意涵(像是護身符)以及其他物件：

他們攜帶的武器只有刀和火繩槍，是用以貨易貨的方式跟漢人換取來的。抽完煙後，男人走過去跟婦女蹲在一起，把一碗碗甜的、味道很怪的，用米和馬鈴薯做的中國酒(叫 Wookiape，五加皮?)，加水稀釋，傳著喝。¹³⁶

這段對番人及其物品的描述中，完整地展現了史溫侯進行物種與異地風俗蒐集的熱情，而這也是支撐他繼續前行的內在動力。除了平面式敘述之外，史溫侯亦試著貼近番人的生活，試著與之相處，以此更直接的敘述此番落的種種：

我去跟他們蹲在一起，以便看得更清楚些。其中一個「野蠻人」很急切地想知道漢人是否雇用我們，以我們的好槍來消滅他們。他們很急於獲取我們任何的槍枝，但婦女中的一個建議他們只要求來福槍。他們想知道我們是從哪裡來的。我們回答說中國。他們說他們也想去中國。漢人聽了就大聲笑起來。那裡的漢人泰半都會說「野蠻人」語言裡的一些詞彙。有些跟

¹³⁴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 Bell, 1863.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福爾摩沙民族學記事〉，《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38。

¹³⁵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 Bell, 1863.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福爾摩沙民族學記事〉，《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39。

¹³⁶同上。

他們相處和睦，住在他們的山丘上，並與他們通婚。¹³⁷

然而，史溫侯的敘事中，終究沒有太多番人的聲音，多半是藉由直接觀察，透過細節的蒐集，得出與前人無異的文化刻板印象，並加深之。最後，史溫侯藉著漢人對奎輝番人習俗的看法，以看似「客觀」實則認同漢人觀點的方式，再次說出文明與野蠻的差異：

「野蠻人」給死者穿彩格布或裹布，把他們埋在土裡，並不豎立任何墓碑，也不燒香，僅在那塊土地上種些樹。他們沒有喪葬儀式，就如同他們不穿長褲一樣，這些都使漢人深信他們是野蠻人。¹³⁸

旅人從印象式的平面敘述開始，奠基讀者對生番的概念，接著以和生番相處的親身經歷，讓生番的形象活躍紙上，並在這些遭遇過程中，將自身的文明、漢人和平埔番人作為生番的對照組，加深 19 世紀台灣生番與我們(西方)的差異，再將「文明」的軸線劃進族群接觸的過程中，透過單面詮釋與漢人的佐證式語言形塑生番的野蠻形象。

然而，這只是旅人詮釋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旅人透過族群遭遇的過程中，帶出台灣不同族群對待彼此的方式。例如必麒麟在荖濃的平埔番部落拜訪時，碰見全副武裝、衣著華麗的雁裡社人和兩年沒有前往荖濃的施武郡群的布農族人來此交易，以及平埔為此舉辦的盛宴，而宴席開始之前，「由於雁裡社與施武郡群布農族是世仇，荖濃頭目要求雙方解下武器，暫時由他保管」。¹³⁹在必麒麟的描述中，宴席開始時，由於雁裡社和施武郡群的布農族人因宿仇而客氣節制的交談，一旦幾杯黃湯下肚，則開始各自誇耀自己過去的英勇事蹟，整個場地吵鬧不休，讓必麒麟一行人無法入睡，直到天色漸亮，這些醉客才有了睡意，他們隨意臥睡在火堆邊，身邊散落著華麗的裝束。當雁裡社人一早離開、布農族人帶著宿醉醒來時，交易才正要開始：

這種狀態對平埔族而言極為有利，因為如此一來，便可以在生意談判中，很便宜地取得對方的貨物。顯然地，平埔族人已從漢人身上學會不少教訓，如今，他們用同樣的手法對付山地原住民。¹⁴⁰

對旅人而言，荖濃平埔番的漢人化就如同其他區域的平埔番人那樣，與漢人村落接觸頻率越高，其漢人化程度就越高。但這並不意味著文明，真正的文明還

¹³⁷同上。

¹³⁸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 Bell, 1863.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福爾摩沙民族學記事〉，《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39。

¹³⁹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62。

¹⁴⁰同上。

是屬於旅人自身文化的養成。

另一個族群互動的例子，則以史溫侯前往今新竹縣尖石鄉附近的義興社時，與一個年輕番婦的互動做為參考。史溫侯在敘述這段旅程時，一如往常的仔細敘述了當地的飲食：「這些『野蠻人』種植陸稻、番薯與菸草，但他們所食用的大部分則從漢人那裡換取。他們用手進食。手並不很乾淨，在開始前甚至都未將血和髒物洗淨」¹⁴¹，以及他們的刺青和衣著。由此可知史溫侯(西方旅人)對飲食、乾淨的概念都與這些野蠻人(過時而失落的一群)不同。

接著，史溫侯和他認為的義興部落裡最美的小姐，因紅色飾帶有了互動。史溫侯將身上的紅色飾帶脫下來，把腰帶圍著這位女性的腰，當作禮物送給她。並認為「她看起來很害羞，顯然認為這是過分親暱的行為而臉紅，尤其是她同族的人都笑了且紛紛置評」¹⁴²。之後，史溫侯認為這位女性，「在『野蠻人』欣羨的注目下走來走去了一陣子，然後拿下來，到河邊，將之洗淨、掛晒」。當史溫侯選取她自己織的飾帶作為回禮一事讓漢人得知之後，「漢人笑我笨，把值五元的腰帶拿去換只值幾百銅錢的東西。此後我每到哪兒，這故事就傳到哪兒」。¹⁴³被漢人嘲笑的史溫侯雖然沒有加以辯駁，但從他的採集旅程中可知，這件飾帶最後也將成為博物蒐藏品之一。

在此，透過西方旅人與漢人對此女性生番與飾帶交換一事並無聚焦的現象，可以發現兩造間似乎隱含著漢人與西方人對番人看法並無共識的狀態：西方旅人著重於探奇、爭險，蒐羅 19 世紀台灣的各项新發現、新物種、生活用品；而漢人頃其全力的賺錢、以金錢作為衡量各事物的態度。在這其中，西方旅人又再度輕鬆的展現其文化深度與(西方)知識高度，透過這個對比展現西方文明優遊於台灣各類人群分類中的想像，再次說明西方旅人挾帶著文明優越感的理所當然。

¹⁴¹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 Bell, 1863.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福爾摩沙民族學記事〉，《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40。

¹⁴²同上。

¹⁴³同上。

第四節 小結

本章透過分類西方旅人筆記中對 19 世紀台灣裡不同族群的敘事，試圖展現 19 世紀台灣島民如何被再現為三種不同型類的他者之縮影及其過程。旅人對 19 世紀台灣漢人的理解與臺灣島民之族群分類，主要來自其中國經驗。然而碰上中國的西方旅人，並不一定將中國文明視為文明看待，反在與台灣漢人相處時，透過西方科學的發展、中國漢人對於科學的無知，以及西方人所無法理解的中國傳統將之視為荒謬(如殺女嬰)行徑的方式，來展現旅人及西方文化的優越與高尚。

而旅人對台灣經驗的慾望，通常來自特定的目的，例如資源開發、物種蒐集、旅遊休閒，或是印證西方文化中對東方的概念。因此，19 世紀台灣平埔族的經驗，幾乎成為當時來台旅人的紀錄重點，平埔番的遠古印象、高貴優雅的氣息，以及誠實和善的態度，成為旅人經驗中相當美好的一塊。旅人對平埔番的書寫與評論，延續了西方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想像傳統，從相貌、舉止到衣著裝扮，讓 19 世紀的台灣平埔番人在旅人筆下化身為高貴野蠻人，而平埔番落則成為旅人心嚮往之的美好烏托邦。

原本存於西方旅人心中美好天堂，被投射於 19 世紀台灣平埔番的生活場景，並形成某一典型，間接與旅人想像中的高貴野蠻人勾連，成為某種應證關係，亦如 Bolyanatz 分析：當烏托邦想像成為旅人的實際經驗時，先前對烏托邦的想像輪廓便在這一來一往之間被再度活化、加深¹⁴⁴，而 19 世紀台灣平埔番的浪漫想像與刻板印象也因此再次呈現於讀者面前、再次銘刻在西方社會概念化他者的進程中。

至於旅人與生番相遇這一段發現未知的過程，則是旅人最能夠感受正在旅行的時刻。為了與生番相遇，旅人蒐集前人留下的資訊、到中國和台灣後從別人那邊聽來的消息、住在近山區的傳教士網絡消息，最後終於與生番相遇，並藉著通譯、嚮導，甚至像是毫無障礙的與之溝通。另一方面，西方旅人對生番的嚮往還來自 Youngs 所說的一大片空白：知識、文化、甚至地理上的空白。這些空白成為旅人填補自身知識架構的最佳素材之一，透過想像(二手資訊)與實際經驗的交錯，在敘事中製造了生理(肉身)旅行和虛構描述之間的連結。¹⁴⁵

這整個過程其實就是台灣如何被納入旅人概念的行動縮影：旅人紀錄生番的生活細節，試著分辨不同生番間的差異，並將生番與台灣的其他族群並置，不僅因此透露不同族群的部分相處細節，也在試圖轉譯的同時，將旅人自身的文化系

¹⁴⁴ Alexander H, Bolyanatz. *Pacific romanticism: Tahiti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p.3.

¹⁴⁵ Tim Youngs edited. *Travel wri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illing the blank spaces*. p.3.

統與台灣做為比對。而這些差異的呈現，使旅人身處異地的情狀更加深刻，對於自身文化的鞏固也更強烈。

透過 19 世紀西方旅人書寫中的三種台灣島民分類，及旅人筆記中的各族群觀察與親身經歷，實際上回應了薩依德在《東方主義》一再重複的缺乏個性而單調並沉默的東方學資料的判斷並不那麼正確。的確，西方旅人進入 19 世紀台灣進行書寫時的陳述方式仍然脫不去所謂刻板印象與書寫傳統；但在這些資料地鋪陳中也很明顯的看見，台灣島民的三種性格並未被旅人以統一方式進行；另一方面，透過旅人描述的漢人價值觀，也在某種程度上闡明 19 世紀台灣同樣被清代中國視為他者、以及極欲掌握他者的統治狀態。薩依德的《東方主義》論調，實際上並不那麼適用於 19 世紀台灣。

那麼，旅人除了承接其西方文明裡對他者的傳統之外，還以什麼方式體認他者的存在呢？他們更常使用是自己的身體感官。實際上來到 19 世紀台灣的西方旅人，更算是島嶼的他者，身為少數的西方旅人，無論在身體或日常生活中都必須踏實的體會身為島嶼他者的格格不入。透過感官所產生的衝突感與自我認知中文明的優越感所進行的島嶼生活，呈現了西方旅人成為受苦，但感覺良好的、自外於島嶼的他者的狀態。

第三章 旅人的島嶼生活—受苦但優越的他者(Being a suffering other with proud)

離開生長的土地、穿越海洋，19世紀的西方旅人為了各自的目的來到台灣，這些不同的旅行並非巧合，「所有的國家在十九世紀都朝著一個目標努力：擊倒長城，開放中國門戶，向中國介紹西方的思想，銷售他們的機器和他們的科技，提供他們的服務」¹⁴⁶。基於市場潛力的誘惑，19世紀的東方—特別是中國，對西方旅人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與貿易市場同時開展的，還包括殖民地的擴張風潮，一如必麒麟在《歷險福爾摩沙》一書序言的陳述：「基於英國曾錯失併吞台灣的機會，以及在遠東地區所產生的利益損失，故在此危急之際出版其臺灣遊記，希望讀者能藉著遊記出版，關切遠東的情勢」。¹⁴⁷

當然，旅行必然帶有其時代觀感，除了政治與經濟原因之外，當時有許多科學家或觀察家透過旅行，蒐羅各式尚未被發現的新知識，將異地的各式物件做為充實旅人本國的博物館材料之一；更藉著遊記文章的發表，向讀者介紹一個新奇的他域。從上述的兩個面向，讀者不難發現19世紀的西方旅人因為各自的國家利益進而覬覦、觀看台灣。於是旅人的英勇風采和具有科學精神的探索，在遊記中隨處可見、旅人探索台灣後所發現的落後、神秘、原始，與無法形容的混亂，則成為其英勇標記的對照。然而，在19世紀台灣的物質條件下，這些看似風光的旅行並不容易達成。看似單槍匹馬的英勇敘事之外，旅人對環境的抱怨、對異文化的理解，以及旅行所造成的身體不適及其所帶來的痛苦，都透露了旅人當時在島上移動與生存的困難。這些困境，來自於環境轉換與文化差異，但這些充滿不適感的記憶，卻也成為旅行時，旅人最能感受自身存在的時刻。旅人的困境敘事，著實呈現了旅行時的另一個生活向度，那些脆弱的時刻、受到束縛的行程、無法得到的物件，反而間接的透露出台灣這個島嶼施加在旅人身上的力量。

另一方面，相對於台灣島民，人數極少的西方旅人，其優越感並不因自己是多數人的他者而減低，反而更顯尊貴文明，而那些讓旅人感到困擾的物質條件與人際互動，除了使旅人重新確認他者與自身的差異之外，也讓旅人對於自身文明的懷想與反思更上一層。在旅人對異地蠻荒的描述、遭遇蠻荒的過程中，19世紀台灣在旅人眼中所代表的混亂，幾乎成為文明的對照組，而旅人無法理解的島嶼秩序，也成為補充和加強旅人文明強度的佐證。

透過這樣的觀察，讀者可以發現，在旅行筆記中，旅人們間接說明了自身文化所代表的秩序與優越地位，他們有意無意的繼承前人遺留的台灣資訊、並同時

¹⁴⁶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頁139。

¹⁴⁷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7。

散播著自身的文化規則，更經由與它者遭遇的體驗，再度看見自己的文明模樣。旅人在進入島嶼生活的過程中，透過自身文化與島嶼生活的對比，再次確認自身文化已完成的文明進程。遠離家鄉之後的旅行，因此成為一面映照旅人自身文明的鏡子，而旅行也成為旅人重新確認自我存在、尋回自我的過程。

本章試圖還原 19 世紀在台旅人，作為進入異域的他者，遭遇了確實存在於個人身體感受上的生存問題後，經由島民與在台網絡的協助，並領受台灣環境與各種人事物的力道後，調整自我生理上的身體，找出一個可接受方式進行島嶼生活的，並開始與整個 19 世紀的台灣環境溝通的過程。另一方面，本章也將討論旅人作為一個優越的、少數的他者時，將自身文明所投射在 19 世紀台灣環境的舉動，以其文明認知中的身體感再度確認自身文明所呈現的優越狀態。透過這兩個部分的描繪，重新討論旅人、旅行書寫與他域之間的複雜交織狀況。



第一節 旅人的處境

在上一章的討論中，我們看見了西方旅人將 19 世紀台灣島民視為他者，以按圖索驥並加深文化刻板印象的方式將台灣島民界定為三種類他者。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當時在台灣旅行的西方旅人，對 19 世紀的台灣島民、文化與環境各方面而言，亦是不折不扣的他者。雖然讀者並無法直接從 19 世紀旅人的筆記資料中獲知此事，但旅人所記錄下的自我身體感受，卻是完全的反應了這個現象，所謂的自我身體感受，本節將採用余舜德於〈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一文中的說法，將身體感定義為「身體做為經驗的主體以感知體內與體外世界的知覺項目(categories)」。¹⁴⁸

余舜德認為這些項目是個人成長過程中，身體長期與文化環境互動所養成，而這類的互動則是人們解讀身體所接受到的訊息及各種具文化意涵之行動的藍本，換句話說，這個互動是每個人在接受大量且龐雜的身體感受訊息時，將這些身體感受放入秩序(put into order)、加以譯解(decode)，並做出反應的根本，也是個人行動所依賴的基礎。¹⁴⁹相同的，旅人也在進入異地時，使用個人身體與 19 世紀的台灣環境進行交涉。透過自我身體能力與文化概念來經驗異地，而這個身體感受實際上並不如文章所說那樣英勇，而是充滿挫折與難受。因此，本節將從旅人的「身體感」做為觀察點，展現旅人遭困、受苦的處境，從這些散落的片段看見 19 世紀台灣的生命力。

(一) 適者(試著)生存

• 隨著苦難而來的存在感

從 19 世紀進入台灣的西方外國旅人所留下的筆記看來，旅人期待在台灣進行的冒險幾乎都可以成行，於是西方旅人對當時台灣的理解甚至超越許多住民和官員，也成為後人理解 19 世紀台灣的絕佳素材。的確，西方旅人若要前進東方並沒有任何的攔阻，除了有國家資源在背後支持之外，進入台灣之後，還有傳教士與教會網絡提供了部分的探索住宿、路線帶領，並提供資訊。然而，旅人在台灣的冒險旅程中，對台灣的島嶼型氣候與環境的陌生，產生許多不可預期的干擾，小型事件多可順利就地解決，大則可能喪命，一如萬醫生(Patrick MANSON)¹⁵⁰

¹⁴⁸ 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清大出版社，2010，頁 15。

¹⁴⁹ 參照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頁 15-16。

¹⁵⁰ 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1866-1870 年在台服務，受聘為中國海關醫員(Medical officer)駐打狗，其主要業務是診療外籍人士及作氣象報告，被譽為世界熱帶醫學之父，並利用餘暇，旅行蕃界，學習土著語，乘馬、打獵、海水浴、釣魚、從事園藝生活。資料來源：教會史話第三輯，

指出剛到台灣的歐洲人所碰到的適應狀態：

新上岸的人很晚就寢，吃、喝、吸煙一如在歐洲；老一輩的移殖民在適當的時候就上床，吃、喝、吸煙都很節制。漸漸地，新上岸的人得到一些嚴厲的教訓，對陽光、雨和風都很小心，穿衣以禦寒，生活飲食有所節制，這是沼澤地區的一種教育。「適應新環境」以大的尺度來說意謂經驗、教育，不僅僅是個人下意識生理上的適應，也是他的習慣明智的適應。¹⁵¹

萬醫生的敘述簡要闡明旅人進入異地—特別像是台灣這樣的熱帶小島，首先遭遇的身體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因應辦法。旅人不只是生理健康狀況改變，身體感官也需要新的適應練習。以飲食為例，如船艦上的軍官認為「定居下來以後，不管願不願意都得將就點，因為缺乏新鮮的食物，罐頭食品變成了日常飲食的基礎，顯得單調異常」。¹⁵²實際上，不只海岸邊的海關與軍艦人員因為食物供應受到限制，進入島嶼的旅人更是如此。

由於旅程天數與休憩站距離等環境因素，旅人時常得體驗新的飲食模式，而這類新奇飲食對疲憊的旅人而言，似乎因為體驗差異，而使自己更加進入旅行狀態，一如史蒂瑞前往埔社以東所進行的野蠻人探訪之旅，抵達一個休息小屋時，觀察後發現，這將會是一個不太舒服的夜晚：

他們起了火，把一個寬淺的鑄鐵平底盤放在火上，煮米飯與芋頭給我們做晚餐。漢人僕人說，即使飢餓已戰勝味覺、清潔等精緻的感受，但如果想吃的话，最好還是別看是怎麼煮的。在圍站著等待那糊狀物煮熟時，我們發現身上爬滿跳蚤，是從狗身上和四周的舊乾草來的。我們趕緊搬到穀倉去，那是此處可提供的唯一的另外一個避身處。這是一個很奇特的小建築物。用草與樹皮做成。有四個柱子架撐，離地面約四英尺高。每個柱子上都有木頭的頂蓋，以防松鼠等物爬上去。這只能給我們遮蓋，但沒有其他的保護，而夜晚看起來會很冷。我們於是在迎風的那面掛起一條毯子，地上放一個中國床墊，夜晚準備就緒。等待晚飯。他們把飯拿過來給我們。就用煮飯的鐵盤盛飯和芋頭，分量不少。儘管沒有桌子，我們還是好好享用了一頓。¹⁵³

史話 299：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 <http://www.laijohn.com/book3/229.htm>。

¹⁵¹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頁 44。原出自 *Maladie des pays chauds*, pp.102-103.

¹⁵²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頁 64、註 67，參考 *Triomphante* 號艦上軍官 Maurice Loir 所寫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aris, Berger Levrault, 1886, pp.218-219 和 *Les Archiv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vol. 562.

¹⁵³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9。

實際上，史蒂瑞經歷的這個夜晚並不算是一段特別艱難的時光，只是多數旅人在島嶼探險生活的一部分：單調且不甚衛生的食物成為飢餓與疲勞情境下維持身體運作的支撐品之外，漢人僕人以類似生活指導員的方式存在，希望旅人為了維持明日前進的體力，不要觀看烹煮過程，以免因此而無法進食。然而，轉移目標的旅人，只是將目光轉移到另一個需要擔心的事項而已。晚餐時間，因為沒有桌子，餐桌禮儀無法進行，而史蒂瑞一行人也將調理過程未知的食物，不遵守餐桌禮儀的，就著鐵盤吃下肚。

但這並不是史蒂瑞最無法忍受的事情，當他前往澎湖進行物種採集時，因為童僕的忽略將刀叉留在臺灣府，才讓他幾乎無法進食：

有好幾天我都用一個袖珍摺刀和一個小的中國湯匙來吃東西，因為我不會用筷子。全島上沒有一個刀或叉子。但幸好在我快餓死，吃法已差不多要變成「野蠻人」時，一艘中國的炮艇駛入港口。船上剛好有刀和叉，我就借用了，這才又能吃東西。¹⁵⁴

缺乏刀叉對史蒂瑞所造成的困擾並非單純的無法進食，背後其實隱藏著史蒂瑞對文明的堅持：因為無法允許自己回歸原始本能，成為使用雙手的野蠻人，又因不會使用中國筷子(另一種文明)，所以勉強自己使用摺刀和中國小湯匙進食。在這裡，旅人因為失去刀叉，反而更深刻的體認到本身所習慣的餐桌禮儀所代表的文明，以及身為文明人的困擾。

在飲食方面產生類似困擾的還有湯姆生，在他與馬雅各醫生一同前往內地的旅行中，旅途的疲累讓湯姆生「躺在一張蓆子上休息，而且馬上就睡著了，但後來卻被一陣瀰漫在屋裡的臭氣驚醒」。¹⁵⁵借住處的平埔番打開了珍藏的醃蘿蔔，湯姆生因此被嚇了一大跳。這個氣味，對湯姆生而言，或許並不只是嗅覺上的排斥，還包括文化間的差異和衝突感。而後，湯姆生決定「在旅途中，我給自己定下一個規矩，要盡量靠當地最容易買到的食物來過活」¹⁵⁶，這個看似體貼實則委屈的決定，透露出旅人身處異地，並在缺乏熟悉物資的情況下，不得不產生的妥協。

食物之外，居住空間也是文明旅人感到困擾的原因之一，例如湯姆生描述在甲仙埔留宿的房間狹小、家具簡陋(只有一個八吋竹製的堅硬平台充當睡床、兩

¹⁵⁴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2 June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08。

¹⁵⁵ 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64。

¹⁵⁶ 同上。

根粗木柴作枕)，但最令他忍受不了的，卻是缺乏良好安排的住屋環境：

野人與文明人的不同就在於他們對家居環境的安排全然不在意，也許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對文明人來說，這種生活著實難以忍受。比方說，這些平埔族人非常希望我們住得舒服些，便用蘆葦生起一大團火供我們的僕人煮飯，然而從他們生火的位置，濃煙確源源不絕的向我們休息的地方撲來。毫無疑問地，他們一定從沒想過這濃煙有多麼惱人。¹⁵⁷

濃煙之外，湯姆生藉著微弱燈光看見房間的全貌時，發現一個裝滿稻穀的大箱子就在床邊，這對文明人而言，是一個費解的安排，而湯姆生也因此對居住環境的期待只剩下：「希望老鼠夜裡能在這大箱子中找到合適的棲身之處，不要來打擾我們的睡眠」。¹⁵⁸

在湯姆生的書寫中，可以發現嗅覺排斥與居住環境的擁擠成為困擾旅人的主因，而我們或許可以從李尚仁〈腐物與骯髒感：十九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環境的體驗〉一文中找出原因。李尚仁從醫學史的角度重新解析了 19 世紀西方人與中國環境互動時所產生的厭惡感，來自於當時的公共衛生運動與政策的推行之疾病理論，依照的是「空間模型」(spatial model)概念。所謂空間模型主要強調：腐敗物質和垃圾所散發出來的有害臭味是造成疾病發生的原因，接觸與吸入這些氣體就會罹病。而預防疾病保持健康的方法就是透過衛生工程使人們得以與腐化物及其散發之毒素隔離。¹⁵⁹

因此，對 19 世紀西方旅人而言，維持身體健康的一大要素，不但需要遠離臭味、保持空氣的流動與潔淨之外，還必須保持住所的通風、寬敞，特別是在風土病時常發生的熱帶島嶼，旅人旅途中所見之密集且擁擠的島民住所，也意味著引發疫病的危險：空間狹小隱含著蓄藏身體之間直接碰觸、有毒氣味無法排出等概念，引發西方人的骯髒感與健康顧慮，成為西方旅人眼中不健康、不夠乾淨的象徵。¹⁶⁰

然而關於住所的不舒適感，對旅人而言除了不符合 19 世紀西方醫學中的整潔感之外，生活習癖跟不上空間環境的轉換，也使旅人立即感到所處空間並不舒適。由於人類對於居住的觀念實際上來自於周遭事物與自己的連結，而人們只能藉由自身(例如眼睛)感知空間、形塑「自己的空間概念」。實際上，空間是一種日

¹⁵⁷ 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64。

¹⁵⁸ 同上。

¹⁵⁹ 李尚仁，〈腐物與骯髒感：十九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環境的體驗〉，《體物入微》，頁 66。

¹⁶⁰ 參照李尚仁，〈腐物與骯髒感：十九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環境的體驗〉，《體物入微》，頁 69-70。

常生活的體驗，而非框架底下的產物，但經由框架，人們獲得方向與測量單位，才能感知空間的存在。然而空間本身並非只能以此種方式存在，框架縫隙當中的空間並非斷裂，只是人們為了指認方便而以此劃分，但空間從未斷裂。按照 Islam 引述海德格(Heidegger)的說法：「住所(dwelling)並非使自己位於客觀世界(objective world)，而是客觀世界因與我的關聯(relation)位居於我的居所」。¹⁶¹因此，對旅人而言，旅行時所產生的空間轉換，便成為居住在變動住所(dwelling in shifting dwellings)的體驗，而旅人必須以丟棄慣習生活型態作為交換。¹⁶²

旅人與環境磨合過程中所產生的不舒適、難受與痛苦回憶，造成旅人經驗台灣時產生自我內在與外在的斷裂(rift)：在內在文化認知中，這些痛苦既是讓旅人將 19 世紀台灣與自身分離(separate)，將之視為他者的理由，以此展現自己的英勇(或者狼狽)、再度區隔蠻荒落後與文明的差異，並重述旅人帶著(自身的/西方的)文明進入蠻荒的姿態。另一方面，透過臭味與擁擠感，西方旅人再度將 19 世紀西方文明中所謂的乾淨與舒適感提出，並將 19 世紀台灣陳述為一個充滿骯髒感的島嶼。因陌生住所而產生的難受又無奈的感想，成為旅人用來確認自身存於異地的方式之外，這些因痛苦與不舒適的身體感所帶來的深刻印象，也成為西方旅人與外在(19 世紀台灣)產生關聯(relation)的最佳片段。

• 生存二三事

西方旅人與 19 世紀台灣環境的磨合過程，成為旅途中旅人自身與他者聚合(gather)的一個開口，而透過旅人對其痛苦所進行的高度存在感書寫，除了可以看見存在於 19 世紀台灣的生命力與故有風土民俗及其生存智慧之外，也讓旅人於當地進行島嶼生活時必須轉換原有生活方式，因此看見台灣島民面對環境時所衍生的生存技巧，並透過身體技能的練習與身體感的轉換，西方旅人實際與台灣島民處於同一文化，並和當地環境力量抗衡時，發現島民所擁有的、值得旅人學習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透過身體的不適感，旅人們再次體認旅行過程中的移動，以及異地施予來者的他域的力量。

以旅人們從台灣西岸上岸時所轉搭竹筏的經驗為例：由於台灣西岸屬於沙岸地形，港口深度不足加上逐年淤積無法讓輪船靠岸，因此許多外國旅人進到台灣第一個深刻的印象，便是島民為了克服沙岸所使用的竹筏，為數眾多的類似敘事是這樣的：「無數的小帆船從一片繁茂的樹林中冒出來，立刻吸引了到達者的注意，這些奇怪的輕舟愉快的駛向他們的巨輪」。¹⁶³因為這類簡便的小竹船不需要

¹⁶¹Syed Manzurul Islam, *The ethnic of travel*, p.12

¹⁶²參照 Syed Manzurul Islam, *The ethnic of travel*, p.10-p.12

¹⁶³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頁 61-62。

鐵釘釘合，並有克服台灣西岸激浪與沙岸的特性，即便總是濕答答的，卻非常適合在多浪的海上航行。一如湯姆生經歷台灣府港口外的洶湧海面 and 淺灘後，向讀者進行的描述：

穿越這些淺灘也不是件容易或安全的差事，至少在海面洶湧時是如此。若吹的是西南季風，就更不可能通過了。我們乘坐用的大竹子綁成的竹筏上岸，竹竿先用火烤彎成凹型，再用藤條將竹竿綁在一起。一塊結實的木板固定在竹筏中央用以支撐桅桿，杆上則有一面大蓆帆。整個竹筏的設計沒有用到任何釘子，而這竹筏最奇特的一點，就是乘客坐的地方不過是個大桶子。¹⁶⁴

這趟溼漉又危險的上岸過程，誠實敘述了多數旅人的上岸經歷，台灣西海岸若遇西南季風吹襲時，上岸過程則更加不易，稍有大浪就會落海，因此旅人必須手腳緊扣竹筏，以免被海浪沖走。在這個時刻，旅人見識到了島嶼邊緣的大自然力量，而在台灣使用範圍廣泛、方式多變的竹，還有另一個讓旅人驚訝的例子發生在湯姆生和馬雅各醫生的內地旅行前往甲仙埔的途中。

在匏仔寮村(今寶隆)溪邊湯姆生遇見一座令他難忘的瘋狂竹橋：

從工程學的觀點來看，這座橋有極簡的美感，但卻也是我前所未見，最瘋狂、最不要命的設計：整座橋由一兩根竹竿組成，架在河的兩岸，橋身距離水面有十二英尺，河水的深度足已溺死巨漢。這些竹竿靠在突出於河岸的石頭上，在我看來，這種橋就是為了那些愛冒險的莽漢所量身打造。然而，土著們卻像走鋼索特技表演似的輕鬆穿過，只用扛的東西來保持身體平衡。如果我們想要到達旅程目的地，那麼除了過橋以外，別無他法。馬雅各醫生以前就看過這類建築，因此走起來也相對比較輕鬆。至於我呢，先把草鞋弄溼以增加彈性，然後張開雙臂，腳步呈現八字型，像雜記演員般的走過去。待安全到達彼岸，我還很得意的回頭一瞥剛才克服的困難。這類優美的竹橋對土著而言十分平常，在這個未開化地區，已足夠應付商業往來及相互溝通聯絡的需要。¹⁶⁵

在這段敘事中，湯姆生花了許多篇幅來描述一座竹橋，他先以工程學的科學觀點觀看這座竹橋的設計，接著藉由描述過橋的方式，透露自己認為這座橋設計不良，因為這必須讓他這個文明人不得不像跳樑小丑一樣的行走，實際上對湯姆

¹⁶⁴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40

¹⁶⁵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56、58。

生來說，困難的或許並不是實際行走竹橋時所產生的危險與荒唐，而是身為一個文明人必須遵從野蠻環境條件時，所產生的新體會，及隨之而來淡化自我文明強度、服膺於野蠻的恐懼。

當然，這座瘋狂竹橋對湯姆生眼中的「野蠻」島民而言，過橋並無難度。最後湯姆生自己下了一個結論，認為這優美但難以跨越的竹橋對這個未開化區域而言，已經很夠用，而這個說法同時也隱喻了湯姆生對未開化地區的看法。另一方面，湯姆生面對這座竹橋(未開化地區)時，實際上無法置身事外，他的角色已從文明的旁觀者，成為野蠻工具的使用者，以及未開化地區的體驗者。這個不夠安全的回憶，也因為湯姆生的體驗和評論，成為其遊記中用來添加趣味性、讓讀者理解一個文明人體會野蠻情境時的辛苦，並在此為文明與野蠻的交會下了註腳，並說明旅人實際上的困擾與身歷其境時的身心狀態：在美學上是優美的、但經驗時的瘋狂卻讓文明人的生命堪慮。

另外，在地形與氣候多變的台灣島內旅行時，還有許多瑣事足以干擾旅程進度，許多旅人因此經歷許多瑣碎的小困擾，一如史蒂瑞在火燒店(今臺南市柳營區)前往嘉義的途中所產生的體悟：

我們很快便發現，像苦力那樣穿上草編的涼鞋是個好主意，而且我們還在涼鞋裡穿上長襪，這樣一來就不怕被涼鞋的草繩磨痛腳了。草鞋又輕又透氣，行走在經常得涉過河流或小溪的山區，果然特別好用。我們也學漢人穿上寬鬆的中式上衣和褲子，雖然大部分在中國的歐洲人都把他們當作睡衣來使用，但它們更適合穿來跋山涉水。¹⁶⁶

當史蒂瑞以實用為目的，拋棄歐洲的審美觀念後，草鞋與中式服裝成為旅行良伴。如余舜德所說，人與物的交涉於開始的階段常出現一個學習與能力培養的過程，史蒂瑞將一件原本只從概念及知識性的層次上瞭解的「外物」(草編涼鞋與中式衣褲)，轉而成為自己有「能力」經驗、判斷價值，並將之納入日常生活的「己物」時，也同時建立起自己於異地生存技能。¹⁶⁷這些方式使旅人足以相對熟練的在 19 世紀的台灣生活。而為了成為一個合適在台灣島生存的他者，旅人還學會了多種生存技巧，好讓島嶼生活順利進行。

例如西方旅人在番人部落以唱歌交友、裸露自身的白色皮膚用來嚇唬漢人、同時親近番人；而漢人的過度好奇對旅人所造成的困擾，西方旅人開始學會避開居民騷擾並保護自身物品等。這些便是 19 世紀在台灣西方旅人在台灣自願或

¹⁶⁶ 史蒂瑞，《福爾摩沙及其住民》，頁 49

¹⁶⁷ 參照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頁 26。

非自願所進行的改變，一種類似在地化(going native)的過程，他們於練習生存技巧的同時，也因與台灣環境的互動改變了自我身體技能的運用，這使西方旅人不再自外於 19 世紀的台灣，反而經驗了身為 19 世紀台灣的它者的狀態，且更加貼近當地。¹⁶⁸

然而，這些改變仍然抵擋不了氣候環境與疲勞生理下所產生的疾病。在 19 世紀台灣進行長途旅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容易因為嚮導、路況、天氣與其他因素造成旅行中斷，體力也是一大考驗，加上補給休息站的距離遙遠而必須趕路的壓力，旅人的疲憊讓旅行的困難增加許多。例如湯姆生與馬雅各醫師在深入內山後，回六龜里的途中，湯姆生認為自己「感到極度疲勞，好想躺下來睡覺，而不想架起相機拍照。但是我們完全沒有時間，因為除了要花上一整天拍攝之外，還必須在天黑前趕二、三時英哩路，所以一刻也沒歇著」。¹⁶⁹由於湯姆生是個攝影師，必須帶著大批攝影儀器進行拍攝，因此在疲憊狀態下的旅行困難度更高。不只是短暫停留台灣的湯姆生，連長期在台灣進行醫療與傳教工作的馬雅各醫生也因長途旅行而感到身體不適，然而既定工作卻讓一行人必須繼續趕路。

為了提振精神順利走完回程，在經過一大片平靜的水域時，湯姆生一行人便暫時拋開禮儀包袱，下水游泳，「這也許有點冒失，但確讓我們恢復了精神」。但生病的馬雅各醫生病情似乎沒有好轉：

幾個小時後，馬雅各醫生感覺身體非常不舒服，不得不躺在灌木叢的樹蔭下。在這個地方，方圓數里內都取不到一滴乾淨的水。在馬雅各醫生的請求下，我給了他一劑奎寧和鐵，一個小時後，我們又可以再次上路。¹⁷⁰

疾病的侵襲讓長期待在台灣的醫療傳教士也無法抵抗，旅人的困乏也可因此推測必然時常發生。然而，這段艱辛的路程對湯姆生而言是有代價的，「我在這地區拍了一張深泥坑的照片，可是必須多走十英哩的路，才能弄到一點水來洗玻璃感光片以製成底片。但不管怎樣，這張照片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¹⁷¹在這段敘事中，旅人成為台灣大自然中狼狽的過客，但旅人不忘強調克難情形下，自己仍然有所收穫，以此平衡前述無能為力的狼狽狀態。

整段旅程最後當然還是有個完美的收場：湯姆生一行人終於走到了收容這疲

¹⁶⁸感謝口試委員莊雅仲老師提供 going native 的觀點，使例子能以更聚焦的方式說明。

¹⁶⁹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76。

¹⁷⁰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78。

¹⁷¹同上。

累困乏一行人的接待所，而旅程中暫時的虛弱也一掃而空：「我要特別強調，這個晚上我們睡得非常沉，體力也恢復不少。友人馬雅各醫生雖然發燒又生病，第二天早上還是能夠主持宗教儀式」¹⁷²。

從此段落的零散敘事，讀者可以看見旅人與 19 世紀台灣的氣候、環境與文化遭遇時，所感知的負面情緒與驚險畫面，而這也是旅人在旅行時感知自身存在的重要時刻，他們重新整合自己對 19 世紀台灣住民的想法，並且利用因身體感知而學習到的生存智慧在島嶼上移動。

(二) 有限度的移動：買辦、嚮導和禁忌

• 關於買辦的二三事

為了在島內移動，並與島民交易，旅人與臺灣島民的交涉實屬必須，除了肢體語言之外，旅人學習當地語言，或者依靠翻譯生活。然而，除非像是必麒麟那樣具有語言熱情與天份，並長時間待在東方的西方旅人，否則一般調派到中國的旅人無法長時間練習漢語。因此無論在中國或是台灣都需要另一種溝通語彙以便日常生活的運作，一如史蒂瑞所說：

在中國，商人與銷貨員之間，主人與僕人之間，他們所用來溝通的語言，對剛抵達的外國人來說，成為一件相當有趣也很重要的事。因為那是讓人瞭解自己的唯一方法。¹⁷³

史蒂瑞所說的溝通用語就是洋涇濱英語(pidgin English)，也是所謂的商務英語。洋濱涇在《關鍵詞 200》一書中的定義是指：

當幾種人群聚在一起，使用同樣的語言，但均是用非常不同的方式來述說，文法和辭彙也各自不同，且任何一個族群的人，原來都不是用母語的方式來運作，此時他們溝通的語言就可以稱之為洋濱涇。¹⁷⁴

所謂非常不同的方式，從史蒂瑞的對此語言描述可見，洋濱涇「是將漢語的詞、句照字面譯成英語。漢語特有的成語、句子結構等都完全保留」。¹⁷⁵根據我們學習英語的經驗，讀者可以想像這樣的溝通必定充滿趣味與誤會，史蒂瑞便舉

¹⁷² 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78。

¹⁷³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0 April,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76。

¹⁷⁴ 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彙編》，台北：麥田，2006，頁 194。

¹⁷⁵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0 April,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77。

了幾個例子說明，例如「一個人若晚餐想吃橘子，可以跟僕人說：「得我的一塊橘子」(catchee my one piece orange)」。¹⁷⁶另一個例子，則是史蒂瑞暫時借住廈門領事家時發生的：

有一天僕人來到我房間，說「有得下面兩塊英國人要見你。」(have got down side two piece Englishman, wanchee see you)後來終於搞清楚「下，面」(down side)是樓下的意思。下去後，發現「兩，塊，英國人」(two piece Englishman)原來是兩個美國傳教士來訪。¹⁷⁷

從這個例子便可以看出西方旅人與中國僕人溝通時所需花費的力氣與時間。而身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桂格教派)¹⁷⁸，史蒂瑞對主教(pope)一字在洋濱涇的表達也相當有興趣，「一個第一，上面，天堂商務，人」(one piece number one, top side, heaben pidgin, man)。¹⁷⁹由此可知，這個語言的字彙順應著兩方文化碰撞時的需求所延伸，雙方都進行了轉譯彼此的工作，企圖用一種共同的語言模式回應。

毫無疑問的，中西方的商務往來活動更是這個語彙的展演空間，而其使用者，大多數是與西方旅人接觸的僕役和買辦。西方勢力早在接觸東方時，便開宗明義的希望打開中國的貿易大門，因此與西方接洽的人員—買辦，關係密不可分：

買辦在中國的商業圈子裡是老行業。在簽訂各種條約和引進外國督察制度之前，中國港口的生意因為外國人沒有權利直接介入，因此透過買辦或他的助理「銀師」來進行。這些中間商為外國人的利益工作，他們與海關當局接觸並完成各項進出口必要的工作。¹⁸⁰

1842年當清帝國廢除公行制度後，外國人接手海關業務，但買辦中介雙方的重要角色仍是西方商人與官員所依賴的輔助對象，買辦的工作包括招募與管理中國職員、並在各方面協助洋行進行貿易，例如派遣助理銀師(Schroffs)檢查偽幣、雇用苦力裝卸貨物等。然而對洋行而言，最重要的卻是透過買辦「得到有關中國公司的型態和支付能力的正確資料，有了他的介紹，我們才能找到職員和傭人」。¹⁸¹讀者從這些敘事中，不難看出外國洋行對中國買辦的依賴。但在討論 19

¹⁷⁶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0 April,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77。

¹⁷⁷ 同上。

¹⁷⁸ 參照李王癸，〈《福爾摩沙及其住民》及其作者〉，《福爾摩沙及其住民》，頁 xv。

¹⁷⁹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0 April,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77。

¹⁸⁰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頁 92。

¹⁸¹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頁 92，註 49。

世紀的台灣買辦與西方旅人之間所發生的交集事件之前，必須從做為東西雙方的中介角色——買辦的職業性質與其特殊的環境因素談起。

在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一書中，作者將認為：近代西方擴張後，因種族和文化的衝突，新的社會、新的民族和新的文化正在出現，中國面臨全盤轉變時，在各種文化匯合而產生的混合社會裡頭，買辦這個職業不但成為東西雙方經濟交易時的中介人，也成為東西方文化碰撞中首先出現的文化混血兒。但中國買辦與洋行之間緊密又緊張的關係，使雙方必須依賴彼此共生：買辦因洋行的給職而有了進入新式商業與改變自身社會地位與累積資本的契機，而洋行則需憑藉中國買辦的辦事能力替公司在中國生根，並拓展業務；但中國買辦的在地資源豐足，使洋行必須小心翼翼的對其進行監督，以免中國買辦作出不利公司的決定。

然而，外商成功的關鍵來自於公司能夠根據當地狀況作調整以因應該地的特殊環境，洋行利用買辦各自不同的背景與能力，以此發展其所經營的業務，因此，買辦的個人特質成為外商是否成功的關鍵；而洋行與買辦兩者間的關係，則成為外商最重視的成功管道之一。實際上，一旦受到洋行雇用，多數買辦便以雙面手法應用自己的資源，一方面以買辦身分進入洋行受職；另一方面培養自己的人脈與資產，企圖在地方社會甚至國家政治關係中取得地位，尤有甚者，還培養家族成員成為買辦一職，或將資本轉向投入進入其他產業。

但買辦除了經手東西雙方經濟上的交疊以此獲得好處之外，郝延平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買辦確實是在兩種文化的邊緣重疊之處起作用，因而不是處於一種完全或充分重合的兩種文化的媒介位置」¹⁸²，而且買辦正是典型的「邊緣人物」¹⁸³：他們實際上不屬於東西文化兩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因時勢轉變而起、享受西式生活、擁有新社會觀，強調工商業發展、不強調軍事和綱常倫紀，但他們仍然追求中國地方社會結構中的地位¹⁸⁴，因此回歸並提升自己與家族的社會地位，成為多數買辦的工作目的地之一。

類似的模式也在 19 世紀台灣進行，然而最大的差異則來自於買辦自身。當時在台灣的買辦，除了台灣在地家族之外，還有許多屬於來台工作，但家族仍在中國，且沒有在台灣定居的想法的買辦。少了買辦家族產業的落腳，以及身處多元文化交接處等因素，讓洋行與買辦之間的關係更顯緊張，而洋行對買辦的依賴

¹⁸² 郝延平著，李榮昌、沈祖煒、杜恂誠譯，《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頁 270。

¹⁸³ 參照郝延平著，李榮昌、沈祖煒、杜恂誠譯，《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頁 8。

¹⁸⁴ 參照郝延平著，李榮昌、沈祖煒、杜恂誠譯，《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頁 223-257。

也更加深刻，雖兩者仍存有互生一般的關係，但在 19 世紀渡海來台的中國買辦卻不一定是全心全意的為洋行設想，例如必麒麟在天利行(Messrs. McPhail & Co.)服務時遭遇的買辦觸法並捲款潛逃事件。

在必麒麟的敘事中，該中國買辦出身世家，並有一筆龐大私產、攜家帶眷從廈門渡海來台，看似公正不阿、舉止得宜，作事能力非常強，並獲得天利行老闆信賴：

詹姆斯和尼爾兩兄弟對他十分讚賞與信任，認為他是本公司的驕傲，有上進心，足智多謀，常常提出一些巧妙的計畫，使公司業務大有發展。所以，任何人若想提醒老闆小心提防這個買辦，是絕對不會被接納的。¹⁸⁵

然而必麒麟卻沒有商行老闆對買辦的信任，必麒麟先是發現買辦刻了一顆中國海關的釐金稅印，而被發現時，買辦卻不慌不忙的說出自己的計畫：他表示自己與道台取得協議，由天利行「徵收『釐金』，屆時當然需要釐金收據的印章，貼在鴉片煙的外箱上，所以才要雇個雕刻師先把印章刻好」。¹⁸⁶這個計畫讓必麒麟開始懷疑此買辦的動機。

接著，又在某次道台衙門托天利行專差送一件公文到打狗領事處時，必麒麟與買辦都在現場，買辦卻擅自拆開信封，欲看公文內容。而當必麒麟質疑時，買辦卻只是輕描淡寫的回答：「這是漢人的作風」。¹⁸⁷這些事件在必麒麟向天利行老闆陳述後，依然無法動搖商行老闆對買辦的信任，最後，買辦藉著押運貨物從台灣府前往打狗的理由，帶著資金與財物離開台灣，直到官兵準備查封天利行時，洋行才知道自己的損失，而必麒麟自始至終對買辦的懷疑，到此刻才得到回應。最後，天利行因買辦捲款潛逃，加上商行的其他損失，終至破產，以拍賣給怡記洋行(Messrs. Elles & Co.)作結。¹⁸⁸

上述事件的描述中，必麒麟雖將自己描述成是個具有真知灼見的先知，企圖突顯自己的智慧與勇氣，實際上則暴露出外國人在台灣貿易的困境。洋行要在 19 世紀台灣進行交易，除了資金與人力之外，還是需要運氣的協助，一如郝延平對買辦所下的註解：「如同任何“邊緣人物”一樣，他們有自己的局限性。他們是精明能幹的，可是並非總是誠實的」。¹⁸⁹而天利行老闆對中國買辦的信任感，顯然並沒有得到等值回應。一如買辦身為不屬於任何一方的介於兩個文化之間的

¹⁸⁵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225。

¹⁸⁶ 同上。

¹⁸⁷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227。

¹⁸⁸ 參照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224-231。

¹⁸⁹ 郝延平著，李榮昌、沈祖煒、杜恂誠譯，《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頁 11。

中介者，買辦的道德也似乎都不符合兩種文化下的標準。

對必麒麟筆下的中國買辦而言，這個捲款而逃事件無關乎道德問題，畢竟台灣非其歸所、而西方商人也非我族類，他對自己到台灣的目的地相當清楚：大撈一票，走人。中國買辦達成目的後便離開，徒留被坑了的洋行自行善後。而在郝延平的分析中，認為許多中國買辦在累積足夠資金與人脈之後，往往將資產轉往商業與工業，成為獨立商人。換句話說，買辦這個職業在郝延平的概念裡只是用來累積資產並提升社會地位的跳板¹⁹⁰，若用這個概念理解必麒麟敘事裡的中國買辦，或可窺見當時中國買辦在台灣某些社會狀態，與西方旅人對中國人刻板印象和不信任感的加深原因。

買辦與西方合夥人截然不同的兩種工作態度，因此成為洋行運作的不定時炸彈，而外國商行與買辦的互利共生卻相互猜忌的情況，在必麒麟的故事中也得到了印證之外，也同時呈現西方旅人因對他國文化與社會結構不理解所產生的困境與損失。

• 隨時會喊停的嚮導

除了買辦之外，與西方旅人最常接觸的就屬帶領旅人進入台灣內部的嚮導。在旅人筆記中，旅人的移動方向與目的雖早已訂定，但是成行卻需要許多在地資源協助，特別是嚮導的帶領。雖然旅人總是在出發前就已經和嚮導約定好交換條件，但因路段、氣候等問題，整個旅程其實是以嚮導的判斷作為前進的指標，因此當嚮導決定休息，或者反悔不繼續往前走時，旅人也只好莫可奈何的接受，或是與嚮導鬥智。根據旅人筆記的紀錄，擔任嚮導的人為數眾多，而且多是平埔番人，男女都有，男性不分年齡，而女性多以年長婦人、嫁到漢人家庭，或是與生番結婚的女性為主。當然也有商人或是信仰西方宗教的台灣島民。

這個段落，將以兩個例子敘述旅人與嚮導間的互動，透過這兩個例子，看見西方旅人在 19 世紀台灣移動的困難。第一個例子是史蒂瑞在 1873 年前往埔社以東的野蠻人探訪之旅作為主要描述¹⁹¹。由於這段旅程需要橫越島嶼中央，因此出現許多因嚮導不願繼續向前而和旅人斡旋的片段。在出發之前，史蒂瑞開始準備旅程時，早有失望多次的準備，能夠出任嚮導的人數不但少，人選也不如預期：

少數幾個交易商人在跟「野蠻人」做生意時，學會他們的語言。這些人是我們找到通譯與嚮導的唯一機會。甘為霖牧師上次去造訪時，曾帶了這樣

¹⁹⁰參照郝延平著，李榮昌、沈祖煒、杜恂誠譯，《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頁 223。

¹⁹¹參照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7-94。

一個嚮導，是個名叫 Atun 的熟番。此人吸食鴉片，是個壞蛋。只要可能就欺騙甘牧師。¹⁹²

雖然史蒂瑞並不算太滿意這位嚮導，但在好奇心與冒險慾的驅使下，仍與 Atun 進行交易，經過討論幾天之後，總算啟程。

第一天的晚上，因為途經遇見的墾殖地區人們的勸阻，「Atun 停下來，那天不肯再往前走。於是我們很不情願的接受一個跛足老人的邀請，晚上在他的小屋過夜」¹⁹³，史蒂瑞從旅程一開始就無奈受限於嚮導的決定。

但在這段旅程中，史蒂瑞一行人也並非完全處於被動姿態，隔天早上史蒂瑞就與嚮導進行協議「Atun 發現要是我們不再往前走，付給他的薪資就會大減，終於帶路前往山谷，朝著那些村莊走上去。不過每碰到一個老「野蠻人」，就停下來跟他交談，要求許可繼續前去」。¹⁹⁴

讀者可以發現，旅人很快就學會與嚮導交涉的方法，而這也是旅人在途中所體認到的台灣生存方式之一。然而以錢交涉的方式並不是每次都管用，在旅程的最後，史蒂瑞一行人在距離太平洋不遠處，但因「找不到人帶我們再深入，Atun 堅決拒絕前進，所以除了回頭別無他法」。¹⁹⁵旅人終因缺乏指引不得不放棄計畫中未完的旅程。

另一個例子，則是史蒂瑞在 1874 年春天在萬金庄參加生番趕集的故事¹⁹⁶。該地區的平埔番與山上生番交易頻繁，加上通婚，因此平埔番能夠理解生番語言，嚮導人選並不缺乏，但從史蒂瑞的敘述中，卻可以發現旅人與嚮導間交涉時的考量：「萬金庄的平埔番告訴我們，進入生番的地盤進行訪查是相當危險的行為。他們或許是藉著強調其危險性，用以抬高引導我們入山的報酬也說不定」。¹⁹⁷經過一番交涉，最後有四位通曉生番方言、據說跟生番交好的平埔番，願意出任嚮導。而為了拜訪萬金庄山上的生番，史蒂瑞的漢人僮僕因曾訪問過即將前往的部落，因此也在前置作業中給了一些指導：

¹⁹²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7。

¹⁹³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8。

¹⁹⁴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9。

¹⁹⁵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93。

¹⁹⁶ 參照史蒂瑞，《福爾摩沙及其住民》，頁 139-155；《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09-116。

¹⁹⁷ 史蒂瑞，《福爾摩沙及其住民》，頁 139。

他跟我說，除非我們事先買些米酒(samsu)當作禮物否則別想入山拜訪他們。旺仔買了大約一加侖味道難聞的漢人烈酒，其酒精濃度大約跟白蘭地差不多，然後加入許多水，直到滿滿的一大桶為止。他說酒不能太烈，否則會讓他們喝得爛醉。之後他再加入薑和其他調味料，攪拌一下就大功告成了。¹⁹⁸

在這裡讀者可以看見旅人藉著台灣其他島民的協助，探知生番喜好，以禮物與酒討番人歡心，並仔細評估禮物的效用，以期訪察、採集與交易能順利的進行。在這個過程中，旅人為了成就探查目的，在某種程度上遭遇了番人習俗。

然而，在旅途中成為阻礙因素的，還包括與嚮導接洽的番人。作為被觀看者的番人，看似處於被動位置，實際上在這個敘事中可以觀察到的卻是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微妙關係，這個關係絕非固定，不但兩方各有盤算，且在交涉過程中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互妥協的意味。這趟進入深山的旅行中，史蒂瑞認為下山與之交涉的番人在一開始展現遲疑態度的原因，「若不是出於恐懼，就是希望得到更大的賄賂」。¹⁹⁹而番人的顧慮則是認為，旅人的出現可能會讓部落內正在種植的小米幼苗被太陽燒死。

兩造協商許久之後，當史蒂瑞再給出一些紅布，番人終於同意旅人前往拜訪。他們分擔史蒂瑞一行人的行李，帶領隊伍前行。接著一行人開始走上峽谷。就在及將穿越一條強勁溪流時，史蒂瑞面臨番人開始討價還價的場面：

在首次越過溪流時，「野蠻人」將行李丟下，要我們付錢，否則拒絕前行。他們拒收我給的布料，似乎即將離棄我們。照這樣子，我推斷他們會搶奪所有的東西，最好還是回頭。所以就叫僮僕把送給酋長的紅布料收起來。因我決心，若不讓我們進入，就別想從我們這裡得到好處。但他們已先送過去部分的布料，也不打算去要回來，直到我把酋長手上的槍搶奪過來，也同時備好我的槍，以防有什麼麻煩。紅布很快送回。我雇用的平埔番拿起行李，我們開始往回走。「野蠻人」此刻發現我們真的打算回頭，就跟著我們，用手勢說服我們跟他們走。既然他們準備待我們好些，我們也就轉頭，跟他們去了。²⁰⁰

在這次的協商片段中，讀者可以發現史蒂瑞的判斷越發熟練，展示出旅人在島嶼生活裡所學習的斡旋技巧。而在文中旅人看似強硬的態度，實際上卻是處於

¹⁹⁸ 史蒂瑞，《福爾摩沙及其住民》，頁 139-140。

¹⁹⁹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3 Jul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12。

²⁰⁰ 同上。

缺乏援助、只能隨機應變的危險情境中，這便是旅人在台灣內山與整個環境交會時最常面對的處境。

• 禁忌！禁忌！

另一個使旅人為難的時刻，則發生在番人禁忌出現的場景，而旅人也只能入境隨俗的參與其筆下所謂迷信、奇怪且無法理解的情狀。例如史蒂瑞在前往埔社以東的野蠻人村落時，就記錄下一連串的禁忌事件：

史蒂瑞一行人穿過一個小鎮時，發現周遭氛圍有點不對勁，此時嚮導告知最好保持安靜，接著史蒂瑞一行人「見到一個房子後面陳列了一些人的頭殼，就上前去細看。在一個小平台上有二十四個排成一排」。²⁰¹便推測此地區最近才舉行了某些儀式，並描述這些人頭：

其中多半是陳舊發白的，但有幾個靠近中間的，還有些皮膚與人肉在上面，乾枯到看起來有最可怕的怒容，而「野蠻人」把牙齒敲掉做成項鍊的習俗，只有使其更加可怕。有幾個砍得很深的大切口，好像是用斧頭或很重的刀砍的。我拿出筆記本，想替那場地做個素描。這時 Atun 又來干預，說我們檢視那些頭殼讓他們生氣。我們只得作罷。頭殼很快就被移到較不惹人注目的地方。²⁰²

在這個奇異的氣氛下，史蒂瑞的素描工作無法如願進行，之後史蒂瑞又為了採集鳥類進入一個濃密的小竹林。但回到村落時，卻遭每個人的驅趕，「直到 Atun 拿來一葫蘆的水，灑在我的臉上、手上和胸上，這就把我所受的邪靈(無論是什麼樣的)淨除了」。²⁰³就史蒂瑞的初步瞭解，竹林「是一個埋葬場，他們都據怕神靈而不敢進入從這件事與其他幾件事上，我們推斷出，這些『野蠻人』生活在高度迷信與禁忌的壓力下」。²⁰⁴不得不的入境隨俗，讓生番禁忌成為旅人的禁忌，並困擾著旅人。

而史蒂瑞另一次的禁忌經驗，則在進入萬金深山時發生：因為部落禁忌的關係，使旅人無法獲得任何食物與火的補給，而夜晚也因禁忌而無法進入主屋，必須在附近的小草屋過夜，隔日禁忌雖漸漸解除，但史蒂瑞尚且無法順利與番人交易。「有個老人想用煙斗交換一些布料，酋長發出『parisi』這個字，就讓一切停

²⁰¹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90。

²⁰² 同上。

²⁰³ 同上。

²⁰⁴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91。

止進行。此字所含的意思似乎極為恐怖、危險，而沒有『野蠻人』膽敢違背」。²⁰⁵

隨後不斷重複出現的「parisi」禁忌延伸到旅人進行採集植物與路上的其它物件時，讓史蒂瑞的採集活動相當不順利，「我的『野蠻人』朋友很快跟蹤而來，纏擾不堪，我只好放棄。不得不將就於匆匆放進嘴裡與口袋裡的那幾個」。²⁰⁶經過上述的生存考驗與抱怨，旅人最終還是在筆記裡展現出自己生命的韌性，他們輕描淡寫的帶出那些在異地出糗、吃憋的畫面。

這些記事成為讀者閱讀時的縫隙，透過這個縫隙，讀者所看見的旅人不再只有單槍匹馬闖蕩於蠻荒島嶼間的英勇形象，他們也會思鄉、會生病，會因為環境而改變自己。即便西方旅人並不拋卻自我文化價值與文明優越感，但在 19 世紀台灣旅行時所面對的不同空間感與強迫適應，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鬆動了旅人所認定的社會與文化疆界，他們不得不與當地相處，而這個過程則進一步的挑戰著旅人的空間感知，一如 Islam 引述海德格討論關於心靈外在與內在對於差異狀態產生時的呈現所言：『痛苦本身即是差異本身(pain is the difference itself)』；這句話說明：這些難受的時刻，成為旅人在空間感知中與異文化遭遇的過程。也成為拉鋸旅人內在(西方文明)對外在(19 世紀台灣)認知的一個開端(threshold)。²⁰⁷

當島嶼施力展現於 19 世紀西方旅人來台所留下的筆記中被閱讀時，旅人呈現出更多元的形象，透過旅人的不適感、被限制住的旅行，或是無法理解的他者文化，以及與島民共生卻相互懷疑的人際往來等敘事，結構出旅人島嶼生活的另一面，也讓旅人更進一步的體認自我與它域、它者、他文化之間的差異。面對這些片段的西方旅人似乎成為文化衝擊下的受害者，深刻體認自己身為 19 世紀台灣裡頭的他者，及他者所經歷的現實生活中的弱勢與自我文化中道德品格的高貴。於是這些「它」，成為一面映照旅人自身的鏡子，反而更加展現出旅人的「我」的概念。

²⁰⁵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3 July 1874.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14。

²⁰⁶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3 July 1874.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14。

²⁰⁷參照 Syed Manzurul Islam, *The ethnic of travel*, p.20

第二節 旅行作為映照自身的鏡子

經過筆記中落後文化的洗禮，旅人竟像是穿越折射鏡一般，再次看見自己的模樣，周遭落後又原始的環境居然一步步轉變為家鄉景色的對照。旅人在生理觸覺感官上忍受著許多不適，造成旅人不適感的原因來自於異地缺乏旅人所謂的「文明環境」，因此旅人更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西方旅人在旅行 19 世紀台灣時，台灣之旅成為旅人自身文明的最佳墊腳石之一，西方旅人也藉此展示出自身所背負的文化的身體。透過對台灣的欲求、對台灣物產的運用，以及思鄉時所產生的對比性(野蠻/文明；骯髒/乾淨)詞彙，旅人的優越感與驕傲也因此理所當然的展現於世人面前。

本節將從旅人在 19 世紀台灣的遭遇，探索旅人透過其文化的身體面對台灣時所產生的慾望和鄉愁，並循著旅人目光看見 19 世紀台灣成為映照旅人自身的一面鏡子。

(一) 如入寶山，慾望無盡

既然進入 19 世紀台灣這個在西方旅人想像中的世界圖譜裡這一個蠻荒小島，必須承受的生理痛苦與文化衝擊不勝枚舉，而且必然發生，那麼，旅人為什麼願意承擔風險，走訪台灣山林間呢？在許多旅人筆記中，都出現了一個類似解答的回應：

所有在亞洲，特別是在福爾摩沙居留過，協助充實科學數據的各學科專家的名單很長，我們不能一一列舉，我們只要記住，這塊熱帶地區如同一種大自然的微縮景觀，吸引了科學家們的注意力，證明了他在各個研究領域中如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和鳥類學等的重要性。²⁰⁸

一如白尚德的說法，旅人認為自己來到一個值得研究的、值得介紹給世人的島嶼。更甚者如必麒麟，則認為「這座島上也有無數罕見珍貴的植物，我相信范區(Veitch)先生和其他熱心的植物學家，已蒐集不少台灣高貴蘭花和裝飾性植物，豐富了大英帝國的溫室」。²⁰⁹必麒麟精準的說出他域(在此指 19 世紀台灣)作為填補知識庫的想法與國家力量的延伸，並間接將 19 世紀的台灣視為一座無人管理、沒有知識體系的島嶼，進而突顯出旅人在此進行各項活動的正當性，透過外國旅人的活動，將台灣這個島嶼從蠻荒的範疇推進至文明規範中。當我們將這個文明的隱喻作為理解旅人思維的基調，便不難理解旅人在筆記中描述的舉動，

²⁰⁸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頁 88。

²⁰⁹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62。

及其面對 19 世紀台灣時所呈現的意見。

西方旅人對文明的想像，以及企圖將台灣推進至文明範疇的舉措，實非特例，在旅人筆紀下的 19 世紀台灣更是不勝枚舉，例如史蒂瑞面對失語的平埔族時，所展現的企圖心。史蒂瑞在高雄崗仔林附近的聚落，發現當地平埔番已失去自己的語言、且不遠處有個老婦人她會一些自己語言的詞彙時，史蒂瑞便越過陡峭的山丘尋找這位婦人。「雖已八十多歲，她仍坐在地上挖花生。她給我很長一個詞彙單。(從這些詞彙)似乎可看出平埔番與此島『野蠻人』，以及馬來人是有親緣關係的」。²¹⁰

史蒂瑞似乎沒有發現，相對於失語，老婦拿給史蒂瑞的詞彙單並不尋常，史蒂瑞自覺「因為打擾了她，我給她一元錢做為酬謝。她似乎非常高興，我走的時候還祝福我」。²¹¹就老婦與史蒂瑞一來一往的過程中，史蒂瑞的謝禮與老婦的熟練，以及詞彙單的出現，或許可以推論這類似交易的情景並非首次發生，然而史蒂瑞並沒有注意到這個可能性，在獲得平埔番語言資料後，他試著比對台灣番人與馬來人語彙之間的差異，欣喜於知識上的拓展，認為這是從荷蘭時期所留下的遺稿²¹²，而無其他懷疑。

專注於發現新知識而忽略其所面對的陌生族群本身這類的類似情況，也在史蒂瑞在埔里與水番交會時發生。史蒂瑞認為「這整個族群，從酋長到底下的人，結果都是大乞丐，不斷到我們房間來要東西。但因我們本就想盡可能多見到他們，而我也試著記下一些他們的語言，所以也就不大在乎」。²¹³ 這個專注的做法使西方旅人只擷取了個人設想中的 19 世紀台灣的片段，同時暴露了自身與時代對知識追求的狂熱。

當旅人進入島嶼汲取新知時，在某種程度上就已將台灣視為一個缺乏文明的靜止狀態，其實這也是學術研究主共同的狀態——另一種斷裂、一種既在又不在的展示。旅人將自己視為研究者，以情感或文化認知上的疏離，加上親身體驗的貼近，有意識的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在這個距離所代表的「客觀」展示自己的研究——也就是他人生活，造就各種研究的成果。

²¹⁰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5 June 1874.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05

²¹¹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5 June 1874.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06。

²¹²感謝口試委員邱馨慧老師意見，認為此詞彙清單與「新港文書」有直接或間接相關，且是否以清單之形式做為物件交換的可能，尚待其他史料證明；然相關深入研究實非本文精力時間篇幅所及，不全之處亦請讀者見諒。

²¹³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24 April 1874.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2。

至於旅人在聚落進行物種採集的方式，除了自己採集與觀察紀錄之外，時常也依賴島民的協助，利用購買與島民進行交易的方式，讓旅人的採集工作成為揀選標本。採集方式的轉換，將交易更清楚的標示為知識取得的途徑，物品買主也進一步成為知識的買主。例如史蒂瑞從淡水搭船到打狗之後的採集：

到魚市場去了幾趟，也到海灘上漁夫撒網處找，這樣就已取得大量奇特的魚與螃蟹。我在矮樹叢裡則已找到若干品種的陸貝與樹貝(tree shells)。石灰岩山丘部分為這些矮樹叢所覆蓋。淡水的小溪以及用來灌溉稻田的溝渠裡，都有許多黑螺(melantias)與其他的淡水貝類。在淹積數英寸水的稻田裡，有一些很優良的蠶(limuli)浮游在水上。²¹⁴

或是史蒂瑞在埔里聚落進行的採集工作時，「我放出消息，說我願意購買一切生物來做為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標本。很快地，就有一大群水番及漢人的小孩來替我收集標本」。²¹⁵ 史蒂瑞的玻璃蒐集瓶就因為這些孩子所進行的交易，很快的被填滿。然而，在揀選的過程中，旅人說明了採集物件的優缺點，這也意味著物種的好壞標準是由旅人本身的知識圖譜所定義，而知識用途也由旅人的發想開始。

類似的例子除了在旅人進行物種蒐集可見，也出現在旅人蒐集 19 世紀台灣的族群資料過程中：例如史蒂瑞聽見兩個番人族群的歌聲時所產生的反應。一次是在稻米收成時節所聽見的水番歌聲：

他們負著重物踏著重步行走時，不斷重複一個單調但悅耳的「哦呵哦呵」聲，遠遠傳到山丘與湖邊。有次我曾聽到一隊男孩唱一個很狂野奇異的繁複環繞的歌曲。要是巴納姆(Barnum，美國遊藝節目經理人，以主辦聳人聽聞的遊藝節目和奇人怪物展覽而聞名)能將這些男孩和他們的音樂運送到美國，那必會讓他發大財的。他們似乎是非常有音樂天賦的族群，跟其漢人鄰居、主人間有很大的差異。²¹⁶

史蒂瑞對番人的歌聲相當感興趣，在另一次聽見熟番唱歌時，認為「我們的作曲家，若要搜尋新東西的話，在此定可找到。」²¹⁷ 史蒂瑞更因個人想要學習這樣的音樂，而要番人反覆來到自己身旁吟唱好幾次。番人音樂的美好，成為旅人

²¹⁴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0 April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78。

²¹⁵ 史蒂瑞，《福爾摩沙及其住民》，頁 59。

²¹⁶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24 April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2。

²¹⁷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7。

島嶼生活中無預期出現的驚喜。在此史蒂瑞展現出希望能將這些優美曲調帶回美國的意願，藉著學習番人的悠揚音樂，增添美國音樂的多元性。

旅人將自己對番人的印象再次刻劃於知識版圖中，也希望自我文化當時的現況能因他域資源的注入有更多不同的發展空間。同樣的想法在史蒂瑞參觀過淡水附近的硫磺泉後更加明確：

歐洲人曾用硫磺泉來沐浴，效果很好。但我認為此泉水尚未有人分析過。若證明有價值，水極充裕，溫度又高，是值得考慮的項目，因為在中國的所有歐洲人都能在此得到水療。²¹⁸

旅人在沿途中所見新奇或具有研究與展示價值的物件、動植物種除了寫作描述之外，更重要的是收集後運送回自己的國家，成為博物展示品。旅人在採集時，除了展現了博物學家的熱情及其文化資本外，也運用了經濟資本完成任務。這樣的舉動顯露出旅人面臨他域時，對新物種、新知識的貪婪，以及亟欲填補知識空白的渴望。然而，蒐集物種的同樣作法也被使用在台灣島民身上。以史蒂瑞前往埔社以東的野蠻人區域，描述生番的樣子為例，史蒂瑞認為：

他們是很差的人類範本。矮小、近乎全裸，有種畏縮的樣子，屬於那種習於在矮樹叢裡守望，直到一些無抵抗能力的人落入其掌握中，但並非那種有勇氣在公開戰事中面對敵人者。²¹⁹

在這裡，史蒂瑞在讀者面前描繪出自己心中的人類圖像，他將優美的人類樣態(高大)、具有文明(衣著)，以及應該毫無畏懼的姿態與一個矮小、近乎全裸，和具有畏縮樣子的番人對比，雖是描述番人樣貌，但旅人對人類形貌的概念想像，反在山中番人面前，清楚的映照成像。

那麼，閱讀了許多史蒂瑞在 19 世紀台灣與中國一帶的旅行中所產生的不適應情形，難道史蒂瑞認為這個區域的任何物件都不值得學習嗎？仍然有的，只是這類的學習，以他對中國戎克的感想為例，史蒂瑞看似稱讚中國戎克船的耐用，實則將之視為技術性問題，與文明或許沾不上邊：

中國的戎克船建得很牢固，用很厚的木板隔分成許多狹窄的小室。這些都做得不漏水，所以當戎克船快裂成碎片時，仍能浮起。他們用水泥來填接縫，使得瀝青和松節油都用不上。這水泥是用生石灰與油做成，非常持久

²¹⁸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29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02。

²¹⁹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88。

耐用，較文明的國家也可學習使用。²²⁰

這個微不足道的小註腳，透露旅人對於他域文明的驚訝，但語氣中「較文明的國家也可學習使用」這一句話，卻說明了史蒂瑞於說明中國戎克船的實用性時，仍將西方國家視為較文明國家，而相對的中國即便能夠建造耐用船隻，卻仍是不甚文明的國家。由此可知，旅人並沒有將異地所見、且值得學習的事物視為文明的一部分。

上述例子說明 19 世紀在台灣進行自然採集的旅人，將採集作為填補知識空白的方法時，所產生的愉悅感，並透露出 19 世紀的台灣在某些西方旅人概念中，是一個被拿來畫上顏色的空白區域、一個知識與文明低於自己文化的島嶼。而在台灣被納入西方知識體系的過程中，西方旅人在獲得新知時產生處於優越與知識前鋒位置的快樂，讓征服他域成為具有正當性與啟發落後的舉動。臺灣因此成為旅人眼中的天堂——一個物種多樣、土壤豐厚、文化多樣、風土人情雖然和我(在此指旅人)不同，卻能夠為「我」(旅人自身)文化增色的寶島。

(二) 飲食與醫療，關於旅人的鄉愁

旅人經由旅行指認「我」(旅人自身)與「它」的不同，透過對他域的描述與觀察，展示了旅人將自身對社會環境的需求與標準轉嫁到 19 世紀的台灣內部關係的想像。藉著對旅人敘事的觀察，或許可以成為另一個路徑，用來發現西方旅人寫作時所想像的文化中心與生存方式是什麼樣子。然因旅人的觀察非常多，就寫作能力的考量，在此僅以飲食與醫療作為討論例子。

旅人在 19 世紀台灣旅行時，看見島民進食的方式，實際上是不太能接受的。像是史溫侯在義興社描述的番人「他們用手進食。手並不很乾淨，在開始前甚至都未將血和髒物洗淨」。²²¹乾淨與否成為旅人描述的重點，在這裡史溫侯間接的說明番人的未進行手部清潔的不乾淨與自己知道乾淨是怎麼一回事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除了飲食過程中，西方旅人所認知的進食禮儀之外，我們也可從飲食習慣看見西方旅人對文明的區辨，例如史蒂瑞描述自己在澎湖食用章魚的經過。首先，史蒂瑞使用文學作品敘事中的章魚作為轉譯方式，以此引發讀者可能存有的共同感，以便後續提出文明作為品嚐標準時，讀者更能感知作者自身的感受：

²²⁰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2 June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09。

²²¹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 Bell, 1863.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福爾摩沙民族學記事》，《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40。

這些東西中，有一隻是龐大的水螅(polypus)，或叫章魚(devil fish)，展開來有十英尺。兩果在《海中苦工》(Toilers of the sea)一書中曾描述過一隻，而我找到的這隻確實大得夠做其兄弟了。這種魚可以吃，我試過，不過對文明的味覺來說，並不特別美味。²²²

在這裡，我們暫時無法感知「文明的味覺」究竟是什麼味道，但可以猜測的是，史蒂瑞面對這巨大的章魚時，處於感到驚訝但並不特別有食慾的狀態，因這龐然大物並不適合文明旅人的胃口。那麼，對史蒂瑞而言「文明的味覺」是什麼呢？從史蒂瑞描述 1873 年耶誕節在陶德(John Dodd)家舉辦的餐會，或許可以略知一二：「這一餐有李子布丁、烤牛肉、火雞，以及其他所有讓我們在此遙遠國土想起家鄉的好東西」。²²³

史蒂瑞和其他同在台灣的外國旅人在陶德先生家度過的英式耶誕節，讓史蒂瑞心中的鄉愁湧現。旅人透過複製家鄉過節的氣氛，試圖在不熟悉的他域裡，仿製家鄉的味覺，讓自己既可享受家鄉式的熟悉生活，又可近距離與島民接觸但並不與之相同的生活型態。而這得來不易的家鄉味，則讓旅人從生理上與器物的接觸中更加體認到自己已遠離家鄉的事實。

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史蒂瑞經歷台灣島內的長途旅行後，進到淡水馬偕牧師家時所產生的愉悅感：

他們很親切地招待我，盡力讓我舒適。天氣已經涼了，他們用基隆的煤炭生的火，很舒服。我在那裏找到幾份美國報紙，使再度回到文明的範圍之內，更加愉快。²²⁴

史蒂瑞在離家遙遠的島嶼中，透過煤炭生的無煙爐火、美國報紙等物作為媒介，感覺自己再度回到文明的範圍之內，而這個文明，便是指與台灣式生活完全不同但旅人熟悉的生活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旅人重新感受屬於自己的文化氛圍、劃出文化的疆界，從文明邊緣觸及文明中心(美國報紙)時所產生的文明感，使個人從身體感受接受所謂文明範圍的壟罩(煤炭生的火)的過程中，旅人再一次的將自己所熟習的生活型態與 19 世紀台灣島民作出區隔。

如同短暫的逃逸一般，旅人與其讀者們在此刻暫時離開異地，回到西方文明

²²²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12 June 1874.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07-p.108。

²²³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29 May 1874.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102。

²²⁴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29 May 1874.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99。

世界的懷抱，而位處東方的台灣小島則以其陰暗狹窄的街道與落後資訊的姿態，存於旅人筆記中，史蒂瑞也以此再度重申了深植於自身心中的刻板東方主義，如薩依德批評的東方學專家一般，再次重述了東西方界線與東西方差異在身體感受上的巨大存在。

然而，同樣是旅人熟悉但 19 世紀台灣島民並不了解的，還包括西方醫療傳教士。關於西方醫學在亞洲的傳播狀態，李尚仁在〈醫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專題導言〉一文中認為：不同於國界或政治勢力的劃分，醫療傳教士並不受到國家疆界的侷限。特別是中英天津條約簽訂後，英國要求中國海關由英籍人員主掌後，海關醫療人員所撰寫的海關醫報(Ma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此刊物內容同時涵蓋了位於中國、日本、韓國等醫師對該地的醫療衛生狀況報告之外，英國醫師在印度的醫學經驗同時也影響了英籍海關醫官對中國狀況的分析。²²⁵

由此可知，經由西方勢力進入亞洲港埠與內陸過程中所進行的資料蒐集，與各地區的相互比對與研究，西方醫療在亞洲的奠基越顯完整；此外，同時進行醫療行動的還包括 19 世紀在台灣西方醫療傳教士，他們為了拓展教區，也藉著進入島嶼內部進行醫療行動的方式，進一步吸引台灣島民入教。因此，在這個段落所要討論的另一個讓旅人感覺自己並不屬於整個台灣環境與文化的聚焦點，則是傳教士醫師在 19 世紀台灣所進行的西方現代醫療行動時，接受醫療的台灣島民對旅人造成的衝擊感。

湯姆生與馬雅各醫生進入台灣內山旅行時，馬雅各醫生在各處醫療站停留，進行醫療照護的行動。湯姆生將當時所受到的衝擊書寫如下：

悲慘的患者每天拖著腳步到醫療站，這是英國城市人完全無法想像的畫面。儘管英國城市中也有窮人，但是他們享有各種醫療照顧，而「花之國度」(中華)的古老文明對這種治療卻相當陌生。許多患者耳聞到這位外國醫生的好名聲，就長途跋涉而來，它們幾乎像老太婆似的相信，只要摸到醫生的衣角，那些多年來讓生命成為痛苦折磨的疾病就能痊癒。²²⁶

同時，湯姆生也詳細敘述了當時台灣的醫療條件、感嘆當地醫療技術的「落後」，並帶著自身對帝國醫療的理解，憐憫著他想像但不甚理解的中華文化：

雖然對當地醫療技術來說仍屬困難，但有時疾病本身並不複雜，只要用外

²²⁵參照李尚仁，〈醫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專題導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No.54，頁 2-3。

²²⁶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46。

科的刺絡針，就能讓病人徹底解脫，並使他們對救命恩人崇拜得五體投地。光是一天之內，在醫院裡看到的景象就讓我驚駭不已，尤其當我想到群集在中國平原上那上百萬的赤貧人口，一定也因為疼痛得不到緩解而不斷發出呻吟，不由更加心痛。在這裡，在這個小小的避難所中，我們聽見的只不過是中國窮人無助哀嚎的微弱回聲，只是從終於得到治療的患者胸中發出的聲音。²²⁷

湯姆生認為「這個地區常見的疾病，大都直接或間接和貧窮、食物的不足或不畏生以及疏忽有關」，²²⁸因此外國傳教士醫生有許多機會進行傳教與行善，而基督教在 19 世紀台灣傳播時的救世形象，也在湯姆生的描述中呈現：

在這種地方，傳教士醫生的生活絕不令人欣羨。他們唯一的樂趣就是自覺做善事，而他們的生活，就是終其一生自我犧牲與不斷勞碌。日復一日，成群的新病人湧入醫院，患者的疾病一一得到治療，傳教士醫生只有在吃飯和晚上睡覺時，能忙裡偷閒。²²⁹

湯姆生的陳述中，不但略帶諷刺的透露出自身文化的優越、英國與台灣社會醫療的差異，也同時說明 19 世紀的台灣島民如何理解現代西方醫學的出現。「摸到醫生衣角就能痊癒」的描述，實際上也展演 19 世紀台灣島民在面對現代醫學的進入時，根據自身的需求、文化資源與認識方式所建構出的想像與願景。²³⁰而湯姆生的觀察，則展現了帶有帝國眼光的旅人眼中所見，帝國醫學在落後島嶼所進行的醫療與文明的雙重救贖。

另一方面，如李尚仁所說：自現代初期開始，西方醫學的擴散與傳播與歐洲的擴張有密切關係，不光是醫師，前往海外的航海家、商人、旅行家等人皆是西方醫學傳播的先鋒。²³¹因此，非醫生卻被島民歸類為救世主的旅人，在當時碰上病患求診的情形則不難想見，而旅人為了不令當地民眾失望，給予島民其隨身藥物作為疾病安慰劑使用的情形也同樣出現在 19 世紀的台灣裡。

例如史蒂瑞進入埔社以東的某個陰暗潮濕的洞穴式房屋時，很快便被一群番人圍住，這些人都處於生病或受傷的狀態，很需要藥物，但史蒂瑞「除了碘酒酞劑外，什麼也沒帶。各種疾病我都給塗上一點，等我塗完，每個人皮膚上幾乎都

²²⁷同上。

²²⁸John Thomson 著，黃詩涵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Formosa〉，收錄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頁 46。

²²⁹同上。

²³⁰參照李尚仁，〈醫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專題導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No.54，頁 12。

²³¹參照李尚仁，〈醫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專題導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No.54，頁 1-16。

有一些深色的碘酒斑點」。²³² 這個畫面透露出旅人筆下的台灣島民對醫療一無所知的狀態，而在史蒂瑞離開該地時，以看似幽默的口吻，交待了西方旅人在此時扮演的角色：「我也再一次施展藝術的天分，用碘酒來擦拭所有的病患，然後我們就啟程回埔社了」。²³³

這類行為雖然諷刺，但對旅人而言，卻不完全出於自願，大多時候是在旁人的半鼓勵狀態下進行。例如史蒂瑞到澎湖時，有許多人向他索取藥物，經由漢人僮僕的暗示與鼓勵，史蒂瑞遂將傳教士們提供他的罐裝研磨咖啡當作醫藥使用：

我跟旺仔說我身邊沒有帶藥，但是旺仔提醒我說，我有一些「咖啡」(cong-ee)。我領會了他的暗示，便把咖啡變成了止咳藥水。我拿出咖啡罐頭分給那些咳個不停的老婦人，叫她們煮成藥水並加入大量的糖來飲用。結果，我的治療還頗為成功，只要有熱咖啡，她們就不咳嗽了。²³⁴

透過旅人對台灣醫療狀態描述的片段，讀者可以發現旅人對台灣島民的憐惜，以及同情背後的資源體系。旅人將台灣社會與其文化中的社會形式與福利作為對照，相形之下，19世紀台灣醫療設備落後，島民對(西方近現代)醫療的無知，成為一個需要救贖的寶島。西方現代醫學所帶有的高文明化程度與優越感，藉由對照英國的進步醫學與中國醫療的古老落後，與旅程途經各地所出現的病患大排長龍、極需醫治的場景，一次又一次的在旅人筆記中將台灣銘刻為一個需要被拯救的島嶼，讓旅人觀察到的台灣島民更顯悲慘，而西方傳教士與醫療在19世紀台灣所作的貢獻價值就更顯得高貴而必須。

然而，除了西方醫療之外，在旅人筆記中並沒有看見中國醫療系統的運作，甚或我們無法得知當時西方旅人對中國傳統醫療的看法，唯見西方社會中醫療相對「進步」的評斷。旅人敘事中將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相提並論，甚至沒有將19世紀台灣/中國醫療系統提出的作法，則更突顯西方旅人認為現代西方醫療方式在19世紀台灣的必要性，而這個看法不可避免的是旅人自身文化中現代與帝國眼光的養成，及經文明規訓後的文明身體感展現。

²³² Steere, J.B. Published letters describing expedition to Formosa. *Ann Arbor Courier*, May 1874.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頁 90。

²³³ 史蒂瑞，《福爾摩沙及其住民》，頁 87。

²³⁴ 史蒂瑞，《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台灣調查筆記》，頁 129-130。

第三節 小結：與它者遭遇

遠離家園所產生的鄉愁，讓隨著片段記憶描繪出的家鄉風俗成為一個旅人的窺看管道，在寫作時讓 19 世紀台灣與旅人文化中飲食與醫療的差異和比較基準各自擴大，透過旅人的貪婪與同情心，映照出旅人與其所支撐的文化樣貌。至於 19 世紀台灣，則在這個時候從主要描述對象，成為陪襯。

作為旅人及其文化的對照組，19 世紀台灣島民與文化在旅人的描述中成了又豐饒又落後的島嶼天堂：

對所有離鄉背井去冒險的歐洲人來說，他們發現了另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裡，居民的生活條件貧困不堪，氣候容易引發各種疾病，複雜難以理解的行政機構、政治組織和觀念常令人覺得脫出常軌。至於上面產生的人際關係會使人感到驚訝，有時也令人灰心，迫使雙方不管願不願意都得去嘗試適應另一種人的生活規範、另一種人的作法、另一種人的看法。²³⁵

透過在台灣所進行的移動與探險，19 世紀的西方旅人帶著所謂的文明與它者和它域遭遇，而這些遭遇時產生的挫折與不愉快，並不一定成為阻礙。旅人仍對 19 世紀的台灣充滿興趣，或許是因為「在中國人的眼裡，歐洲人的出現對文化是一種嚴重的威脅，對西方人來說卻是一項偉大的文化使命」。²³⁶

這個帶有時代需求的文化使命，一如薩依德所說之東方學專家，將自己與它域環境人事物的遭遇過程，建立在觀察、記錄，而非理解它者的基礎上，轉換為西方知識圖譜中的一小段落。此舉讓整個旅程成為一個浩大的轉譯工程，在與異文化碰撞之後，抽取東西雙方文化裡的某些切片，作為比對標準，強化旅人與他者的差異，這或許就是旅人與它者遭遇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

而在旅人將它域的陌生事件轉譯成自身文化中所熟悉的語彙與符碼時，旅人的情緒和認知則主導著讀者對它域的理解。因此，旅人與它者遭遇的經歷，經過情緒與對它域文化相互不理解的情況下，所產生的誇大或濃縮過後的記憶，則成為西方世界對 19 世紀台灣的認識來源之一。19 世紀的台灣透過旅人的觀看與需索，成為一個看似靜止、實則活躍的採集館，旅人因移動快速的特性，藉著固定他者、抽取旅途回憶的方式，對照出一個移動的、新式的自己；而旅人的貪婪與鄉愁，則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優越的它者，一個文明表徵的存在。

從某方面來說，19 世紀在台灣西方旅人雖重覆了薩依德所陳述之西方文

²³⁵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頁 139。

²³⁶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頁 126。

明史建構過程中的東方學專家的角色，然而，兩者雖有某部分相似特質與行動模式，但並不代表 19 世紀在台灣的西方旅人可被完全歸納於東方主義這個概念中。例如薩依德對東方學專家的書寫之觀察，認為：

個人疏離幻滅感和普遍的先入為主印象，這兩項特徵足以相當程度的描繪出東方學專家的感性，那麼它們也蘊含了某種熟悉的習慣、感受和知覺。他們內心學會去分別下列兩者：一般大眾對東方的感受，和它們自己對東方獨特的經驗，兩者可以毫不相關、各管各的。²³⁷

從本章所述之兩種身體—生理的與文化的—所構成的受苦，但自我感覺優越的他者，及其所接觸 19 世紀台灣環境並獲得教訓的交會片段可以發現：西方旅人背負著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及其文明規訓下所養成的身體感，穿越地理疆界、移動，並遠離文明中心(家鄉)，隨之而來並逐步增加的文化/文明失落感，讓旅人持續的感受自身的存在²³⁸。旅行書寫是作者個人與所處環境產生交互作用，並相互關聯的書寫過程，而旅人亦在旅行敘事中，大量地注入個人主觀與特殊經驗，並非薩依德所言完全將自我感受與讀者感受對立。而從本章經由身體感，與旅人做為少數它者的視角作為閱讀切入點，所展現之 19 世紀西方旅人與台灣的交互作用，以及不同旅人經驗 19 世紀台灣的零散例子，或許可以說：若更深入分析西方旅人生產之 19 世紀台灣的筆記與資料，薩依德對所謂東方學專家的批評或者對建構「東方學」所需資料之分析，在此並不完全適用，而身體感反倒成為旅人建構與體現東方時最常使用的方式之一。

²³⁷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頁 147。

²³⁸參照 Caren Kaplan. *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s of displacemen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2.

第四章 在浮動的疆界邊上溝通

旅人的故事永遠說不完，在第二、三章，本文以散落事例作為敘事手法，試圖將旅人筆記中的台灣印象重新拆解為幾個不同的分類，從旅人將台灣族群分為三類的平面敘事，到旅人進入 19 世紀台灣旅行時的遭遇，以及旅人自身涉入的主觀敘事，以立體結構的方式，藉由身處接觸帶的西方旅人在遊記中所呈現的兩種身體認知—文化的身體認知、生理的身體認知，看見遊記背後，旅人如何將自身文化置入筆下的異域；並在文中藉由不同觀感的敘事，及其隱約浮動的文化疆界所產生的縫隙，重新觀看 19 世紀台灣作為接觸帶時的某一切面。

本章將延續前兩章的觀察視野，並以此作為基礎，不同的是本章將以事件作為討論聚焦點，觀看事件發生時，其邊緣所引發的聚合與流動。透過事件的整合，拆解接觸帶中西方旅人所呈現的各種敘事，並透過這些不同情緒的經歷，捕捉 Pratt 在 *Imperial Eyes* 一書中所謂的接觸帶畫面—在特定歷史情境下，出現於權力關係高度不對等的情況下的社會空間中，富含文化遭遇、衝擊並相互扣住扭轉的片段。²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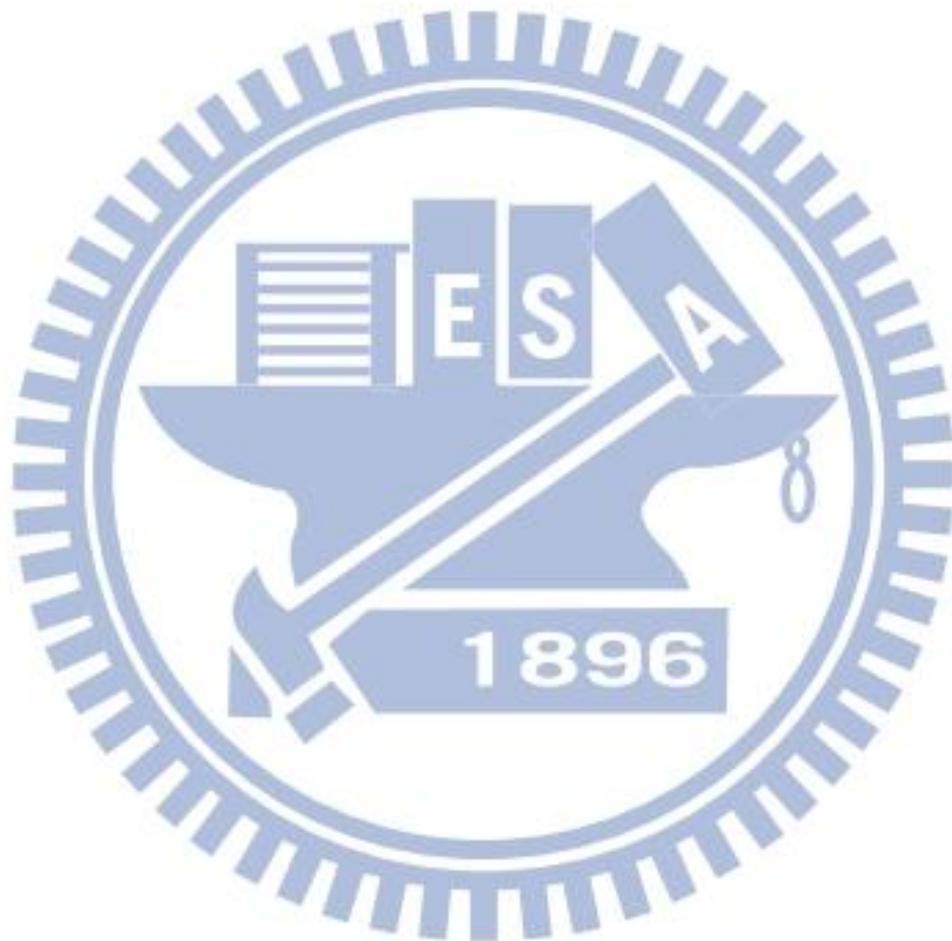
本章第一節的構想，來自閱讀 Pratt 所描繪的接觸帶及其高度動態區域狀態之啟發，將試著呈現進入他域的西方勢力與 19 世紀台灣環境共處時的另一種處境。以發生於 1867 年的羅發號事件後續處理經過例，本文將陳述接觸區中的西方旅人身為一群弱勢但優越的他者之處境，並以牽涉入羅發號後續事件的必麒麟因其個人特質，與 19 世紀台灣社會環境的特殊性，在雙方遭遇時成為解決事件的牽線人作為例子，展演原本就不易被理解的接觸區所擁有的高度複雜狀態，因旅人的涉入再度將接觸帶本身複雜化的狀態，並隨著旅人敘事中的事件發展，跟隨旅人腳步，看見不同於旅人所想像的接觸帶，並透過事件看見接觸區原有的生存法則。

接著，本章第二節以 1884-1885 年間清法戰爭北台灣封鎖期這個事件作為敘事主體，將封鎖期間法國小兵與茶商陶德的觀點加以比對，透過鄧津華提出之會面點概念之啟發，以動態歷史做為詮釋事件的方式，藉由封鎖期間西方旅人在北台灣生活時所遭遇到的文化性的與生理性的困境，做為理解不同立場的西方旅人在同一時期的接觸區生活。全文試著以會面點的動態呈現接觸區的多重層次，同時解構西方旅人於 19 世紀台灣生活時刻意展現出的文化優越感，並藉由西方旅人勇闖異域(東方)時，所體會的挫敗與無奈，看見 19 世紀台灣的韌性，以及多種勢力介入 19 世紀台灣時，19 世紀台灣的整體文化與環境被旅人影響之外，也

²³⁹參照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p.4.

反過來攪動了西方旅人所感知的文化疆界與身體感，進而產生的浮動疆界狀態。

透過事件的聚焦，在接觸帶中藉著位居會面點參與人物的描述，直觀身為親身經歷者的西方旅人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認知與敘述，並透過事件觀看再度形成的接觸帶，和因事件而產生的文化疆界浮動狀態。由於本章以事件做為敘事主軸，為了進一步解析接觸帶中交錯而複雜的動態過程，故篇幅較大，透過事件中曲折且多方的敘事，觀看存於 19 世紀台灣作為接觸帶中的會面點片段之生動與活力。



第一節 不良溝通的共識

一如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的台灣詞條作者韋伯斯特所說，「本世紀早期，歐洲人對此島的認識，主要來自在其海岸發生的船難」²⁴⁰，1850 年到 1869 年之間，船隻遇難事件接二連三，次數多的目不暇接，有記載的船隻便超過 30 艘²⁴¹，數不清的船難事件引領西方旅人一步步深入福爾摩沙。其中，發生在 1867 年三月的美船羅發號(Rover)事件，因美國駐廈門領事的介入，成為國際事件。這次的斡旋活動中，英國籍旅人必麒麟與美國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則成為溝通地方政府與臺灣島民的要角，至於出兵的清帝國則成為次要角色。

然而，整個事件中，為什麼在台灣奔走的是外國官員與旅人？又是為什麼發生在台灣南部地區的船難需要外國人作為溝通者進行多方交涉？清政府在此事件中扮演什麼角色，態度為何？這個交涉事件呈現出的是什麼樣的台灣狀態？本節將從必麒麟回憶錄中描述 1867 年 4 月起四度進出台灣南岬處理羅發號後續事件的經過²⁴²，觀察 19 世紀台灣事件中外國人作為轉譯介質的情況，討論處於無法溝通(或者不願意溝通)狀態裡的 19 世紀台灣，仍透過物質、利益與特殊手段所進行的流動狀態。

(一) 西方旅人筆下的羅發號事件及其後續處理事宜

美籍三桅帆船羅發號(Rover)於 1867 年 3 月自汕頭開往牛庄，經過台東紅頭嶼海面時遇大風漂流於巴士海峽，於七星岩(台灣最南端的陸地)觸礁，並在台灣南岬(恆春)沉沒，船上人員(船長 Hunt 與其妻和水手共十四名)駕杉板逃生，一上岸便遭原住民(龜仔律 Kualuts，屏東縣恆春鎮社頂)襲擊，生還者只剩兩人，事發之後，美國領事李仙得(Le Gendre)將軍要求台灣處理，當時的台灣道台以南岬並非清廷管轄範圍拒絕要求，因此李仙德一行人只能自行派人找尋。²⁴³因此李仙得於同年 6 月與率領巡洋艦 Hartford 與海防艦 Wyoming 的美國籍貝爾上將(Admiral Bell)前往南岬進行報復行動，並邀請必麒麟作翻譯隨行。²⁴⁴

²⁴⁰ Webster, H.A. "Formosa." 收錄與翻譯在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308。

²⁴¹ 參照白尚德，p.52。High Flyer 輪之後，有美國賽船 Coquette；1857 年有 Vixen(國籍不詳)；1859 年有英船 Eena(靠近淡水)；1861 年有新加坡船 Uncle Tom(靠近淡水)、英船 Martha and Emily、漢堡的 Esther、西班牙船 Soberana、美船 Lucky Star；1864 年有 Talamo、漢堡的 Hever 和 Mathilde、英船 Susan Douglas 和 Netherby(靠近澎湖)、Truro(英船)；1865 年有德國哈諾瓦的 Amphitrite、漢堡的 Abeonahehk 和 Hoffung；Julia Ann 和 Pearl(英船)以及 T.E Boyed、Fairlight、Mabe(英船)、德船 Eduard、荷船 Pielides、英船 Kwang Foong、Bintang Amnum；1867 年美船 Rover、英船 Philomela 和 1869 年的 Flying Buck。

²⁴² 全段敘事參照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 237-266。

²⁴³ 參照郭嗣汾，〈李善德與羅發號事件〉，《臺灣文獻》29：2，1978，頁 4。

²⁴⁴ 參照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 237-238。

美國軍方借重必麒麟對台灣南部區域的理解，按必麒麟提議先停泊在南岬西邊的瑯嶠灣(今射寮港)過夜。由於必麒麟認為此處的客家莊居民不但提供武器給野蠻人，並且與之通婚，必然十分清楚野蠻人的風俗與出沒的區域，因而建議貝爾上將「以優越武力為後盾，再用金錢賄賂，必可使那些貪婪的漢人提供幾名嚮導給我們，如此可分一路人馬，從陸上自後方偷襲龜仔律人，另一路則從海灘進攻」。²⁴⁵然而，縝密的作戰計畫抵不過氣候與環境的不熟悉，同行者之一，曾奔聘於南北戰爭的麥肯奈中校(Mackenzie)，在進行報復行動時，遭到埋伏攻擊，而「被微不足道的(wretched)福爾摩沙野蠻人之流彈所殺，實在令人扼腕」²⁴⁶，隨後麥肯奈中校遺骸運回美國，美方的討伐行動也因此暫停。²⁴⁷

緊接著美國軍方找上必麒麟的是詹姆士·霍恩(James Horn)，他代表羅發號失事的船長夫人親友前往台灣尋找生還者或其遺體²⁴⁸，霍恩在南岬射寮居住一月餘，但對於打探到的消息並不滿意，因此於 1867 年 8 月前往打狗與台灣府拜訪必麒麟-「公認是台灣島野蠻人的最高權威之一，並且是最優秀、年輕的語言學家」²⁴⁹，邀請必麒麟一同前往搜尋生還者或是遺骸的旅程。當霍恩與必麒麟獲知羅發號喪命人員的部分骸骨與雜物還在龍鑾社(Ling-nuan，今屏東縣恆春鎮龍鑾山)時，一行人便南下與當地居民交涉。

• 必麒麟與霍恩的說法

埋葬遺骨的地方位於大樹房(今屏東縣恆春鎮大光里南灣後壁湖漁港附近的海邊)，霍恩一行人在此地發現罹難者的部分遺骨，而當地居民「他們聽口譯員說韓特先生是官員，又推斷那名婦人必是貴夫人，因此開高價出售那些骸骨」。²⁵⁰居民的貪婪並非意料之外，在霍恩的描述中，必麒麟展現其溝通長才，試圖讓任務順利達成：

必麒麟不厭其煩的向他們分析利害關係，說明入採取友善態度能有多大好處，與白種人做生意可得什麼利益，船隻到臨時將不會傷害他們，如果幫助美國船隻懲罰龜仔律人或救助船難的水手，一定也可以得到優渥的報酬。他們答應盡力而為，也同意在次日早晨，將韓特夫人遺骸送到大樹房附近的某間茅屋裡。²⁵¹

²⁴⁵ 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 238。

²⁴⁶ 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 242。

²⁴⁷ 參照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 240-242。

²⁴⁸ 參照必麒麟，〈詹姆士·霍恩日記〉摘錄，《歷險福爾摩沙》，頁 p242-256。

²⁴⁹ 參照必麒麟，〈詹姆士·霍恩日記〉摘錄，《歷險福爾摩沙》，頁 p.242。

²⁵⁰ 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 244。

²⁵¹ 同上。

隔日霍恩一行人依約前往，卻因缺乏足夠金錢贖回骸骨，必麒麟再度與龍鑾人交涉，並訂下協議：除兩名漢人充當擔保人外，在贖金付清前，霍恩必須留在瑯橋，並同時保證事情到此為止。

當我們將所有骸骨裝進一只草箱裡，遵從漢人的建議，放進一些金箔紙，作為死者在黃泉路上的費用。因為漢人對骸骨有所忌諱，只好由我背負那口箱子。那些人又要求我們耗盡所攜帶的彈藥，我們於是朝著龜仔律社發射，藉以表達對他們的憤怒。²⁵²

正當羅發號遺骸搜索事件告一段落時，原本將返回打狗的必麒麟，再度涉入南岬當地的外交事務。美方首次報復行動失敗後，南岬當地便盛傳清兵元帥與美國領事將率軍南下，攻打洗劫外國船隻的龜仔律人與野蠻人的消息，消息一出，當地的福佬人與客家人首領便急於拜訪必麒麟，希望借重必麒麟的外國人身分及其斡旋能力，使清廷與美國不致出兵。

由於福佬人與客家人因長期向各部落頭目租用土地，且番人使用的槍枝、火藥與食鹽全需漢人供應，雙方關係一向友好，因此漢人對部落仍有不小影響力，福佬人與客家人首領告訴必麒麟，他們願勸豬嘮束頭目卓杞篤出面訂立條約，承諾龜仔律人及其統治下的部落不再殺害漂流到他們領域內的外國人，並全力提供協助。接著，客家籍和福佬籍首腦人物與必麒麟一行人於9月11日在客家聚落保力舉行會議，由於客家人擔心美方非要進行復仇活動，得殺死幾人後，才會同意條約上的條款；而必麒麟則以外籍人士身分給予意見，認為誠懇協商必會為美方接受。此一說法獲得漢人認同，因此請求必麒麟與有關當局聯繫阻止清廷出兵。

然而，該區原屬於福佬(fokeen men)與客家人(hak-kas)共存但敵對的區域，雙方領首一聽清廷欲因洗劫外國船隻而派軍隊攻打龜仔律人和野蠻人的消息後，因怕影響地方安定而決定統一意見與各方協議。雙方漢人首領認為，清廷出兵後所帶來的困擾與損害，將使該地漢人生活陷入困境，而當地漢人在尋求必麒麟協助時，亦表達對清廷與番人行為的不滿：

我們不希望受到清朝官員的統治，至於那些清兵，你可知道他們是什麼？這些人比蝗蟲還可怕！如果好好伺候這些清兵，他們會順手拿走我們一切東西；如果不給，清兵變會擄掠婦女，或殺死我們。他們絕對沒有對抗野蠻人的能耐，終究會戰敗逃亡，到那時候，野蠻人會反過來找我們這些留辮子的人報復，阻斷灌溉水源，侵擾村莊，弄得大家寢食難安。²⁵³

²⁵²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246。

²⁵³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258。

福佬與客家雙方領袖為了不讓清軍進入該地干預，而願為卓杞篤作擔保，承諾日後若有其他船難事件，任何國家政府皆可找他們負責。必麒麟認為這樣的協議有益無害，除了可以節省不少費用之外，又可保全許多性命，便表示樂見其成之意，也願將情形呈報給有關當局。²⁵⁴

正當必麒麟前往台灣府與負責平亂的劉明燈進行對策商討時，恰巧在枋寮遇上即將進入瑯橋處理羅發號後續事宜的李仙得將軍與清兵軍隊。李仙得將軍邀請必麒麟擔任進入瑯橋的隨行翻譯時，必麒麟也將漢人聯議的結果告知，於是李仙得將軍與必麒麟便前往清軍駐紮處，與清兵元帥劉明燈與將軍吳大廷協議。起先清方憤慨的拒絕這項提議，但入夜後卻又改變策略，邀請必麒麟一同協商，並說明清軍的難處：

我英勇的士兵們，都是從北方內陸徵調而來，無法長期忍受台灣島嶼的氣候，有些士兵甚至得熱病身亡，而那些地方義勇軍根本不懂得作戰，我也不希望傷害無辜的漢人。²⁵⁵

清方認為漢人若可履行諾言，便將命令軍隊不進入瑯橋，且給予相關協助。然清方的迂迴戰術在隔日又再度上演，隔日，當必麒麟提及昨夜商討的結果時，清方官員卻先是為了顧及顏面而極力反對，後經思考，才看似不得不的同意漢人聯議結果。清方軍隊於是南下，在瑯橋郊外紮營，而清軍士兵們照例打劫附近民家，當劉明燈元帥得之打劫情事欲將兩名士兵處死時，李仙得將軍卻替他們求情而使之免於一死。接著，清方官員(同知)與必麒麟一同進入瑯橋與卓杞篤見面。

然在與番人進行協商之前，李仙得將軍先向劉明燈提出四個要求，包括：第一點、進入山區與卓杞篤與十八番社頭目會面，接受他們對此事的道歉和對將來的保證；第二點、要求清方保證沿途漢人與熟番的恭順態度(將瑯橋到大樹房一地之華人與混血人群聚集起來)；第三點、要求番人賠償必麒麟於先前為贖回韓特夫人之花費並盡力協尋遺物；第四點、為保證瑯橋為清帝國之保護地，要求清方於台灣島南端築砲台與氣象台。²⁵⁶待劉明燈答應，並以書面答覆後，李仙得於1867年10月10日進入瑯橋與卓杞篤見面，並進行共同協商之合約的最後簽字。合約內容則同該地福佬與客家領袖之協議：

嗣後船上設旗為憑，無論中外各國商船，如遇遭風失事，由該番妥為救護，交由閩粵頭人轉送地方官配船內渡。倘若再被生番殺害，閩粵頭人轉為幫

²⁵⁴ 參照必麒麟，〈詹姆士·霍恩日記〉摘錄，《歷險福爾摩沙》，頁252。

²⁵⁵ 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p.260。

²⁵⁶ 參照郭嗣汾，〈李善德與羅發號事件〉，《臺灣文獻》29：2，頁6；台灣研究叢刊第一〇七種，《台灣之過去與現在(第一冊)》，頁83。

拏兇番，解官從重究治。²⁵⁷

此條約由清朝官員、美國領事、必麒麟、瑯橋的漢人首領們與卓杞篤共同簽訂，必麒麟更是「與他歃血為盟，結拜為兄弟」²⁵⁸。然而，根據必麒麟的說法，要讓番人簽訂條約並非易事，基於漢人對番人的瞭解，漢人帶了大量米酒一同前往，當番人開懷暢飲時，便將簽約事宜談定，也因此必麒麟必須多待一兩天等待番人清醒，以便瞭解條約內容。由於簽約時番人早以醉酒無法談判，因此必麒麟與李仙得將軍利用番人醒酒之際，使用談判手法與李仙得將軍合演一齣劇碼——李仙得將軍假裝憤怒與不耐煩，並甩出之前因戰爭受傷而裝上的玻璃眼珠，加上必麒麟一邊發表聲明一邊請通譯直接翻譯的情況——迫使番人因驚嚇而毫無猶豫的馬上簽約。必麒麟的台灣經驗在此看似充分發揮作用，藉由威脅利誘的雙面引導手段，必麒麟順利完成清軍、美方、漢人與番人協議，並達成各方需求的任務，使損害降到最低，而霍恩在陳述交涉經過的最後一段，以他個人對必麒麟的敬佩作結：「必麒麟相當受到漢人與野蠻人的愛戴，能受到橫越南北整座島嶼野蠻人的敬愛，恐怕只有他一人！」²⁵⁹西方旅人在此過程中穿針引線，並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些驚險的故事大約勾勒出事件交涉的經過，但實際上還有更多細節與接觸片段，需待清帝國說法與資料浮現之後，方可加以判斷，本文則將於此節之小節再次說明。緊接著，將先討論身為另一方的交涉國——清帝國，在此扮演著什麼角色呢？

(二) 清帝國官方說法—所謂的“帝國無奈”

羅發號後續處理事宜中，清朝派遣官員作為帝國的延伸，以劉明燈與吳大廷在臺灣代替帝國之眼觀察、處理並回報事件處理進度。因此，這兩位官員必然直接影響了清廷在此事件中的作為與觀點。但在進入清代官方資料之前，必須先確認一種觀看視野：如同許博凱於〈帝國文化邏輯的展演〉一文中，將史料化作文本，並從中探知史料背後意圖給予讀者一種「規矩」、「有秩序的」感受之概念²⁶⁰，若考慮官員出身於帝國中心機構，其身處異地時對 19 世紀台灣的評價和掌握態度，上奏文中時常出現帶有文化中心觀看邊陲之優越感以外，事件中的官員奏摺與其他相關資料也試圖給讀者——清朝帝王——一種有規矩、有秩序而且可靠的感受，以維護帝國威嚴。

另一方面，在討論清帝國面對此事件處理時的隱縮態度，必須從清代對臺灣

²⁵⁷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90。

²⁵⁸ 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 260。

²⁵⁹ 參照必麒麟，〈詹姆士·霍恩日記〉摘錄，《歷險福爾摩沙》，頁 256。

²⁶⁰ 參照許博凱，《帝國文化邏輯的展演—清代方志之空間書寫與地理政治》，頁 69、83。

統治概念的轉換時期做為參考。自 1860 年天津條約簽訂，滬尾與安平兩地開港之後，對清廷而言，地方治理重心實際上已不只是掌握地區的內政處理，更多則是番害與洋務事件所帶來的困擾。²⁶¹當時(1860 年代)的清廷正企圖已開山撫番做為接下來得台灣治理重點，尚未實踐便發生的羅發號後續處理事件，實際上讓官員無力招架，且在恆春當地「雖有代表官方的勢力駐在車城，但是其影響範圍十分有限，車城以外的漢人村莊與原住民部落仍舊依自身的法則在運作」。²⁶²因而事件處理時，清代官員所呈現的消極與苟且，或許來自於對他者(美方)的無知與陌生。因此本文將使用兩位官員上報朝廷的奏摺及其他相關的清方官方資料²⁶³，與必麒麟的筆記作為對照，試圖理解清帝國在整個事件處理過程中，是如何理解該地居民與美方行動。

• 官員所扮演的帝國之眼

在福建台灣鎮總兵劉明燈與福建台灣道兼學政吳大廷，於同治六年丁卯六月己亥(十七日)，針對同治六年二月十八日(西元 1867 年 3 月 23 日)在瑯橋發生的羅發號船難事件上奏的摺子裡，一開始所敘述的瑯橋景色便相當嚇人：「竊考台灣圖誌，南路鳳山縣所屬，洋面之險、沙汕礁石、觸舟即碎者，以瑯橋為最；生番之兇、豺目獸心、見人即殺者，以傀儡山為尤」。²⁶⁴文中接著敘述進入瑯橋的困難，以及清廷與該地的關係：

距鳳山縣西十里打鼓口放洋至瑯橋，約二百四十里之遙，由瑯橋換小舟，登岸東折，迄於傀儡，鳥道羊腸，菁深林密，自來人跡所罕到，亦版圖所未收。我朝設土牛之禁，嚴出入之防，所以戢兇殘而重人命，用意固深遠也。²⁶⁵

上奏者說明，該區(瑯橋一帶)並非清帝國疆域範圍之內，且為了避免清帝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威脅，早已劃定土牛界，並且嚴密的管理；換句話說，官員認為瑯橋的困難地形和兇惡住民可能產生的危險與威脅，清帝國已經盡力解決。因此羅發號事件發生之後，李仙得一行人率同美國軍方欲進入瑯橋進行報復行動時，清帝國官員認為「該領事亦知生番形同獸類，匿跡放槍，不可理喻」²⁶⁶，接著以地形困難為由，企圖阻止美方進入瑯橋。然而李仙得一行人深入瑯橋的想法

²⁶¹參照莊勝全，《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頁 171-174。

²⁶²周玉翎，《台灣南端尾閩恆春的族群與歷史(1867-1904)》，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82。

²⁶³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79-94。

²⁶⁴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79。

²⁶⁵同上。

²⁶⁶同上。

並未動搖，而劉明燈便再次與之會談企圖阻止，並在會談後認為李仙得暫時接受清方規勸而離開。

然而美方的舉動也讓劉明燈等若干官員意識到，若清帝國不試圖進入瑯橋，而他國軍隊仍欲進行報復行動時，將損害清帝國威信，便派遣當任鳳山知縣吳本杰與南路營參將凌定幫、前署鳳山知縣凌樹筌進行探訪瑯橋的活動，並探訪紮營與進兵的路線。然回報者的答覆，則與前述之艱難無異²⁶⁷，劉明燈則因此進行辯解：

臣等雖知查係實在情形，據情照覆李領事等婉切勸諭，仍密飭該員等於萬難為力之中，總當從長圖之，以彰國家柔遠之意，以杜外人挑釁之端。特以人非華民，地非化內，剋日圖功，萬難應手，準理度情，洋人亦當見諒。

268

但事件發展並非劉明燈一千人等想像的順利，美方在 1867 年 6 月進入瑯橋，且有一帶兵洋官(麥肯奈中校)受傷斃命，因而暫停報復行動。劉明燈等人卻是在事件發生後才得此消息，「臣等得報之餘，不勝詫異」²⁶⁹。認為美方「洋情悍執」，而其聲稱將再添兵力，等秋冬之際再次前往瑯橋的傳言，應該為真，面對這樣的執悍，劉明燈卻認為應該以「安靜息事」作為應對方法，針對該地防務的應對，則是：

現擬將蕭瑞芳等先行調回，督令署臺灣府葉宗元，移飭該地方文武，一面安撫瑯橋附近莊民，仍選得力屯弁屯丁，不動聲色，駐紮瑯橋不遠之水底寮一帶，懸立重賞，密約熟番乘間代謀，並飭確探該國兵船，如再來旗，該地方文武立即馳往，設法阻止，以免仇釁愈結愈深，致成不了之局。²⁷⁰

並希望總理衙門能夠阻止日後美方的行動，在此，劉明燈等清帝國在台官員的態度已經相當明顯，希望美方知難而退，並認為若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方為上策。當這些奏摺同閩浙總督吳棠與福建巡撫李福泰等人的再次轉述，奏報到總理事務衙門時，總理衙門的回覆則認為「應請旨飭下閩浙督府，嚴飭該鎮道及所派文武道員迅速購覓熟番，相機辦結，不得任令顛預支飾，庶美國無所藉口，而別釁亦可不生」。²⁷¹

總理衙門的回覆讓劉明燈於同治六年十月己未(十六日)再度上奏，強調該地

²⁶⁷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83。

²⁶⁸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80。

²⁶⁹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81。

²⁷⁰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82。

²⁷¹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86。

的凶險，以及官員的為難之外，在總理衙門的壓力下，劉明燈回報了前往瑯橋的計劃：

夫該處山海危險，兼係番地，又值風汛不時，以合眾國之強悍，火輪船之便捷，五月十二日之挫，李領事至今諱莫如深，是奴才與道臣吳大廷前此委婉勸諭者，愛之非拒之也。顧經委婉勸慰，原冀悅服其心，仍附相機妥辦，以期了結此案，始終未敢推諉。特以界處南洋，此時既非進兵之時，該處又非用眾之地，番性狡詐，可智取不可力爭；萬一辦理失宜，致如李領事等之輕進受挫，不但無已謝絕洋人，亦恐有乖國體。奴才語到陳吳大廷時常接見，未嘗不於此事反覆籌維，思得當以報，以冀綏靖海疆，藉慰宸廑。現已會商道臣，定期八月十三日趁南閱營伍之便，會同前署總兵降調北路協副將曾元福，馳赴瑯橋，相機妥辦。²⁷²

劉明燈於同治六年十一月丁丑(二十八日)再次上奏總理事務衙門²⁷³，報告與美方、瑯橋番人的協商經過與協議。劉明燈先是重覆敘事入山險苦，但自己身先士卒的前往之外，經過各村落與番社部落時，該地居民皆出來迎接，「並獻雞豚酒米」，然劉明燈並不收受，且「宣布皇仁，分別賞給番銀、銀牌、羽毛、紅布、料珠等件，各番社俱各歡欣感戴而去」²⁷⁴。劉明燈的說法，明顯與必麒麟前述清兵搶劫民舍傳統不符合，若同時將瑯橋當地和人對清帝國軍隊的說法做為比對，很明顯的，劉明燈的敘事功用在於鞏固清帝國自信，而非實際情形。

接著，劉明燈認為此地番人雖然兇惡殘忍，但「該番戕害洋人之後，之為法所不容，早已加意堤防」；實際上，清軍大舉進入瑯橋的行動開始前，藉著張貼公告周知該地，因此瑯橋番人已知悉來意²⁷⁵。劉明燈認為：番人雖難掌握，但已向十八番社頭目卓杞篤進行宣諭，因此打散黨羽並非難事。實際上，劉明燈前往瑯橋只是為了向美國交差，並向瑯橋番人表達殺雞儆猴之意：

奴才竊思奉委查辦此案，只期拏獲兇番數名，盡法懲治，即可以謝洋人。今該番負固不出，既無線路可通，復趕要結黨援，妄逞螳臂，若不大張撻伐，不足以儆兇頑。²⁷⁶

看似大張旗鼓、毫無畏懼的清帝國台灣官員劉明燈會同相關單位，前往瑯橋各番社進行安撫，並拔營進紮離瑯橋番社不遠處，就在一行人於同治六年九月十

²⁷²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88。

²⁷³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89-92。

²⁷⁴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89。

²⁷⁵ 參照必麒麟，〈詹姆士·霍恩日記〉摘錄，《歷險福爾摩沙》，頁 251。

²⁷⁶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90。

五日(西元 1867 年 10 月 12 日)欲進入事發番社，隔日照會李仙得才得知在九月十三日時，李仙得一行人協同通事與閩粵頭人已與卓杞篤進行協議，願意和談。而李仙得為此再度與劉明燈一行官員照會，在李仙得情詞懇切的情況下，經過再三評估，劉明燈才答應簽訂協議。因此，清軍前述的勇猛、原本可能與番人兵戎相見的場面，在劉明燈為了帝國顏面考慮再三，經過幾次反覆說詞後決定同意改為面議和約，一切爭議在簽訂協議之後結束了，而劉明燈待李仙得返回廈門，確定美方人士撤離台灣之後，才啟程從瑯橋離開。

• 無奈，但求表面和平

從同治六年六月到十一月的奏摺中，清帝國在台官員對美方進行羅發號後續處理的一連串行動的看法，在總理事務衙門下達的壓力下，從原先的推託轉為被動回應美方。然這些回應，以不使他國有機趁入、守住帝國顏面這兩個要素作為行動基調，並以宣揚皇威作為揮兵行動的主要目的，當美方已與瑯橋一地各方頭人進行協商之後，劉明燈以不折損兵力與皇威的考量下，看似勉強實則欣然的接受了這個協議。

然而，作為帝國代表，延伸於帝國邊緣的清代官員所展現出來的內心轉折與奏書，則類似許博凱於〈帝國文化邏輯的展演〉一文中，將方志視為描繪帝國焦慮的一系列書寫的概念²⁷⁷，在羅發號事件後續處理過程中，無論真實情況為何，帝國官員在邊緣地帶的任務便是守住帝國疆土，並展現自己的政績，以顯皇威，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項上人頭，並平撫帝國對於遙遠疆土可能遺失、帝國威嚴可能掃地的焦慮與不安；而這些官員也帶著慣習政治手段，從推諉、息事寧人，到不得不與洋人、番人締結約定，並以不傷害帝國自尊的方式，半誇張、半掩飾的向同治皇帝上奏，整個過程也展現了身為清帝國延伸於海外之視野與作為帝國官員的焦慮與無力感。

從此例可以看見 19 世紀時，西方外交與清帝國交會的互動過程裡，浮現了一幅寫實的台灣狀態：不穩定的政治空間、缺乏文明標誌(在此指清代於台灣各地所建造的人文景觀)的地理環境。以南岬為例，清帝國認為該區不屬其管轄，因為這是一個在清代輿圖中不甚清楚的地區，雖有漢人移民，但清帝國卻無法掌握該地住民的特性極其複雜性；對遭遇船難與叢林遭遇戰的西方官員和旅人而言，此地區雖難以摸索且具危險性，但為了釐清船難真相，則勢必得進入。至於當地的漢人移民與番人，則是期望以既有的生存條件與地方合作狀態繼續生存，不受清朝統治。然而，這個區域需要進行斡旋的起因，來自於各方勢力急欲釐清

²⁷⁷參照許博凱，〈帝國文化邏輯的展演—清代方志之空間書寫與地理政治〉，頁 67-70。

該地權責與責任歸屬時即將引發的衝突。最後，南岬這個看似缺乏連結而無法順利進行溝通的區域，在清廷尚未以實際力量介入之時，透過西方旅人必麒麟與美國領事李仙得將軍的奔走與溝通，暫時讓事件得以落幕，然而，雙方帝國視野交錯甚至勢力延伸的情狀，並未隨著 1867 年李仙得的離開而結束。

(三) 因事件產生的動態接觸帶

• 兩種帝國視野

在討論羅發號事件後續處理過程做為接觸帶的過程中，從必麒麟、霍恩，或是清帝國的資料中，很容易看出原住民的缺席，在這些敘事過程裡，同樣的族群與人物，被描述成具有各種不同性格的族群，而這些不同的個性得視其面對之對象而定，唯一共同的描述，則是他們與漢人、清帝國不合，但與西方旅人能夠溝通。這個現象其實表述了西方與清帝國兩個文化對瑯嶠原住民及其大頭目卓杞篤的不同需求和想像。

除了必麒麟、霍恩與清帝國官員往來之奏摺之外，身為美國領事的李仙得，實際上也對 19 世紀台灣相當熟悉。並著有 Report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一份呈報美國官方檔案之長文²⁷⁸，此文獻分別以英文、中文與日文出版，清帝國將之譯為《臺灣番事》，戰後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並更名為《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文中陳述由李仙得之視野與謀略下所觀看到的 19 世紀台灣，文中細數了番漢關係、地界問題與台灣物產價值及其評估與當時港口之進出口貨物。²⁷⁹而李仙得的敘事正好可作為補充清帝國與其他旅人並未書寫的卓杞篤。

由於篇幅限制，本段落僅選擇兩段落進行分析，例如李仙得筆下的清帝國與番人於同治六年(1867)的一次互動：鎮台劉明燈命人到卓杞篤之處，希望他能前來進行漢番衝突的協商，但卓杞篤自己並不願意前往，反派兩個女兒前去，並強調漢人不守約的作風才是漢番衝突的主因。而被卓杞篤派去的由必麒麟陪同：

此兩女所以放膽前來者，恃翻譯官畢客淋為之勇互也。見鎮台時並不肯跪，致語既畢，即行退去，視鎮台如蔑。(These courageous girls, who had come under the safeguard of Mr. Pickering, refused to kneel down before the Chentai, and having delivered their address they promptly retired, as if they

²⁷⁸Le Gendre, C.W.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1. <http://academic.reed.edu/formosa/texts/LeGendre1871.html>

²⁷⁹參照陳芷凡，〈漫說恆春太寂寥？—李仙得筆下的番人形象與其族群關係〉，《台灣文學研究學報》：9，2009，頁 341；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1-3。

had just met the most humble of their slaves.)²⁸⁰

這段番人蔑視清帝國的敘事，在陳芷凡〈漫說恆春太寂寥？〉一文中成為李仙得日後與卓杞篤定約並禮尚往來的對照，陳芷凡並進一步鋪陳李仙得貶低華人、強調番人與西方的友好關係之理由，源自於李仙得身為領事，故需對台灣產業進行利益分析。而在李仙得筆下的卓杞篤是什麼模樣呢？

卓杞篤是 50 歲人；言語簡潔好聽；相貌易近，給人以有決心而不屈不撓之充滿精力之感；他是陽性的人，不高稍矮，可是肩寬很結實；其髮灰色，頭之前部剃著與華人一樣，結成 12、13 英寸長之弁髮。他的衣著在人群中是特殊的，可是與華人完全不同。²⁸¹

這裡所描述的卓杞篤之長相與氣質，和清帝國文件中所形容「生番之兇、豺目獸心、見人即殺者，以傀儡山為尤」²⁸²之番人完全不同，李仙得的描述反而近似本文第一章分析之西方旅人對 19 世紀台灣平埔族描述中的「高貴野蠻人」。以此可知，李仙得對卓杞篤不但有好感，也因其統領身分，認為卓杞篤即便與漢人髮式相同，但仍有其特殊氣質。除了西方與清帝國兩方官員對番人外貌陳述的差異之外，透過陳芷凡在〈漫說恆春太寂寥？〉一文中，進一步對照李仙得著作的中英版本，也成為另一種兩個帝國視野對焦的路徑。

陳芷凡認為李仙得的文章相較於同時代外國旅人，因其職業(美國領事)對當時中美關係的政經考量，使之更加留意台灣內部的族群網絡。文中藉由參照李仙得 Report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原文，和被清廷翻譯為《臺灣番事》一書企圖拆解「番人形象」於不同勢力中的象徵，以接近不同族群間的動態結構。文中認為李仙得對番人的概念與想像來自其既成知識體系之外，也與當時西方勢力欲進入東方市場大有關係；至於中國對番人的概念來自於教化概念，以及番人作為禮儀之邦的對立與畏懼。並認為李仙得藉由貶低華人、抬高對番人的評價並強調番人與外國勢力友好等方式，挑戰清帝國的官方論述。²⁸³

對本文而言，透過陳芷凡文中所進行的翻譯比對，李仙得的文章像是西方帝國視野於 19 世紀台灣的延伸，而兩種帝國視野也藉由羅發號事件的後續處理經過，在瑯橋番人議題上聚焦了。然而西方帝國視野對 19 世紀台灣的欲望與掌握行動在羅發號事件後，才剛展開，李仙得在 1869 年二度到瑯橋當地與卓杞篤會

²⁸⁰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25；Le Gendre, C.W.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²⁸¹ 台灣研究叢刊第一〇七種，《台灣之過去與現在(第一冊)》，頁 84。

²⁸²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頁 79。

²⁸³ 參照陳芷凡，〈漫說恆春太寂寥？—李仙得筆下的番人形象與其族群關係〉，《台灣文學研究學報》：9，頁 329-362。

面，除了再度確認 1867 年所簽署之合約一事之外，也藉此鞏固西方國家與番人的友好關係。雖李仙得於行前曾通知當地清帝國官員，但在清帝國觀點中認為此事羅發號事件無關，且清帝國文件中並無記載，僅能在《台灣番事》一書中，透過清帝國眼光翻譯李仙得文章得知。

從清帝國對於李仙得再次進入瑯嶠的不重視，而使李仙得得以再度藉由西方帝國視野觀看台灣，甚至日後將其所觀看的台灣風景成為他國(在此指日本)進入 19 世紀台灣的有效背景資料等…這一連串事件，或許可以說明清帝國於 19 世紀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涉時，對番人的治理態度反而成為其他帝國進入 19 世紀台灣的縫隙，而透過這個縫隙，也成為反過來觀看清帝國與 19 世紀台灣間關係的通道之一。透過羅發號事件後續處理過程這個例子，接觸帶中所呈現的各方觀點、各種實際上的接觸和醞釀中的浮動，以及 19 世紀台灣番人於兩種文化間的圖譜差異所造成的文化疆界縫隙，也透過西方帝國旅人李仙得的牽引更加清晰。

• 一個關於「地位」的插曲

為了呈現接觸區中西方旅人涉入 19 世紀台灣，而使接觸區更為浮動的狀態，在此將以必麒麟與漢人互動的一小片段為例，陳述旅人身處接觸帶時所需面對的重新界定一個身為他者的自我與文化他者之間的關係時所產生的狀態。

從前述事件中，讀者可以發現必麒麟對 19 世紀台灣的理解與涉入甚深，必麒麟也從台灣社會的他者，成為參與者。因此，必麒麟關注自己在社會階序中的位置，而漢人對必麒麟的態度也令人玩味。在必麒麟在 1867 年等番人醒酒簽署條約時，發生了一個關於地位的有趣插曲，透過這個事件，展露出西方旅人在漢人社會中的雙面評價。當番人暢飲釀造酒而醉酒不醒時，李仙得將軍與必麒麟一同暫居射寮，而當時李仙德將軍從廈門帶來的漢人廚子與當地漢人閒聊的內容，造成一陣風波，並因此成為必麒麟用來鞏固自我威信的手段之一。

射寮當地的福佬三兄弟作為必麒麟的友人，某次向必麒麟透露閒聊內容：「必麒麟，我們一直認為你是蠻子中的大人物，也知道你所講的話深具份量，但是大將軍帶來的廚子卻說你算哪根蔥？」²⁸⁴另一位接著說：「他還說在廈門那邊，像你這樣的蠻子，是被人在大街上用腳踢來踢去的」。²⁸⁵這些討論最後則希望必麒麟能想個辦法處理作結：

你說，必麒麟，我們該怎麼想呢？我們熱心款待你，不只是因為喜歡你，而且認為你是個大人物，也是個講實話的人，但我們現在該怎麼辦？那個

²⁸⁴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 262。

²⁸⁵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 263。

人說你什麼都不是，叫我們看看你的衣服，就知道你是那種遭人鄙視的人！²⁸⁶

必麒麟聽完這番討論後，認為自己若失去名望，交涉便不易成功，於是進入廈門廚師的休息處，並大聲斥責「誰說要用腳踢紅毛蠻子的？」²⁸⁷此名廚師帶著恐懼的語氣以洋涇濱否認，必麒麟則是以漢語怒吼，要讓在場的人評論，最後則是「捉住廚子的髮辮，狠狠的用腳踢著跑，繞場數圈」²⁸⁸，以此重建聲名作結。

這個順帶一提的插曲，對必麒麟而言是向讀者展現自己所具有之公信力的最佳時機，然而透過這個插曲，卻更可以發現當旅人進入接觸區後，因涉入該地事務，不只觀看、接觸他者，優越的西方旅人也期待獲得其認知中野蠻的、缺乏文化的、不文明的落後他者(在此指 19 世紀的台灣住民)之認同而產生的行動，也成為接觸區更加複雜的原因；這類狀況展現出西方旅人為了在狀況多發、變動不斷的他域中，為了生存所產生的多種身分。然而，必麒麟在此處不經意發生的插曲，及其事件發展與文化認知，或許較接近西方旅人於 19 世紀台灣生活的樣貌：混雜、隨機應變，並且無法單純劃分的區域，而非多數概念下，旅人、他者、土地、物種等各種具有清楚界線區別的狀態。

(四) 小結：縫隙間的動態

本文藉由多種角度的聚焦，透過羅發號船難後續事件處理過程中，展現出各個族群的多重形象，以及南岬地區因羅發號事件而成為各方接觸帶的狀態。當不同群體為了各自的考量而開始進行協商時，南岬這個原本居於台灣島嶼邊緣，甚至清帝國也不將其納入版圖的蠻荒地區，一躍而成各方爭相嶄露勢力之處，南岬也從清帝國的邊緣地帶轉為各方勢力匯聚的中心位置。南岬成為事件中心，以羅發號事件的發生作為接點，連結著清帝國、西方各國，以及原本就存在該地的生存文化。

在此，讀者除了看見美方的積極涉入與清方的消極態度之外，或許還可以看到清代將台灣納入帝國時的困難：瑯嶠這個位居清帝國界外，理應漢人稀少、與當地番人無所瓜葛的區域，實際上卻住有眾多不同族群的中國移民，這些移民除了各自劃定生活範圍之外，也與番人訂立協議，與之共存，產生屬於當地的生存機制。另一方面，當時的清帝國在對台灣治理方式上，面臨開山撫番或維持現狀的抉擇過渡期；美方也經由羅發號事件的探索，對台灣與中國官方的行徑有更詳

²⁸⁶ 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 263。

²⁸⁷ 同上。

²⁸⁸ 必麒麟，《歷險福爾摩沙》，頁 264。

細的理解。在這個時空背景下所發生的羅發號事件，成為清、美雙方各自對彼此與台灣進行深入理解的契機；至於羅發號後續處理事宜的過程，則對台灣內部疆界的重新探索有所幫助，透過美方的要求、征討與清帝國的回應，經由清、美雙方往來的過程進行的推移，則說明了疆界的多重性與疆界邊緣的複雜狀態，並暫時的再度劃定南岬內部的疆界位置。

這個現象或可使用洪維晟在〈帝國邊區的村落、族群與歷史〉一文中，認為邊區社會中「人為界線無法確實發揮效用，而此處的族群多元且複雜，長期以來亦成為各種勢力的角力場」。²⁸⁹此一定義用來形容接觸區。實際上這個定義相當貼切，但接觸區除了界線模糊的現象之外，更可以發現構成這些既定事實的背後，羅發號事件後續處理過程此一事件除了因發生於接觸帶所以特別複雜之外，文化差異更是接觸帶之所以呈現高度複雜狀態的原因。例如此事件中，清美兩造完全不同的認知和態度：清方的保守與消極對比美方的積極介入，兩方對掌握該地的作法之差異也成為事情走向更加複雜的主因。

這個現象也恰巧展現出接觸帶中，文化疆界、政治疆界與地理疆界的重疊、錯落和疆界於實際施行上的限制。更甚者，這些無效疆界成為各方勢力進入 19 世紀台灣時的重要開口，使當時的台灣成為各方勢力展演的場域之一。在這個接觸帶中各方勢力都能夠以某種方式表達意見，清、美、當地勢力各自擁有協議動機，透過多次輾轉，當地勢力因利益相同進行意見整合、美方因當地勢力擔保、清方替自己找了台階下後，而願意簽署協議。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即便事件產生了暫時的結果，但各方對此事的理解卻可能完全不同。

清帝國、西方旅人與南岬當地居民針對羅發號船難後續處理此一事件，及瑯橋一帶番人所產生的歷史理解差異，成為讀者進入接觸帶的最明顯入口：透過不同的說法，讀者得以窺見不同群體對同一事件的不同理解，進而發現同一時代與同一土地上，所產生的歷史多樣性，而這些歷史片段的錯落與組合，也因此具有成為動態歷史的可能性，至於動態歷史過程中不斷移動、變換而錯落的文化、政治疆界，以及與事件同時發生的過渡狀態，將在下一節透過清法戰爭台灣封鎖期的討論展開。

²⁸⁹洪維晟，《帝國邊區的村落、族群與歷史：以屏東萬金庄為中心討論(1861-1945)》，頁 2。

第二節 封鎖？—關於疆界的開放與聚合

旅行時，旅人藉由跨越疆界的標示說明外在空間的轉移，再透過描述他者來展示內在空間的穩定，然而，外在空間的轉換對旅人而言來自於個人身體感與異域遭遇時的感受，以及異域的空間限制；而身處於異域的旅人又藉著描述異域與他者的過程中，陳述了自身文化，並展示文化的身體該是什麼姿態。簡言之，空間與認知中的穩定，形成有形與無形的疆界框住旅人。²⁹⁰疆界因此成為他者與自我之間的重要標誌。然而，本文對「疆界」的想法，並非單指用來「界定一個區域」的概念，「疆界」實際上存在於被跨越的那一刻，也因為跨越，才能感覺界線的存在；而跨越的同時，界線並不只有縮限的功能，它同時也標記了一個聚合、一個開口，一個跨越的可能。這些跨越的可能性透過前面章節的展示，有了比較細緻的描述；然而，跨越之外，旅人又是如何生活在接觸帶的浮動疆界上？本節將以清法戰爭台灣封鎖期間，來自法國小兵 Jeans 與英商陶德的書信相互比對，試圖拼湊接觸帶生活可能的樣貌。

關於中法戰爭的文章與資料眾多，雖法軍在北台灣進行封鎖的舉動就整個戰爭行動而言，只能算是政治手段非執行重點，而後續研究之重點也時常擺在中法戰爭台灣封鎖期間於基隆、淡水與澎湖發生的三大戰役：例如馮明珠所著〈唇齒相依—細述中法越南戰爭中之閩臺海戰〉一文中，以閩臺海戰為例，說明故宮檔案與台灣史研究之關係，以及臺澎兩地在地緣上與中國相連互依的關係，其文重述清帝國官方各文件中，戰爭時程與攻守經過，並強調清帝國援台的協助與劉銘傳在臺表現之優異。²⁹¹而張志強所著〈孫開華淡水之役獲勝之原因〉一文，則分析孫開華之個人特質中對征戰的熟悉，以及孫開華與北台灣當地資源的掌握與人脈拿捏得當之因，使淡水之役得以取得勝利。²⁹²

羅運治所著〈清法戰役法國封鎖台灣之探討〉一文中依時序排列的使用清法資料詳述戰爭經歷與政策，及這些決定過程中雙方所產生的人員調動，並提出清法戰爭台灣封鎖期間，各國列強包括英國、德國與日本各自的觀望態度與參與封鎖戰之方式，及其背後之動機，不但為本文所使用之旅人資料進行許多填補，也使接觸帶各種勢力交鋒的狀態，以及因政治因素於接觸帶所造成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狀態能更清楚的展現。²⁹³

²⁹⁰參照 Syed Manzurul Islam, *The ethnic of travel*, p.18.

²⁹¹馮明珠，〈唇齒相依—細述中法越南戰爭中之閩臺海戰〉，《故宮臺灣史料概述》，臺北：故宮，1995，頁 175-202。

²⁹²張志強，〈孫開華淡水之役獲勝之原因〉，《歷史月刊》vol.205，2005，頁 67-73。

²⁹³羅運治，〈清法戰役法國封鎖台灣之探討〉，《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2004，頁 92-111。

至於許毓良所著〈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兼論民族英雄墓的由來〉²⁹⁴與〈“西仔反”在臺灣—清法戰爭的基隆、淡水、澎湖之役〉²⁹⁵這兩篇文章則透過比對清帝國文件、海關官員與西方旅人所留下的資料，以及戰爭位置的今昔對照，從清帝國治台方針與觀點開始，由人力、物質、軍隊模式與官員鬥爭等觀點，討論了清帝國官員和軍隊於戰役時可能的處境，雖有當地資料加入，使分析面向相當廣泛，但可惜陳述觀點限於資料仍以清帝國官員對戰爭觀點與政治政策操作走向為主，較少提及戰爭中 19 世紀台灣住民的生活處境。

而〈清法戰爭前後的北台灣(1875-1895)—以 1892 年基隆廳、淡水縣輿圖為例的討論〉²⁹⁶一文則從清代輿圖中對地理名稱標示之變遷和對軍事據點描述的增加，以清法戰爭為界，說明北台灣開發的狀態，及戰爭前後北台灣行政地位的提升，對該地政治、物產之掌控力與帝國官方與仕紳關係連結的提升也有相對關係。文中詳述地方行政官員與官方建築物(如衙門、砲臺等)位置之推移，對地方史來說為相當基本且重要的資料，但全文主調仍不出前述幾篇文章所論：從後設立場與帝國角度檢視清法戰爭一事之前因後果，將之視為台灣建省、海防與洋務推動之重要轉折，但對日常生活、物質流動所造成的生活變動則鮮少著墨。

前述研究對清帝國文件中中法戰爭時期的台灣三大戰役之戰爭細節，包括軍隊、武器數目、雙方戰略，或者當時台灣官場的人事關係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但在這裡，我們並不想多談清法戰爭的細節，也不想重覆前面幾個章節中，外國旅人對中國與台灣人的既定印象與旅人經驗他者的過程，而是將這些概念與經驗串連起來，透過事件的集中，企圖貼近接觸帶裡的浮動疆界，以及生活於其上的人們可能以什麼方式相互交會。本節主要材料選自 1890 年 10 月 5 日至 1891 年 5 月 2 日刊登於《地球畫報》(La terre illustrée)第一到二十六集，以「孤拔將軍的水手：來自印度支那戰場的福州與福爾摩沙」為名發表的，來自小兵 Jeans 於戰時寫給母親和朋友的書信，以及白詩薇²⁹⁷發表的〈法國軍官筆下的清法戰爭—略談法軍在福爾摩沙的生活(一八八四—一八八五)〉一文的兩相對照下，呈現中法戰爭北台灣封鎖時期這個特殊政治狀態裡，最終贏得條約的法國，其在台軍隊(也算是某一種旅人狀態)於封鎖期時的困難生活。

²⁹⁴許毓良，〈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兼論民族英雄墓的由來〉，《臺灣文獻》，54：1，2003，頁 294-325。

²⁹⁵許毓良，〈“西仔反”在臺灣—清法戰爭的基隆、淡水、澎湖之役〉，《臺北文獻》直字 no.150，2004，頁 299-344。

²⁹⁶許毓良，〈清法戰爭前後的北台灣(1875-1895)—以 1892 年基隆廳、淡水縣輿圖為例的討論〉，《臺灣文獻》，57：4，頁 264-303。

²⁹⁷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近代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France)研究員。

而英國商人陶德的北台封鎖記，則是法軍生活對照的一個切面。當時的陶德以在台外國旅人的第一手報導，將北台灣的封鎖期生活於香港孖刺西報(Hongkong Daily Press)作為專欄刊登，不同於法國小兵的立場，陶德記述了清軍與法軍交會時的戰爭狀態，也說明北台灣封鎖時外商與僑民的困境，呈現當時在台外國住民的日常生活狀態。這些資料說出法國封鎖的為難，以及其他在台外國人、他國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幫助中國緩解封鎖台灣，以至於封鎖無法完全的狀態。

本節企圖透過當時在台灣旅人紀錄，探索法軍自 1884 年 10 月 23 日至 1885 年 6 月 21 日這將近八個月的封鎖期間在北部台灣的某些生活段落，重新理解接觸帶裡的流動與互動過程，並藉由展示法軍進行封鎖的封鎖不完全狀態，以此呈現接觸帶裡利益複雜的情況與疆界的多重性；並藉由前人研究，討論清方與法方在這些戰役與封鎖期的交集，最後，將透過柯文於《歷史三調》一書所提出之多重歷史記憶的概念為基礎，試著將清法戰爭中台灣的封鎖狀態一事作為開口，探討史料之外的時代狀態，以及歷史記憶中必然存在的多重性與複雜性。

(一) 不和平的戰爭與和平的封鎖

• 封鎖之前：兩個帝國於海外的延伸

清法戰爭台灣封鎖事件起因於清法對越南作為屬地的認知問題，清法雙方自 1880 年開始進行交涉，然法方期望清帝國能退出越南，並放棄宗主國的權力一事，並未獲得清方重視，法方便藉由武力威脅，期望越南問題能盡速解決。但發生於 1884 年 8 月 28 日的福州閩江之役，即便法軍大捷也無法使清方正視清法間的越南問題。因此，時任法國總理的茹費理(Jules FERRY)為使清帝國接受法國要求的條件，便決定以台灣作為擔保品，並認為：「在所有擔保品中，福爾摩沙是最良好的，選擇得最適當，最容易守，守起來又是最不費錢的擔保品。」²⁹⁸此一命令無論孤拔將軍(Amédee Anatole COURBET)是否認同，都必須服從命令的將軍隊從福州開拔，前往台灣。以馮明珠於〈唇齒相依—細述中法越南戰爭中之閩臺海戰〉一文中的說法，則是法方採取「據地為實」的策略，迫使清方放棄越南，而戰爭過程中，當法軍攻下基隆、占據澎湖後又已放棄高額賠款做為誘迫清方割讓基隆的條件。²⁹⁹

然而，在孤拔率領法軍進行封鎖之前，雙方進行了兩場主要戰役以及眾多延

²⁹⁸白詩薇，〈法國軍官筆下的清法戰爭—略談法軍在福爾摩沙的生活(一八八四—一八八五)〉，《二〇〇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3，頁 8。

²⁹⁹馮明珠，〈唇齒相依—細述中法越南戰爭中之閩臺海戰〉，《故宮臺灣史料概述》，頁 175-176。

伸且零星的攻防、登陸、接觸戰，這些戰役中，法軍取得大部分的勝利，而清軍則在孫開華將軍的帶領下贏得的一大勝戰，則是 1884 年 10 月初(清光緒十年八月)於淡水的法軍登陸戰。法軍此次敗仗，也讓小兵 Jeans 真實陳述了法軍在戰役和封鎖期時環境因素所造成的困境；Jean 以食物應該在最美味時享用餐點作為譬喻，說明法軍因外在環境干擾，使出兵情形不如預期，以致無法順利作戰的情況：

那個一直都很漂亮的大海開始翻騰起來，把我們搖得無法想像如何登陸。有一艘滿載茶葉的戎客船擱淺在沙洲上，必須等一等，這一下，可真煩人！當我們覺得訓練有素時，就想能馬到成功，戰場上要求的是趁熱吃，最麻煩的是讓它冷卻下來，我們現在只會做不好吃的菜。³⁰⁰

敗仗之後除了環境因素之外，Jeans 所陳述的還包括軍隊內部問題，因傭兵來源複雜³⁰¹，即便軍隊盡力，仍因訓練和經驗的不足而產生傷亡：

我們派出去的部隊有點東拼西湊，裡頭有海軍陸戰隊的士兵、也有在陸地上從沒放過一槍的煤倉工人。不是說他們不夠壯，也不是說他們不願像戰友們冒著生命的危險，而是，你知道所有這一切沒有什麼可以取代經驗...軍官的精力都白白浪費了(我可以向你擔保，他們不會節省精力)，把新兵和老兵拖去打仗不是一碼子的事。我們的水手若被當成新兵一定會感到異常驚訝，不過，事實上，這跟年齡一點關係也沒有。你可以活到一百二十歲，要是從沒有在陸地上放過一槍，那麼你比那些四肢有毛病的小孩(就像我)還不如。³⁰²

更仔細地說，法國海軍因位於顛簸軍艦上，這些習慣海上生活的軍人必須進行身體訓練和自主反應的關係，使身體具有足夠能力穩定不動的進行作業，而這個身體穩定度(身體感)的訓練，卻成為陸戰時作出敏捷反應的阻礙：

在船上和在陸地上裝彈藥完全不一樣。在海上，他們要求我們什麼：忍耐，不要動，這是命令。海浪和大砲的後座力，這些都讓我們有點用小石頭丟紀念碑一般的感覺。不過在陸地打仗，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應該跑啊，跳啊，不要都不動。總之，我們挨打有點是因為這理由.....³⁰³

這些惡劣的環境條件，說明法軍與清兵作戰時所必須面臨的調適問題，以及法軍打勝仗之不易。然而，無論交戰或封鎖都相對具有優勢的清軍將領，又是以

³⁰⁰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48。

³⁰¹法國海軍的遠東艦隊，事實上是由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的人所拼湊而成，他們之中有法國人、非洲人、歐洲人，甚至越南人。參照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129。

³⁰²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55。

³⁰³同上。

什麼態度進行作戰呢？

當時在台灣督辦防務、統領台灣北部戰事的清軍統帥為將軍孫開華，他對台灣其實並不陌生，1876年(光緒二年)12月便因牡丹社事件首度來台撫番、討番有功，1878年(光緒四年)2月因番害轉往東台灣；1879年(光緒五年)因台灣軍防需要三度來台，駐點於基隆、淡水兩地，並建砲台、編製軍隊，後因清法局勢緊張，孫開華於1884年(光緒十年)第四度來台。孫開華在清法戰爭時所展現的從容態度，可從當時在台的外僑陶德於1884年10月4日在淡水的報導中發現：

孫開華將軍與幾位幕僚悠閒的在樹下享受午餐，絲毫無視頭上飛過的砲彈。他挺有法國式品味的，尤其特愛香檳酒。儘管守下兵力不多，每天又有逃兵，援軍遲遲未到，但他仍舉止自若，好個勇敢的將領。³⁰⁴

而孫開華將軍在台治軍嚴格，也替台灣的外國住民解決糾紛，因而受到外僑的喜愛，例如陶德在1885年6月1日-7日的報導中，提到「前幾天一位士兵將一名洋行苦力殺成重傷、致死，士兵的人頭也迅速落地，這就是孫開華將軍維持軍紀的方式。」³⁰⁵在陶德的另一段報導中，則可看見戰爭之外的孫將軍：

他從一八七四年日本侵台的牡丹社事件起，即駐紮於此，治軍甚嚴，待兵如子，深受全體將士愛戴。他是個仁慈的人，也是外僑之友，替我們解決不少糾紛，維護我們幾個月來的安全。他喜歡洋食物、洋酒，特愛香檳、柑桂酒。他同時也是位紳士，知道如何適度的取得「津貼」。³⁰⁶

陶德所謂的津貼，指得是孫開華不以直接且強硬的方式收取規費，中飽私囊，而是有技巧地拿取，不但與當地外國商人沒有利益衝突，也因此與之友好。商人之外，孫開華也與當地其他外國住民和當地居民保持良好關係，以馬偕醫館為例，因兩軍交火，清軍傷患者眾，但守軍當局並未替傷兵做任何安排，反而任其自生自滅，傷兵必須生死自負、一切自理，傷者必須自行前往馬偕醫館進行治療。³⁰⁷在1884年10月19日陶德的報導³⁰⁸中，孫開華將軍到院探視傷兵，並因10月8日請當時人在紅毛城的醫生速回醫館進行治療一事，向兩位醫師道謝。這說明們孫開華與外國住民的往來關係良好而密切，陶德也在報導中透露身處台灣的外國住民對孫開華與清法兩方戰爭的看法：

雖然外僑在此間經商、生活愉快且舒適，但大部分人仍希望法國贏得勝

³⁰⁴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52。

³⁰⁵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137。

³⁰⁶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58。

³⁰⁷參照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22-23。

³⁰⁸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69。

利。儘管如此，外僑都相信英勇的孫開華將軍，不但不會遭到無情戰火的摧殘，不管最後勝利與否，都將受到朝廷的賞封。³⁰⁹

孫開華此人的特殊性，在張志強〈孫開華淡水之役獲勝之原因〉一文的描述則補充了西方旅人的說法。張志強認為孫開華的個人沙場經歷豐富，加上對滬尾形式的熟悉，使其個人判斷與戰術得以發揮效用，而劉銘傳於戰時封住滬尾港之策略，讓法國海軍無法登岸，亦是一大功臣；內外因素的融合使孫開華得以取得優勢，而其個人對於在地關係的維護，以及固守軍紀的態度，也是作戰成功的一大因素。³¹⁰當然，滬尾勝戰中，清帝國的作戰將軍，除了孫開華外，劉銘傳似乎也佔了重要地位：

(光緒十年)八月十六日(1884年10月4日)法兵船又添三艘，在猛烈砲火掩護下，終於在三十日(10月18日)兵分三路登岸，隨及與駐守滬尾陸軍提督孫開華的擢勝三營展開激戰，由於劉銘傳調度有方，善用地勢，家以台灣團勇與救援的湘、淮軍，結合一起，軍民一心，人人感奮，終於將入侵的法軍擊退，撤回海上，締造了中法戰爭的一大勝利。³¹¹

馮明珠在分析清軍於滬尾一役的攻防時，劉銘傳的功績相當顯著，對其讚譽有加；然而，Jeans與陶德對劉銘傳的看法，卻與馮明珠大相逕庭。Jeans敘述中的劉銘傳「是一個非常害怕吃敗仗的老頭，因為若是失敗了，他的頭恐怕難保」³¹²，而陶德在1884年10月3日法軍攻下基隆的報導中，對劉銘傳的敗逃則有更生動的描述：

從大稻埕傳來，劉銘傳帶著一千名士兵逃到艋舺，有意挾帶珠寶、金銀、細軟、糧食，再往南逃到三十哩外的竹塹(Teuckcham)，但被艋舺民眾發現，他們抓住劉銘傳，把他軟禁在廟裡。³¹³

與孫開華的從容、勇猛相比，劉銘傳在西方旅人筆下的形象則更顯狼狽。但許毓良〈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兼論民族英雄墓的由來〉一文，對劉銘傳處境所進行的分析，則不同於西方旅人之陳述，或可供觀點平衡。許毓良認為，劉銘傳或許有自保而棄守北臺之意，但劉銘傳於當時所面對的困境，也相當艱辛，除了獨自面對法軍的壓力之外，軍餉、器械與兵源的不足，也使劉銘傳坐困愁城，

³⁰⁹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57。

³¹⁰張志強，〈孫開華淡水之役獲勝之原因〉，《歷史月刊》，頁67-73。

³¹¹馮明珠，〈唇齒相依—細述中法越南戰爭中之閩臺海戰〉，《故宮臺灣史料概述》，頁182；文中年份為筆者添補。

³¹²石岱著、帥仕婷譯，《當Jeans遇上福爾摩沙》，頁49。

³¹³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51。

無法進一步行動；更甚者，因台灣遠離清帝國中心，北京當局認知中的台灣不愁米銀，對劉銘傳的行動無法理解，因此在清廷的檔案中，劉銘傳對抗法軍一事，似乎仍然可行。³¹⁴

從西方旅人與清帝國筆下對照出的劉銘傳處境，似乎反映了部份清帝國官員在 19 世紀台灣面對外國勢力時的反應之一，也呈現出身為帝國視野延伸的海外官員在所謂帝國邊緣的焦慮之外，同時透漏清帝國於面對不同政治體系與外交手段時，措手不及以致疲於奔命的窘境，這樣的差異，似乎也成為接觸帶中，清帝國與法軍所造就的浮動疆界之一環，隱約影響著當地住民的觀感，也成為貼近當時混亂狀態的一個小開口。

那麼，除了從容的清軍將領孫開華、評價不一的督軍劉銘傳之外，將領底下時常吃敗仗的清帝國軍隊，在西方旅人筆下又是以什麼方式於 19 世紀台灣生活的呢？Jeans 於 1885 年 3 月 16 日的信件中，描述了他無法理解的清軍作戰方式：

我們從中國人身上得知一件既奇怪又令人頭皮發麻的事，那就是當我們來來去去，在他們面前轉來轉去的時候，並沒有感到特別憂慮，跟在杜勒利宮花園的池塘裡面沒有兩樣，他們從沒想過要攻擊我們。……(中略)不過，什麼事也沒發生。他們動也不動，只是有時在夜晚的時候，他們會驚慌失措，那時我們可以聽到他們彼此打來打去，花了好多火藥去餵魚，真是不可思議！³¹⁵

從這段敘事中可以發現，封鎖期間清軍似乎沒有強烈意圖要與法軍交兵，少數幾次開火的原因，卻是因誤判而將炮火面向自家人，在 Jeans 的敘述中，幸好清軍瞄準不利，而沒有造成清軍的進一步損失。另一個關於 Jeans 對清兵作戰態度的看法，則突顯了清兵與法兵的差異：

我倒是想知道，他們那邊的傢伙到底在想什麼。事實上，他們知道的就是他們長官說的，自己卻不去思考，真是一個天民。人家命令他們前進，叫他們去把法國人和陰險奸詐的孤拔吃掉，他們就像吃生蠔餡餅一般，毫不猶豫地相信了。只是，你看看，他們照樣不知何故受到驚慌而開溜。有時我們再想，我們從沒見過中國人做過光榮的事，比方說寧願放棄國旗也不願被殺掉。³¹⁶

³¹⁴參照許毓良，〈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兼論民族英雄墓的由來〉，《臺灣文獻》，54:1，2003，頁 295-326。

³¹⁵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107。

³¹⁶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115。

清兵的散亂其來有自，在 Jeans 的敘述中，清楚的描繪了清兵的貪生怕死、不思考的習慣，以及不在乎榮譽的方式，與法軍的獨立作戰和榮譽心大不相同。而陶德的觀察，則說明清軍在台灣島上作戰之外的情況：

散兵游勇整天四處晃來晃去，臉上露出駭人的茫然表情，空洞得似乎沒任何東西可以填滿它。沒有軍官在管他們、毫無紀律，他們搶或偷的技倆，比對抗法軍更是擅長。³¹⁷

相對於清兵的散亂，法兵在戰爭與封鎖期間的生活就顯得戰戰兢兢，居住於海面的軍艦上，和居住於陸地的清軍相比，在身體感受上明顯缺乏對外環境穩定性，此外，還必須時刻擔心戰爭以外，日常生活中的自身安危…諸多因素使法兵對於居處接觸帶，和接觸帶上的浮動疆界之體會愈發深刻，法軍士兵的危機感則愈深，這或許也是清法雙方士兵於當時作戰時所呈現的態度差異來源之一。

• 封鎖了嗎？

然而，這些登陸戰的交手，並沒有在清法雙方之間產生明顯的政治效果，為了迫使清帝國退出越南，法軍在 1884 年 10 月 23 日開始進行封鎖。究竟，1884 年到 1885 年間，法軍在北台灣進行的封鎖行動處於什麼樣的社會氛圍與實際情況呢？Jeans 在 1884 年 10 月 25 日的信件中，描述了當時的情狀：

聽說我們不和中國打仗了。但事實上，我們仍互相攻打著，跟以前一樣兇狠。這應該又算是在打仗，不是嗎？可是呢，好像又不是。我們雖宣布了封鎖，但事實上又不是真的在封鎖。我們封鎖了，但根本沒能封鎖什麼。如果你可以的話，就試著去瞭解，但對我而言，是真的被搞糊塗了。³¹⁸

另一方面，因封鎖北台灣而造成的影響，還包括外商與其他外國住民，原本利用台灣地理優勢進行貿易的外商，因法軍封鎖海岸之故，頓時成為損失的一方之外，原本習慣的日常生活方式之維持也成為難題。陶德在封鎖緩衝期的三日過後，約略敘述封鎖情況，並粗略估算因封鎖可能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

外僑的處境愈來愈困難，或許英國應加派軍艦來保護我們。假如封鎖繼續下去，我們就無法從香港、廈門或得必需品；這麼短的臨時通知，也不許我們處理妥一切商務、逃離台灣。操控全台十分之九海外貿易的英商—如北部的茶葉、煤礦，南部的蔗糖生意，幾乎全部停擺，損失無法估計。至於我們的顧客，也蒙受損失，如美國每年約需三十萬「半箱(half-chest)」

³¹⁷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 52。

³¹⁸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64-65。

的福爾摩沙烏龍茶，現在無法如期運出，蔗糖亦然；尤其煤礦的停產，更使輪船缺乏動力，全台經濟將蒙重創。³¹⁹

實際上，法國海軍進行的北台灣封鎖行動並沒有對清帝國產生有效的牽制，反倒是當時身處北臺灣海域、對該區進行封鎖的法軍，和同樣被封鎖困擾、缺乏物資與信件的在台外國住民，對封鎖的體驗或許比其他人更加完整。歷經兩個月仍未解除的封鎖，在 1884 年 12 月 31 日這個本應慶祝新年的日子裡，外國住民以打油詩表達困居北台的無奈，透過詩句的吟唱，也傳遞出整個封鎖期間，被封鎖困住的人們最常提起的問題：

但還要多久(But I wonder how long it will be.)

寶順洋行職員賀伯德(A. E. Hubbard)

法老砲攻淡水(The French have bombarded Tamsui)
現又封鎖港口(And now have blockaded the port)
試過一次登陸(But in spite of an effort at landing)
連砲陣地也攻不下(Have not taken an earthwork of fort)
戰爭女神缺席(The goddess of war has not favoured)
淡水敗戰可期(Their arms in Tamsui, you see)
法佬終將重開本港(Yet soon they will open the harbor)
但，還要多久？(But I wonder how long it will be)
法佬如暴風雨(At Foochow they came down like the storm-cloud)
狂襲福州基地(Comes down on the waveless sea)
鐵甲砲船隆隆(And their ironclads' cannon were thundering loud)
嚇死邪教支那(To awaken the heathen Chinese)
摧燬砲船彈庫(They broke up the gunboats and arsenal)
得意洋洋來此(Then sailed for Formosa in glee)
試圖征服本島(Intending to conquer this island)
但，還要多久？(But I wonder how long it will be)
海關重新開後(Before they will open the Customs)
茶葉得以輸出(To favour the export of tea)
目前一切停頓(At present trade is at stagnation)
法國先生旨意(Because 'tis Monsieur's policy)
封鎖影響物價(The blockade has trebled the price)
件件高漲三倍(Of everything here, you'll agree)

³¹⁹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 73。

生意面臨倒閉(Yet affairs will soon come to a crisis)
但，還要等多久？(But I wonder how long it will be)
歡樂新年來臨(The New Year is opening quite gaily)
期盼不久可見(And I hope before long we shall see)
報復戰爭結局(And end to what they call reprisals)
但，還要等多久？(But I wonder how long it will be)³²⁰

(二) 從不同角度看封鎖-封鎖下的生活

• 霍亂、熱病、喪禮

自 1884 年 10 月 23 日開始進行封鎖後，清法雙方的戰爭從砲火轟擊轉為相互僵持，但死亡的陰影卻尚未離開島嶼北部海域的法軍和島嶼北部的清軍。死亡的大部分原因由戰爭傷亡，轉為疾病的侵襲。陶德於 1884 年 11 月 1 日的報導裡，提到當時的北部台所發生的疾病與死亡：「外僑很多人染病，發燒是普遍症狀...(中略)在低窪區紮營的士兵患了嚴重瘧疾，生命垂危，他們跑到偕醫館拿奎寧服用。每天都有葬禮舉行」³²¹。而 1884 年 11 月 10 日中，再度強調：「每天皆有數個本地人士的葬禮舉行，熱病肆虐，士兵尤其感染嚴重」³²²。陶德所謂的熱病，就是當時台灣最嚴重的風土病，俗稱「虎列拉」的霍亂，以及因為混有植物性物質的飲水中毒，即所謂的森林熱³²³，這些病狀在當時並無特效藥可做治療。且不光是在北台灣的清軍與外國住民，封鎖線上的法軍，亦深受其害。

而 Jeans 在 1884 年 11 月 30 日於基隆發出，寫給朋友的信件中，特別花了許多篇幅描述法軍遭受霍亂的恐懼，並要求朋友不要將此事告訴母親，甚至，信中更描述軍隊裡的所有人都以「抹香鯨」代替霍亂一詞，醫官與軍官也都以「發冷的熱病」或「病」作為代稱，甚至孤拔也在各次致法國國內電報中，提及風土病所導致的軍隊傷亡情形，由此可知霍亂在當時所帶給法軍的恐懼：

有一個自一直令我難以啟口，並不是因為那讓我害怕，而是因為那會讓所有人聽了都難過，在我們之間甚至還禁止說出那個字。當你聽到有人問：抹香鯨過得好嗎？(Comment va la Cachalot ?)你以為是我們對某個巨型動物的健康有興趣嗎？其實一點都不相關。我們所謂的抹香鯨指的是一種沒有羽毛也沒有腳的東西，可是他會飛，也有爪子。這的確令人難以理解，我打賭你絕對猜不出來。好吧！老兄！其實就是「霍亂」(choléra)，這就

³²⁰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 98-100。

³²¹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 78。

³²²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 80。

³²³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 80 註 12。

是那個嚴重的字眼。³²⁴

霍亂在當時所造成的傷亡，隨著時間過去，越來越嚴重，在 Jeans 的敘述中，一千四百個上岸的人裡，已有五十人死亡，還有三百五十人住院，軍隊有近三分之一左右的士兵都遭受疾病的侵擾，而整個軍隊亦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中。

這簡單的一個字，卻代表了可怕的災難，人們連哼一聲都來不及，就在三到四個鐘頭內死掉了。刷一聲！像一隻無形的爪子向你伸來。是也有一些人可以抵抗，但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全身凹陷，四隻伸長，就像一塊塊被孩子們拉長著玩的蛋白鬆糕一樣，接著是兩頰，然後鼻子，然後眼睛，全都縮乾了。每天都有人死亡，都有人被送出去，野戰醫院人滿為患。你千萬不能說出這件事，否則會讓所有的人都驚慌失措。³²⁵

為了和緩疾病所帶來的緊張與消極，孤拔除了探視傷兵之外，也展現了將軍的善體人意，以此提振軍隊精神：

他(在此指孤拔)還有別的主意：在野戰醫院沒有什麼可以消遣，就算我們已經差不多沒事了也一樣。再來是，我們想得太多，家鄉的事也拿出來反覆思考，於是心中鬱悶，心口壓抑。他想如果能有一些消遣的東西，他們就會復原得更快，於是讓他們聽一些旋律輕快的音樂，這些人聽了之後精神為之一振。³²⁶

法國海軍面對風土病的大肆侵襲時，成為無能為力的弱者，原本作為帝國秩序與現代性，用來維持軍隊與殖民者生理健康與文化優越感的殖民醫學³²⁷，在和 19 世紀台灣的接觸中，不但失去原先的文化優越感，也更加凸顯西方帝國前往東方時，在生理上所面臨的脆弱與不安。

• 隨生理欲望而來的麻煩

然而，對法軍而言，這段難熬的時光裡，沒有什麼比新鮮食物更能夠提振精神的了，Jeans 在 1884 年 12 月的信件裡，告訴朋友軍隊飲食的無趣：「我們雖然不是那種講究吃食的老饕，但能夠有些比軍隊伙食更好的食物來打打牙祭也不賴。總之，毫無變化的軍隊伙食實在是有點吃怕了」³²⁸。由於軍隊缺乏補給，法軍多以罐頭食物作為日常飲食基礎，因此對急需營養作戰的軍隊而言，除了食物

³²⁴ 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67。

³²⁵ 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68。

³²⁶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63；括號內容為筆者自行添加。

³²⁷ 參照李尚仁，〈醫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專題導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No.54，頁 4。

³²⁸ 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69。

難吃得難以下嚥之外，「有時候我們真的可以為了一塊新鮮的肉而放棄一切」³²⁹。

即便法軍的物資缺乏，在 1885 年之前仍讓其他中立國通行，因此導致法軍對北部台灣的封鎖不完全，並讓自己嚐盡封鎖苦果。從 1884 年 10 月到 12 月的這段期間，不但讓殖民地商人趁機大撈一筆，法軍物資貧乏的日常生活，也成為清軍打擊法軍的最佳時機。

麻煩之一：雜貨商事件

隨著法國軍隊駐紮基隆，法軍便成為殖民地商人的重要客源之一，當時一位在香港從事大宗買賣的法國商人到基隆定居，並在基隆成立一間雜貨商店，專門販賣各式法國雜貨，想當然法軍們便躍躍欲試，想藉此獲得熟悉的小玩意，稍稍彌補長時間以來的思鄉情緒。然而，雜貨店的高貴價格與老闆的高傲態度，在 Jeans 的信件中，真實透露出法軍在基隆時被同鄉人為難的情境。

Jeans 與同袍抱著欣喜的心情，與不算太多但仍夠用的金錢，前往「那家有許多寶物，令人感到幸福的百貨商店」³³⁰買些小零嘴與雜物。一位自稱殖民地食品雜貨商人的胖男人擁有這間雜貨商行，於是 Jeans 便向此人購買「來自巴黎的甘草汁糖」與一盒火柴。付帳之際，卻發現此人哄抬價格，在基隆購物的價格(12 法郎)幾乎是原物價(14 蘇)的 18 倍，於是與商行老闆理論引來上尉注意。商行老闆尖叫著：「法國的海軍，到一個冒著財產及生命危險來此地效勞的同胞的店裡辱罵他。這像什麼話！我要向海軍上將和政府申訴」。³³¹

經過一番爭論之後，聽見喧嚷聲而來的上尉在調解無效的情況下，帶著 Jeans 一行人離開商店，而此商店也因標價過高，陸續與法軍起了衝突，商品陸續毀損，但無人阻止；隔日商店物品降價百分之五十，仍無人光顧。而在基隆被當作肥羊宰的顧客，除了法軍之外，還包括被封鎖的在台外國住民，例如陶德在 1885 年 1 月 26 日提到的一位具有創業雄心的本地雜貨商：

幸好，有位具創業雄心的本地雜貨商，搞了一些東西讓我們得以苟延殘喘；但他也很狠心的大敲竹槓—麵粉每袋四美元、馬鈴薯一擔³³²七元二角、煤油每瓶由兩元漲到五元。要蠟燭嗎？對不起，缺貨。火柴漲了一倍，食物平均漲幅三到四成。³³³

³²⁹ 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75。

³³⁰ 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70。

³³¹ 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73。

³³² 一擔(picul)約 60.52 公斤。

³³³ 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 104。

封鎖期間所造成的補給不足，使得身處於封鎖線內外的法軍與在台外國住民都必須共同承擔生活用品匱乏與物價哄抬的生活困境。

麻煩之二：臺灣住民(雞、墳墓、女人)

不同於殖民地雜貨商急欲和法軍交易的意圖，清帝國官員為禁止當地台灣居民販賣任何物件給法軍而祭出重法，被捉到的台灣居民「唉唷！不是頭被砍了，就是被亂棒打死，或是被吊鉤刺入胸膛或內臟，慢慢的折磨至死。就是這些讓人們跟我們做生意的念頭冷卻下來的」³³⁴。除此之外，清帝國官員熟知台灣住民熱愛賺錢的習性，因此發布懸賞法軍頭顱的消息，法軍因而成為當時在台居民的陷阱捕捉對象。

例如 Jeans 在 1885 年 1 月 1 日寄給朋友的信裡就花了二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敘述法軍尚未徹底執行封鎖前，台灣住民對法軍頭顱的渴求及其設下的陷阱。例如 Jeans 與其同袍為了雞肉而發生的慘痛教訓：一位中國人向 Jeans 的同袍提議，若他到自家走一趟，中國人便願意提供一隻上好的雞給法兵，於是 Jeans 和另一位同袍與他結伴同行，以策安全，在出發前一夜還一邊想著要怎麼料理這隻雞。隔日，為不引起中國人的懷疑而致反悔，Jeans 與另一位同袍躲在附近暗中保護前往中國人家的這位法國士兵。

一切都很平靜，我們看他在一間頗為乾淨的茅屋前面停下來，雖然是中國人的，裡面還是可以讓人嗅出誠實的氣息。他頭回都不回，跟我們做了一個手勢，就是這裡。³³⁵

而後，在這個誠實而乾淨的茅屋外傳來嘶啞的叫喊聲，Jeans 的同伴脖子上被套上一副木製枷鎖，然後頭與身體分離，就這麼死去。接著，這位中國人也同時死於 Jeans 與他的同伴手中：「我承認在此時此刻，我們氣得發瘋……抓起那個渾蛋亂戳一通，他當場死在刺刀之下，鮮血濺到我們手上、臉上、到處都是」³³⁶，隨後放火將茅屋燒毀。當孤拔得知此事之後，原本以為可能被處罰的小兵們卻得以豁免，「後來我才知道，他曾碰過類似的突發事件，心裡受到的打擊不小——一位營長的勤務兵也被誘入陷阱，然後頭被砍了下來」³³⁷。

除了這樣的陷阱，台灣住民還使用其他方式獲取法軍頭顱，以此贏得清帝國官方所給予的賞金。例如前述的疾病—霍亂，使法軍傷亡慘重，這個疾病對法軍

³³⁴ 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75。

³³⁵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2。

³³⁶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3。

³³⁷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5。

的折磨至 1885 年 1 月仍未完全結束，因此每周都有幾個人死亡，「因此這些無賴（在此指台灣住民）趁著夜晚進入墓地，打開棺材將死者拖出來，並砍下他們的頭好去換取獎勵金」³³⁸。更甚者，清兵甚至教唆患有性病的女性到基隆街上吸引法軍，「誰要是被她們的媚眼勾引道，誰就倒霉！中了毒之後就會在難以忍受的痛苦中死去」³³⁹，或是被引誘到屋子裡砍頭。這些手段讓小兵 Jeans 認為：「這個民族不打仗，但會暗殺」³⁴⁰。而最難以忍受的，是這些人在夜晚的法軍前哨站裡，趁法軍站哨時，「用鐵勾從四面八方把你鉤住，然後不慌不忙地把你的首級取下來」³⁴¹。

透過前述例子可以得知，在封鎖北台灣的前期，法軍確實的體驗了台灣環境中各種風土人情總加起來的壓力；異地所帶來的威脅與恐懼，也的確成為法軍的親身經歷。因此，苦中作樂成為法軍在封鎖期生活時的必要娛樂方式：

他們是拜雅號上的水手，鴨肝啊！

把中國人都炸死了，鵝油啊！

由估當先生指揮.....火腿蛋啊！

再加一串鞭炮變成了米飯肥肉煲！

嘿！嘿！我們乘著拜雅號，嘿！

他們一點也沒把它穿洞，澄慶號！馭遠號！願上帝祝福你們！喂！升旗啊！

誰去消滅猴崽子？小牛的腰肉！

誰去剷除這幫人？來一杯史尼克酒！

那是運氣好的元帥.....來一杯普斯咖啡酒！

那是我們的孤拔元帥.....牛奶加奶油！

嘿！我們乘著拜雅號，嘿！

它們一點也沒把它穿洞，澄慶號！馭遠號！願上帝祝福你們！喂！升旗啊！³⁴²

這是 Jeans 於 1885 年 2 月 25 日的信件中，描述石浦海戰順利之後，因開心而演唱的即興歌曲。歌詞裡的菜單，或許投射出法軍飲食的缺乏與對家鄉的思念，並隱含著中法雙方於台灣沿海的戰爭行動中，身為行動者的法國士兵們，因戰爭和環境的轉換，而使生理需求無法被滿足、身體感受不同於往之情境下的一個微小期盼。

³³⁸ 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76；引號內容為筆者自行添加。

³³⁹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6。

³⁴⁰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6。

³⁴¹ 同上。

³⁴²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93-p.94。

(三) 突襲缺口、結束封鎖

• 中立國製造的封鎖缺口

造成法軍壓力的另一個因素，則是未直接加入戰爭，但插手旁觀的中立國們。從清法於台灣所造成的緊張關係開始，為了避免捲入戰爭，其他國家便有技巧得確定自己中立國的立場，如羅運治所引述之德國俾斯麥所運用的兩面手法：當時是文明(指法國)與半野蠻(中國、台灣)發生衝突之際，德國當然與文明國家站在同一陣線，但因在遠東有重大商業利益，為維持利益，所以德國不得不避免任何有害德國與中國良好關係的行動。因此，德國一方面認同法軍行動，一方面則提供武器與軍火給清帝國軍隊使用，的確造成法軍的困擾與阻礙。³⁴³

例如法軍封鎖北台灣之前 Jeans 在 1884 年 10 月 15 日給朋友的信件中提到：由於淡水利於清帝國防守，淡水港口除了有障礙物之外，清帝國也在水中放置水雷；陸地上則有兩個要塞白堡(Fort Blanc，中崙砲台)與紅堡(Fort Rouge，今淡水紅毛城一帶)，其中紅堡的武器，就是德國賣給清帝國的克魯伯(Krupp)大砲。而法方為了解除淡水港道裡的水雷，海軍上將李士卑斯花費二十萬法郎請了一位領航員，而這位拆除水雷的領航員正是當初指導建造淡水港口防禦工事者。³⁴⁴

之後，法軍以極少的人數與船艦在北台灣海域進行封鎖，因此無法在海面上形成船隻串連的封鎖線，以致封鎖行動施行不力，中立國挾帶清國物資與人力穿越封鎖線之情事，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但為維持區域性的和平，法軍對清軍所進行的封鎖行動，成了表面上的封鎖。Jeans 在 1884 年 10 月 25 日寫給母親的信件中對封鎖的描述，則成為法軍於 1885 年 1 月擴大封鎖範圍之前的寫照：

聽說我們不跟中國打仗了，事實上彼此卻打得非常厲害，雙方盡可能地互相殺戮，看起來很像戰爭，不是嗎？嘿！才不是呢。我們戰到宣布封鎖，不過，這不算是封鎖，到底是不是封鎖？看你自己得出什麼結論。事實上，除非有戰艦擋在他們面前，否則中立的旗艦都可以通過。妳看，要怎麼樣才能真正的封鎖，用價值三、五百萬或六百萬法郎的船隻拉成一條安全鏈費用昂貴呢！我們有權力查看可疑的船隻，但是它們不會受到我們的控制。這是和平封鎖嗎？有點像小牛肉裡的鱈魚，或綿羊肉塊裡的松露塊菘，什麼都不像。³⁴⁵

³⁴³ 參照羅運治，〈清法戰役法國封鎖台灣之探討〉，《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04-105。

³⁴⁴ 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55；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46。

³⁴⁵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57。

清帝國物資與人員藉中立國船隻往來於台灣和清帝國沿海各處，法軍查看船隻的實際情形則讓法軍氣得跳腳：

你知道中國人想出什麼計謀嗎？他們居然把他們全部的商船都賣給了一家美國的公司。真是太精明了。所有的中國船都掛著星條旗航行，所以我們也無法將他們給逮住。真是氣人，不會有比看到有人指著你的鼻子笑，更令人憤怒的事了。³⁴⁶

而在 1885 年 1 月 1 日陶德的報導中，則透露在台外國住民因慶祝新年的物資不足，進而對現況產生的不滿，此一報導則更能詳細說明封鎖的狀態：

法軍一方面不許英國僑民的物品、信件送進台灣；另一方面卻在清法未宣戰下，依國際公法，在英屬地香港獲得必要的補給品，實在不合公平公義原則。華人靠著戎克船走私，突破封鎖線，取得必須品及郵件；反觀信賴自己政府郵政效率的外僑卻是什麼也得不到，令人氣餒。³⁴⁷

另一方面，中立國官方人員在封鎖區裡光明正大進行的物資流通活動，也相當令在台外國住民羨慕：

我們只好眼睜睜的羨慕領事館人員、金龜子號官兵興高采烈的享受家書、補給品。真搞不懂為何不能讓信件、郵件檢查後，再轉給我們，或許法國人懷疑我們有人因同情清政府，而偷偷替他們通風報訊。我們這群可憐的外僑，不但生意中斷了兩個月，被封鎖了一個月，現在連與外界溝通的管道也完全斷絕。英國海軍船艦每次抵港，帶來外界的些許新聞，竟成了最大的期待。³⁴⁸，

實際上，在台外國住民自有方式與外界聯繫：「我們這些可憐又飢貧的商人，只有猛吞口水的份，還得把握丁點時間寫信，好讓冠軍輪帶離，送給遠方的友朋」³⁴⁹。除此之外，也以各種方式獲得信件，例如：「有位天才用上面標示「烘焙粉」字樣的盒子，偷運大家期盼已久的信件，太感謝了」。³⁵⁰從上述例子中，可以看見中立國們為了各自於遠東的利益，實際上於接觸帶中對法國進行孤立。政治勢力的介入，讓實際造成生活於接觸帶中的法軍與在台外國住民之生活困境，並同時展現出接觸帶裡疆界的模糊特質與多種形式，以及各方勢力為求生存而直接碰撞的接觸帶畫面。

³⁴⁶ 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65。

³⁴⁷ 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 100。

³⁴⁸ 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 85。

³⁴⁹ 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 93。

³⁵⁰ 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 96。

• 法軍突襲

然而，法軍在封鎖行動中吃憋的情形只持續到 1884 年底，如羅運治所言：法軍封鎖台灣不但缺乏兵力、雨霧、海浪與東北季風帶來的連續風暴等環境困難，使有效封鎖很難進行，清軍因此時常突圍與中國本土連繫。因此法軍不得不在 1885 年 1 月 7 日宣布加強封鎖，並將封鎖線延長至台東卑南一帶。³⁵¹同時，法國決定開始反制行動，「所以不再有中立國的船隻可以私藏違禁的貨物了；從今以後，它們必須要一個個的被查看，或者是當心我們不長眼睛的砲彈了」。³⁵²

當法軍開始查看通過封鎖線的各艘船隻後，法軍在北台灣的生活條件便逐漸好轉。首先是攔截到的許多民生物資，例如錢幣、農產品、米與茶，以及可作為現金流動的鴉片，其他還有許多雜物：衣物、布料、佛像等。最重要的，則是許多人力：

之後，我們捉了一堆天朝人，這些傻瓜還以為我們會把他們的頭給砍了……(中略) 我們沒把他們給殺了，卻派了工作給他們，我們必須承認，沒有任何的馬、牛或驢比這些走獸更有耐心和耐力來幹活了。你有沒有看過我們那邊的磚石工：他們拿起一塊磚，在手上掂量一下，用眼睛稍微瞄一下看有沒有正，把它放在牆上，然後停下來重新點燃菸斗，直到再拿起一塊磚時，就花了很長的時間。而一個中國人呢，當人們派給他一項搬運重物的工作時，他毫不猶豫的挑了起來，往該去的方向去，卸下貨物，然後再回來，又離開，中間沒有絲毫間斷，好像一具停不下來的機器。³⁵³

法國藉著戰俘完成許多工程外，隨後又獲得增援，經過將近三個月的封鎖，法軍算是將基隆變成一個完整的法軍佔領地。同樣的，當地方情勢穩定後，在基隆活動的台灣住民便不再時刻想著如何割下法軍頭顱，好向清方領賞，開始逐漸的與法軍共同生活在基隆附近的區域如 Jeans 所說：「中國人又回來了，不過，這些人不用害怕，他們只是想做點誠實生意的商人。現在已經沒有砍不砍頭的問題，買西瓜時，可以不用把頸子留下來」³⁵⁴。法軍士兵的人身安全不再成為異地生活的擔憂主因。加上補給船的到臨，使法軍飲食品質大幅改善。

Jeans 在 1885 年 1 月 30 日的信裡提到：「現在我們有雞鴨、羊肉、牛肉和水

³⁵¹參照羅運治，〈清法戰役法國封鎖台灣之探討〉，《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99。

³⁵²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77。

³⁵³石岱著、帥仕婷譯，《當 Jeans 遇上福爾摩沙》，頁 76。

³⁵⁴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9。

果，要多少有多少。說真的，我的吊帶上面還扛過鹹肉呢」³⁵⁵，再加上「每十五天就會有一艘郵輪從日本開過來，載給我們一百頭活牛，僅僅這個就不得了！在加上馬鈴薯、捲心菜、生菜...我還吃到萵苣呢！」³⁵⁶豐盛的食物隱喻著法軍生活的改善，以及營養充足之後軍隊健康的提升，法軍之前所經歷的困苦總算獲得緩解，Jeans 透過對食物的描述，隱喻了生活品質的提升，及環境相對穩定後，軍隊生理不再因疾病與飢餓而遭受打擊的穩定身體。

然而法軍的封鎖行動仍然遭受阻礙，起因來自於台灣向朝廷納稅的米：在台灣於 1885 年初向清廷納貢期間欲藉由英國與其他中立國船隻由台灣往中國輸送，當法軍企圖攔截清廷稅收以得到清廷財稅漏洞，進而產生帝國內部動亂的效果，好讓清廷正視法軍封鎖北臺所欲解決的越南問題時，然其他列強仍抵制法國要求禁運稻米的行動，而英國與瑞典亦出面阻止：「他們宣稱除非我們可以證明這些都是真正的戰時違禁品，否則中立國船隻的貨物可以不受檢查」。³⁵⁷後經斡旋，法國也讓稻米成為扣查物之一。

中立國們所製造的封鎖漏洞，為法軍封鎖行動帶來許多變因之外，如羅運治所說，清帝國也利用列強與法國之間的矛盾，以此獲得部分協助³⁵⁸；同時，中立國們所製造的每一個漏洞，與法軍一次又一次的填補行動，都讓雙方再次從不同角度檢視封鎖的實際效益，而 Jeans 口中扯法軍後腿的中立國行動，則成為理解接觸帶的縫隙之一。透過這些縫隙，我們得以發現：接觸帶裡頭運作或涉入的勢力，並非源自於共同概念或文化基礎，而是各方自行估算的利益促使不同的勢力結合，進而形成共識；他們並不是為了理念而來，只是恰好能用結盟、抵制或者相互協助的方式，獲得各自的最大利益，而這也正是接觸帶中最基本的生存之道。

• 結束封鎖之後

法軍在北台灣確認占領基隆之後，清法雙方作戰不斷，自 1885 年 2 月開始，法兵派遣部分軍隊前往澎湖，除了與惡劣天候搏鬥之外，也替日後占領澎湖的行動預作準備。1885 年 3 月 8 日清廷確認敗戰、同年 3 月 31 日法國總理茹費理下台，清法戰爭協議確獲簽署後，封鎖就此告一段落。而法軍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據點也由福爾摩沙改為澎湖，經過攻防戰後，法軍於澎湖建立了 Jeans 所謂的殖民地，並試著與當地居民建立關係，Jeans 在 1885 年 4 月 5 日寫給朋友的信中提到：

³⁵⁵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80。

³⁵⁶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80。

³⁵⁷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102。

³⁵⁸參照羅運治，〈清法戰役法國封鎖台灣之探討〉，《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0。

元帥在欲擒故縱之間也有他的一套，手段溫柔得像羔羊一般。他在村子裡面出了一張告示，裡面說的是一大堆的好話。這很有必要，因為那些可憐的人，我現在倒替他們叫屈了，首先是他們怕我們怕得臉色發白，因為不管怎樣，他們總是害怕我們把他們的頭割下來，或把他們折磨一頓；他們特別害怕的是他們的官員，如果不幸與我們往來，官員們一定會用最糟的刑罰來處罰他們。幸虧他們開始瞭解，我們的力量足夠保護他們，彼此的關係才建立起來。³⁵⁹

1885年4月15日，孤拔將軍發布封鎖解除令，同時期的台灣呈現百廢待舉的狀態，透過陶德敘事中對當時北台灣商業活動的描述，透露出界線消退的痕跡，日常生活的回復使原先緊繃且明顯的疆界(封鎖狀態)消失於無形：

自從解除封鎖後，米價與其他民生必需品，已明顯回軟，可憐的勞動階級已經可以一天吃上一、二碗白平價白米飯。幾天前仍然蕭條的市面，如今各種洋貨、土貨雜陳，交易熱絡。外國茶商的返回，加速大稻埕的復甦，他們帶著簡單的隨身裝備，迅速重新開業，減少居民對戰爭是否已結束的疑慮。³⁶⁰

戰爭與封鎖結束後，在陶德的觀察下能夠隱約感受法軍駐紮與進行封鎖的痕跡，似乎只在基隆的社寮島的平埔族與動物們身上可以看見了：

社寮島的平埔族似乎是唯一未受影響、騷擾的人群，他們曾替法軍工作，看來彼此相處愉快。島上及基隆的狗本對洋人極不友善，經法軍統治，新生代的幼犬經常搖著尾巴、跟隨陌生人東晃西晃，顯然之前極受法兵寵愛，養成不畏生人、與人為善的習慣。更誇張的是羊兒也學會了這一招，見到洋人向見到了親人，死忠尾隨、跟前跟後的。社寮島平埔族人學會了一些法語，會用 Monsieur 向你搭訕，偶爾來個法式聳肩表達不知道或無可奈何之意，挺進步的。³⁶¹

而法國在台灣與澎湖所進行的封鎖行動，隨著1885年6月11日簽署的清法和平條約，及隔日孤拔將軍的離世，亦自福爾摩沙與漁翁群島完全撤出，被法國政治決策擺弄的軍隊與小兵們則帶著戰爭經歷回到故鄉。

(四) 小結：疆界與歷史的多重複雜性—關於接觸帶

朋友，你看，要不是有人跟你述說一場戰鬥，詳細地把右翼、左翼和中線

³⁵⁹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121。

³⁶⁰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128。

³⁶¹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頁148。

的運動都講出來，那他不是不在場，就是事情完了之後，才根據所得到的情報來講述。³⁶²

• 記憶/技藝

當研究者們針對事件進行討論時，實際上像是翻開歷史畫面中被摺疊起來的部分：許多遺留下的資料透露事件的經過，而更多無法留下的資料，如同每一段不被記住的故事，散落各方、逐漸消逝。或許在某處、某人、某些群體身上所獲得的重要資訊，也都只是片段的分享，拼湊，幾乎無法完整。甚至經歷者、旁觀者、研究者都無法宣稱什麼是完整，因此，這些散亂的片段所呈現的某些意義，也就無法以真實或虛構定義。

因此，許文堂在〈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一文中，企圖藉由比對 1884 年 5 月創刊於上海的《點石齋畫報》與法國畫報 *La Terre illustrée* 中所刊登的 *Jeans* 書信、*Illustration* 中的清法戰爭報導文學，以及淡水當地廟宇和祭祀傳統等三面向，討論史實與集體記憶的關聯性之文章，或許可以成為另一種補足 19 世紀台灣當地觀點的方式。

許文堂指出當時畫報的錯誤與誇大報導，畫報單方面宣稱清軍的英勇勝利的報導，明顯與史實不符。許文堂認為：

歷史研究雖然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現，但是大部分民眾的集體記憶似乎是不受影響，由其當牽涉感情因素、宗教信仰，更使史實難彰。無論如何，實事求是對於官文書紀錄或是求真的科學研究，應是比較重要，而且是基本的事情。³⁶³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思考，若研究者不使用歷史學家的後見之明觀看歷史中的「誤謬」時，這些錯誤的文件便透露出另一個訊息：在當時的清帝國對清法戰爭的想法與認知便是如此，並且持續將這個記憶流傳於後世。清帝國資料中的誤謬實際上展現了 19 世紀台灣部分的紛亂，此一現象也透露，當時的台灣位於疆界的狀態並非如官員陳述的蠻荒、邊緣，乏善可陳；實際上，可能是因為當時的台灣，無法被進入島嶼的中國文人分類，所以在文獻記錄上除了帝國決策之外，19 世紀的台灣生活仍處於選擇性的被消音狀態。

這些記憶分歧的情況，在柯文(Cohen. A Paul)《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一書中，則有更進一步的分析。柯文以義和團為例，討論歷史

³⁶²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49。

³⁶³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台灣史研究》13：1 頁 45。

構成的三個部分：歷史學家重塑的過去、人們經歷的過去，以及被神化的過去。柯文所作的三個分類，實際上並不因為其真實性高低，而有價值高低的區別，因為這是不同群眾所相信的歷史真實，而這同時也呈現出歷史發生時，過程中所展現的散亂且繽紛的狀態。

同樣的，本文對清法戰爭台灣封鎖期的討論，便建立於柯文所提的相同基礎上。本節藉著清法戰爭北台灣封鎖期作為事件使討論聚焦，挑選西方旅人筆記中所陳述的物質狀況與行動者的情緒作為討論重點，試著貼近整個封鎖行動中，歷史行動者的日常生活與當時的台灣風貌。而清法戰爭北台灣封鎖期時，資料比對下所發現的法軍、清軍、在台外國住民、清帝國的台灣移民、台灣原住民等不同族群間的人際往來互動與各種事件，則將接觸帶裡紛雜且多頭並行的畫面描繪地更加細緻；同時，藉由接觸帶中，因 19 世紀錯雜於台灣的政治、自然、文化等因素，作用於各方勢力所產生的緊張關係，說明接觸帶中錯落的疆界以及縫隙；而縫隙中為求利益與生存的人們則透過文化感知、身體感受於情況紛亂的接觸帶中辨識自我與他者，並伺機而動的狀態，則成為接觸帶生活的最佳寫照。

• 感知接觸帶

從本文對清法戰爭台灣封鎖期的討論中，或許可以描繪出一個較為詳細的模樣：透過 Jeans 文章中對食物、疾病的諸多描繪，19 世紀台灣的生活經驗對當時的法國駐紮軍隊而言，是充滿生理性的實際身體感受；而陶德筆下的台灣生活則充滿了文化理解的差異，以及身為商人對商業利益的追求，這同樣也是亟欲敲開遠東貿易大門的各個帝國對 19 世紀台灣的欲望。然而透過各方文件的比對，則浮現出隱藏於生活底下，實際上影響島嶼生活的各帝國之勢力交鋒；而這些細節被後所透露出的接觸帶，則是充滿不確定感的所在。

接觸帶中經由物質、文化、政治關係等因素而產生變動的情況，影響了接觸帶的實際生活，而不斷浮動的隱形疆界所產生的縫隙，再度借由物質、文化的流動和政治關係的相互協助，則成為觀察接觸帶中動態畫面的一個縫隙。然而，接觸帶此一說法雖因 Pratt 為詮釋殖民關係而來、會面點的概念也是鄧津華為打破後殖民結構所提出，且殖民脈絡則使接觸帶的張力更大、並使會面點的是見得以牽涉更廣，解釋的更為詳細；但實際上，接觸帶與會面點並不一定處於殖民脈絡中，透過本文觀察所得，似乎可以更廣泛的使用於自我與他者概念接觸和互動的過程中，透過自我與他者的辨識過程，接觸帶此一概念，因而回歸「接觸」的過程。

第五章 結論：想像、觀察、置身接觸帶

19 世紀的台灣透過許多他者(包括清帝國官員、西方官員、科學家、傳教士，以及來自各國的旅人們)的探索，並被進入台灣的眾多他者們轉譯為文化上他者，標示著蠻荒、偏遠、落後，進而成為失語(在此指失去母語的番人)的一群和亟待標示的空白島嶼，本文第二章便建立在此基礎下，使用旅人承接前人資訊與想像，對臺灣島民的印象分類，說明西方旅人於 19 世紀台灣旅行時，所見到的如書籍記載與科學式分類的他者，一方面隨著旅人的腳步將 19 世紀台灣住民以旅人熟習的知識系譜方式進行分類之外，在另一方面也藉由旅人書寫觀察旅人以科學方式紀錄 19 世紀台灣時，因實際接觸所產生的多重描述，並由此進入具有多種面貌、立體的 19 世紀台灣畫面。

隨著時間推移和空間轉換，旅人因環境差異帶來的不同於往的生理狀態，感受整個 19 世紀台灣，包括物質、文化差異與自然環境等因素於自身的施力，並在心理與生理層面皆感到不適應；這些不適應狀態成為旅人於筆記中的抱怨，以及身心理方面感到脆弱(weak)的原因，而這也是旅人將 19 世紀台灣與自身文化作為比較的理由——藉著他域讓自身所遭受的不適應症，重述旅人對自我文化的依賴，同時，不適應症也成為身為大環境他者的旅人用來發現他者的路徑；本文第三章便以旅人心理進入 19 世紀台灣所產生的轉變，作為理解接觸帶中他者印象如何建立的方式之一，說明 19 世紀台灣的旺盛生命力對當時西方旅人的影響與改變。

但旅人散落於筆記中與他者和他域的遭遇非常多，透過事件方得以集中，本文第四章以羅發號事件後續處理經過，和中法戰爭台灣封鎖期這兩個事件，將旅人於 19 世紀台灣的遭遇約略按照時序，與清帝國官方資料加以比對，看見了不同立場對同一歷史事件中的多重理解。同時也將接觸帶遭遇的畫面細緻的描繪，即便敘事中的各方勢力強弱有差，置身接觸帶的人們卻總是能夠找到縫隙存活，而身為接觸帶的 19 世紀台灣(包括自然環境與住民)卻總是能展現其基本法則——存活；即便接觸帶中必須由辨識自我與他者的舉動構成，但總被西方旅人用來當作對照組的 19 世紀台灣，則在旅人筆記中展現了屬於當地的真實，並展現出身為疆界錯落處的彈性與動態。

前面幾個章節對西方旅人在 19 世紀台灣旅行的陳述與討論這麼多，那麼，我們再一次檢視旅行吧：旅人到一個生活方式、空間配置、文化行為、自然環境完全不同的國度旅行，歷經了地理疆界的穿越、文化差異的挑戰，以及因地制宜、機緣巧合下所發生的各種事件，帶著自己的想像進入異地，觀察該地的模樣，並

且時間越久，旅人觀察的基準點也跟著不同，旅途中發生的各個事件，便如同自己與他者的會面點，透過各個會面點串連起旅人與他者進行遭遇的接觸帶，而身處接觸帶當中的旅人，與他域和他者對話、被他域環境感染，然後直接或間接地再度影響了接觸帶的狀態。

從本論文對西方旅人於 19 世紀台灣的旅行之分析，同時印證了知識與經驗的關係：知識與經驗有關，但並非所有知識的組成來自經驗，空間就是一種內在的生物性限制。³⁶⁴然而跨越疆界的行為，則成為旅人內在與外在相互重新認知的過程，再加上旅人與其知識圖譜中各類他者(漢人、熟番、生番)的交會，以及各種勢力操控運作於其上的背景，身為接觸帶的 19 世紀台灣不再只是單一而平版的東方與他者、亦非殖民主義想像中單純的承受方，也不是後殖民結構中極欲逃脫殖民結構的被殖民者，而是讓旅人產生不適應症、吃憋受苦、無法完全掌握的所在。

透過節錄西方旅人充滿物質性與生理性的旅人筆記，本論文試著展現 19 世紀台灣當地原有的複雜結構，以及置身接觸帶的基本生存法則—為求生存的利益結盟和個人立場，而這個法則也成為西方旅人作為一個他者，並於 19 世紀台灣這個接觸帶理解他者過程中描述最多的部分。另一方面，本論文將物質文化與身體感知做為分析旅人敘事時的有機連結，從實際存在並被旅人描述的物件，討論難以描繪的生裡感受與接觸帶上發生於事件中的文化過度狀態，並以此展現疆界做為開口的可能性。

經由物質與身體感在旅人筆記中的陳述，我們得以看見 19 世紀台灣處於各種勢力匯聚、過度，再組合的狀態—台灣的地理位置看似在清帝國疆界邊緣，實際上與大陸隔著海洋、與其他國家連結於同一片海洋的地理疆界；台灣島上沒有確切界定的族群疆界，在加上隨著旅人而來的各種文化碰撞於其上，成為不同帝國勢力在他方的延伸…這便是 19 世紀台灣裡各種疆界的另一個樣子：一個開口。在旅人筆記與事件的對照下，不同的帝國視野於 19 世紀台灣聚焦，透過羅發號事件後續處理過程與中法戰爭台灣封鎖期這兩個例子作為帝國視野聚焦的練習，讀者可以看見各說各話、各自思量，甚至各有焦慮的兩種帝國眼光。

至於身為帝國視野延伸的旅人居處他域(在此指 19 世紀台灣) 於生理和文化方面所產生的不適應症與脆弱，正好展現出 19 世紀台灣原有的內在文化、生活秩序和生猛力道，而非帝國書寫下所描述之聰穎與神勇。透過旅人書寫，分析歷史中旅人的脆弱(weak)來自何處，或許可以發現西方旅人亟欲建構所謂的“西方

³⁶⁴參照 Syed Manzurul Islam, *The ethnic of travel*, p.8-p.10.

優越文明”此舉背後，並非只有認為自己是文明人的驕傲和以西方作為中心的知識圖譜；此舉除了來自旅人對西方中心和 19 世紀台灣關係間的想像、描述與回應之外，也或許來自西方旅人於 19 世紀台灣遭遇生理脆弱時，因無法掌握 19 世紀台灣帶給自己的不適感，為求生存而必須使心靈強壯的需求。旅人的脆弱直接提醒了讀者 19 世紀台灣的捉摸不定與強韌：19 世紀台灣並非只是被描述、被觀察、被理解的他者，而是一個超越旅人及其文化所預設的島嶼。

本論文透過旅人對 19 世紀台灣(或者說異地)的正面書寫，以及筆者藉由物質基礎分析旅人書寫背後的生存條件與環境的方式，對旅人書寫進行正反面操作的過程可以發現：接觸帶中的各種他者遭遇說明了，對西方而言屬於東方、他者、異文化、在本文中作為接觸帶例子的 19 世紀台灣，所擁有的頻繁且複雜的生活片段，與其奔放的生命力和內在秩序，是讓西方旅人折服的，並讓旅人透過身體與文化的不適應症呈現於旅行書寫中。經由身為他者的西方旅人與其筆下的他者和接觸帶(19 世紀台灣)相互辯證過程，讀者得以看見西方旅人想像、觀察並置身接觸帶的過程，並在此過程中發現 19 世紀台灣並不如《東方主義》中所呈現的平板、單調、悲情且受害的東方，相反的，西方旅人反而因東方旅行，見識到 19 世紀台灣的活躍、多元，並具有豐沛生命力的狀態；至於身為接觸帶的 19 世紀台灣也因西方旅人的進入，而加深接觸帶群體網絡的複雜，並映照出 19 世紀東西雙方文化、人群交會時，各自產生的他者和自我群像。

旅行是跨越疆界的開始，而生活則是歷史積累的必須，透過兩者的結合，或許可以作為拆解歷史因塵封而顯得僵固的可能方式之一。經由本論文這個曲折而迂迴的路徑，或許能將遺落於歷史縫隙間的生活經驗與身體感知抓回來一些，並因此更貼近 19 世紀台灣一點。

參考文獻

中文史料

1.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臺北：臺灣銀行，1960。
2. 臺灣研究叢刊第七三種，黎文烈譯，《法軍侵台始末》，臺北：臺灣銀行，1960。
3. 臺灣研究叢刊第一〇七種，《台灣之過去與現在(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1972。
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述報法兵侵台紀事殘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遊記資料

1. Fernandez, Pablo 編，《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台北：光啟文化，1991。
2. Jean L 著，鄭德順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
3. J.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灣研究叢刊 107。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4. Kann, Reginald 著，鄭順德譯，《福爾摩沙考察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5. 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 著，林金源譯，《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台北：經典雜誌，2002。
6. Pickering, W.A.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and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 Hurst and Blackett, 1898.
7. Pickering, W.A. Among the savages of central Formosa, 1866-1867. *The Messenger and Missionary Record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n.s. 3 (1878): 15-16, 29-31, 69-71; 29-30.
8. Steere, J.B.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3 (1875): 181-184.
9. Steere, J.B. Formos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6 (1876): 302-334.

10. Steere, J.B.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李壬癸編，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出版，2002。
11. Stephane Ferrero 著、帥仕婷譯，《當 Jean 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1884-1885)》，台北：玉山，2003。
12. Swinhoe, Robert. *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 Bell, 1863.
13. Swinhoe, Robert. Letters from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Scientific meet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year 1864 (1864)*: 423-428. [Dated Tamsuy, 4 April, 30 April, and 2 June 1864.]
14. Swinhoe, Robert. 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0 (1866)*: 122-128.
15. Thomson, John 攝影，《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Formosa from the earth and from the air 1871-2006*)》，臺北：Editions Rene Vignet，2006。
16. Thomson, John. Notice of a journey in souther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7 (1873)*: 144-148.
17. Thomson, Joh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 or Ten years' travels, 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road*. London :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 Searle, 2003, 1875.
18. 史蒂瑞原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台灣調查筆記》，台北：前衛出版社，2009。
19. 甘為霖著，林宣弘、許雅琦、陳珮馨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台灣筆記》，台北：前衛出版，2009。
20. 白尚德(Chantal ZHENG)著、鄭順德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Les Européens aux porte de la Chine: l'exemple de Formose au XIXe siecle*)》，台北市：南天，1999。
21. 白尚德 (Zheng, Chantal)著，鄭順德譯，《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與台灣原住民族的接觸：1865-1940》臺北：順益博物館出版，2004。
22.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發現老台灣》，台北：台原，1994。
23.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民文化，1999。
24.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劉還月導讀，《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賊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10。

25.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前衛，2007。
26.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台灣海關歷年資料(I)》，台北：中研院台史所，1997。
27.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台灣海關歷年資料(II)》，台北：中研院台史所，1997。
28. 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台北：原民文化，2002。
29. 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台灣紀行》，台北：台灣書房，2008。
30. 劉克襄，《橫越福爾摩沙：外國人在台灣的旅行(1860-1880)》，台北：自立晚報社，1989。
31. 劉克襄，《深入陌生地：外國旅行者所見的台灣》，台北：自立晚報社，1993。
32. 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台北：如果出版社，2006。

英文專書

1. Bolyanatz, Alexander H. *Pacific romanticism: Tahiti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Westport, Conn. : Praeger, 2004
2. Clark, Steve edited. *Travel Writing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y in Transit*. New York: Zed Books Press, 1999.
3. Islam, Syed Manzurul. *The Ethics of Travel: From Marco Polo to Kafk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Kaplan, Caren. *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 of Displacement*.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Leed, Eric. *The Mind of the Traveler: 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Press, 1991.
6.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Studies in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2.
7. Spurr, David. *The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8. Strassberg, Richard. E. *Inscribed Landscape: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9. Stagl, Justin. *History of Curiosity: Theory of Travel, 1550-1800*. Switzerland: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10. Teng, Emma Jinhua.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11. Young, Tim edited. *Travel Wri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illing the Black Spaces*. London ; New York : Anthem Press, 2006

中文專書

1. 巫仁恕、狄雅斯著，《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
2. 余舜德著，《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清大出版社，2008。
3. 林滿紅著，《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台北：聯經，1997。
4. 肯尼恩·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史蒂夫·托皮克(Steven Topik)著；黃中憲譯，《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 1400 年到現在》，臺北：如果，大雁文化，2007。
5. 柯文(Cohen. A Paul)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6. 郝延平著，李榮昌、沈祖煒、杜恂誠譯，《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
7. 菲利浦·費南德茲-阿梅斯托 (Felipe Fernández- Armesto)著；黃中憲譯，《大探險家：發現新世界的壯闊之旅(Notes on Pathfinders –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台北：左岸，2010。
8. 費南爾·布勞岱爾(Braudel, Fernand)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一 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與不可能〉，台北：左岸，2006。
9.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立緒文化，1999。
10. 蔡石山著；黃中憲譯，《海洋臺灣：歷史上與東西洋的交接》，台北：聯

經，2011。

期刊論文

1. 白詩薇(Sylvie PASQUET)，〈從法國史料來看清法戰爭在淡水(一八八四年)〉，《二〇〇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2001，頁 7-21。
2. 白詩薇(Sylvie PASQUET)，〈從戰艦上看福爾摩沙-法國海軍軍官筆下的清法戰爭(1884年-1885年)〉，《第三屆淡水學國際暨清法戰爭 12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2004，頁 215-230。
3. 李尚仁，〈醫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專題導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No.54，頁 1-16。
4. 李尚仁，〈吃在中國：十九世紀來華英國醫師的觀點〉，《中央研究院週報》，1294 (2010.10.28)，頁 5-7。
5. 邱德亮，〈沒有東(方)的東方主義，東方之外〉，《文化研究》10，頁 69-102。
6. 郭嗣汾，〈李善德與羅發號事件〉，《臺灣文獻》29：2，1978，頁 4-12。
7. 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臺灣史研究》13：1，2006，頁 1-50。
8. 許毓良，〈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兼論民族英雄墓的由來〉，《臺灣文獻》，54：1，2003，頁 294-325。
9. 許毓良，〈“西仔反”在臺灣—清法戰爭的基隆、淡水、澎湖之役〉，《臺北文獻》直字 150，2004，頁 299-344。
10. 許毓良，〈清法戰爭前後的北台灣(1875-1895)—以 1892 年基隆廳、淡水縣輿圖為例的討論〉，《台灣文獻》，57：4，頁 264-303。
11. 莊雅仲，〈裨海紀遊：徘徊於自我與異己之間〉，《新史學》4：3，1993，頁 59-79。
12. 陳三井，〈中法戰爭的法方檔案與法文著作〉，《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5，1988，頁 151-157。
13. 陳芷凡，〈漫說恆春太寂寥？—李仙得筆下的番人形象與其族群關係〉，《台灣文學研究學報》：9，2009，頁 329-362。
14. 馮明珠，〈唇齒相依—細述中法越南戰爭中之閩臺海戰〉，《故宮臺灣史料概述》，臺北：故宮，1995，頁 175-202。

15. 張志強，〈孫開華淡水之役獲勝之原因〉，《歷史月刊》vol.205，2005，頁 67-73。
16. 張隆志，Review: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中國文史哲集刊》26 期(2005)，頁 415-422。
17. 張隆志，〈殖民歷史研究與台灣史的再書寫〉，《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頁 433-455。
18. 劉克襄，〈一具相機走台灣：湯姆生穿過月世界的旅行〉，《新活水》5，2006，頁 76-82。
19. 羅運治，〈清法戰役法國封鎖台灣之探討〉，《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2004，頁 92-111。

碩博士論文

1. 莊雅仲，〈文化、書寫與差異：三個有關異己論述的分析〉，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2. 吳明益，〈當代臺灣自然寫作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3. 周玉翎，〈台灣南端尾閩恆春的族群與歷史(1867-1904)〉，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4. 洪維晟，〈帝國邊區的村落、族群與歷史：以屏東萬金庄為中心討論(1861-1945)〉，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5. 許博凱，〈帝國文化邏輯的展演-清代台灣方志之空間書寫與地理政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6. 莊勝全，〈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7. 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出版，1996。

網路資料

1. FORMOSA: <http://academic.reed.edu/formosa>
2. 教會史話第三輯，史話 299：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
<http://www.laijohn.com/book3/229.htm>